

理论与实践

ILILUN YU SHIJIJIAN



12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目录

- 一个具有无比威力的理論武器杜国庠(1)
- 学习“毛澤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的体会何小林(3)
- 从“論紙老虎”学习毛主席的科学預见陈一百(6)
- 关于資产階級法权問題的一些意見何城(10)
- 談談破除資产階級法权的一些問題李又华(16)
- 参加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体会座談发言鍾旭元等(19)
- 怎样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张江明(35)
- 論黎族合亩制的社会性質詹慈 林晓(40)
- 思維形式的正确性和內容的眞实性問題李匡武(45)
- 評一兵先生的“形式邏輯与客观眞理”
- 韓愈思想批判(下)杨荣国(48)
- 把大算盤打响起来章沛(54)
- “教授中的教授”种种黄宣民(55)

动

“伟大祖国的广东”一書編写工作正紧张进行
学习毛主席“論紙老虎”心得座談会发言綜述
广州各高等院校开展教学改革
广州举行关于資产階級法权問題座談
广州高等学校积极批判資产階級学术思想
“东南亚經濟資料汇编”即將出版
苏联东方学專家到广州講学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积极展开科学活动

态

一个具有无比威力的理論武器

——在学习毛澤东同志“論紙老虎”心得座談会上的发言

杜 国 庠

毛澤东同志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許多根本問題，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无数事实証明：毛澤东同志的著作，具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理論力量。“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这一个政治文献，就其发表或写出的時間來說，前后相距有二十年之久；但就其提出問題和对这問題分析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所起的指导作用来看，它不但完整地、系統地、正确地解答了应如何認識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的問題，而且在教导我們如何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論去分析問題方面，也是一个极其銳利的武器。我們在这个时候，来座談各人学习这一伟大文献的心得和体会，很有必要，也是很有益的事情。

“紙老虎”这一成語用以比拟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恰到好处的，深刻、生动又非常形象。它說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外强中干，外表上张牙舞爪有点吓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有时表现得很猖獗，但并不表示它們有力量，只是表示它們的临死掙扎。毛澤东同志根据这一英明的論断，用十分簡明易懂的公式，表述了敌我力量的邏輯发展：搗乱，失敗，再搗乱，再失敗，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所不能逃避的邏輯；人民的邏輯恰恰相反：斗争，失敗，再斗争，再失敗，再斗争，直至胜利。

毛澤东同志之所以能够异常精辟地得出这样的科学結論，并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的。在“論紙老虎”这一文献里，正如他解决中国革命的許多問題一样，創造性地而且极其深刻地运用了唯物辯証法和历史唯物論的理論。他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尽做坏事的反动本質，揭示敌我双方的矛盾斗争，一方向上发展壮大，一方衰弱灭亡，他全面地掌握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变化，从而論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不能永远反动下去，社会主义社会終究要代替資本主义社会。这一科学論断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来的，因为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是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即使一时强大，終于无法逃脫历史规定的命运。沙皇、希特勒和无数反动派之終归灭亡，就是毛澤东同志这一科学論断的历史見証。

毛澤东同志的难能可贵的地方，不仅是認識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以科学的預见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这一著名的論断，而且，最重要的还在于他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況，在复杂多变和困难重重的条件下，制訂了我們党在各种不同时期对付敌人的政策方針，創造了革命斗争胜利的前提条件，从而領導中国人民获得了胜利，并在胜利的基础上走向新的胜利。他是那么坚定、机智和勇敢，从来沒有被敌人的残暴和凶恶气势所迷惑。

三十多年来，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不断地坚持斗争，团结广大人民，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当革命力量还处在劣势，表面上看来还弱小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革命的理論武装革命的人民，说明新生的力量一定要战胜腐朽的力量；当蒋介石气势汹汹发动内战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及时指出“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并不只一次地警告反动派不要“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虽然貌似强大，其实没有什么可怕，只要我们敢于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必将取得胜利。

但是，在对敌斗争中，我们又不能不讲求战略和策略。毛泽东同志在“论纸老虎”这一文献里，教导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是灵活应用唯物辩证法去认识形势和对敌斗争的又一光辉典范，他要我们从全面和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同时也要注意时间、地点和条件。因为不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这就会丧失自己的斗志，从而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反之，如果不在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上重视它，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及其他客观情况，进行具体的部署，就可能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唯武器论者”和“恐美病患者”或者轻敌麻痹，以为帝国主义国家绝对不会发动战争的人，他们看问题之所以往往流于主观片面，正是由于他们没有好好认识毛泽东同志这一天才的战略思想的原故。

“论纸老虎”这一文献对于我们是一个具有无比威力的武器。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我们学习它，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它鼓舞我们也鼓舞全世界人民加强了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伟大祖国的广东”一书编写工作正紧张进行

以总结建国十年来广东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为主，并介绍广东的地理、人文及历史概况的“伟大祖国的广东”一书的编写工作，已经在中共广东省委直接领导下积极进行。本书将既是十年来广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伟大成就的总结，又是一本新型的“广东省志”。

全书预定分为六编，第一编：广东省的概况；第二编：广东省的历史；第三编：广东省的民族；第四编：广东省的华侨；第五编：广东建国十年来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就；第六编：广东省人民公社化运动。全书约六十至八十万字。

中共省委宣传部为动员和组织力量进行本书的编写，曾于10月20日召开了会议，会议由吴南生副部长主持。广东省科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杜国庠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编纂委员会，并由编委会组织编辑部，负责具体工作。编辑部按全书分编设立六个编辑组，负责各编的编写工作。

目前，全书编写的准备工作，正紧张进行中。预定明年二月完成初稿，八月出版。（沛）

学习“毛澤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的体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 何小林
駐广州部队某部

我人民解放軍是英雄的部队，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自教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曾經亲手打败了国内外反动派，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經歷过長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的广大官兵，对于毛主席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这一英明論断，有着深刻的亲切的体会。正因为这样，我人民解放軍长期以来，在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斗争中，始終是斗志坚强，信心百倍，敢于同看来是十分凶惡的敌人較量，敢于争取最大的胜利。这次我軍广大官兵，联系自身斗争經歷，学习了毛主席“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这伟大的政治文献，更进一步发扬了革命英雄气概，振奋了斗争精神，解放了思想，更加仇視和藐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更加增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解放台、彭、金、馬的决心和胜利信心。

毛主席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这一重要文献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我这里仅就我們这次学习，联系我軍光輝的斗争历史，对怎样認識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等問題，談談下面的几点体会。

首先，必須認識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信代表腐朽势力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沒有前途的，它們有如夕阳西下，而一切革命力量則如旭日东升，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最終一定取得胜利。毛主席对“紙老虎”的分析，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的邏輯的。搗混，失敗，再搗乱，再失敗，直至灭亡，这是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斗争，失敗，再斗争，再失敗，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是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规律。这个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帝国主义必然死亡，人民必然胜利，这都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的。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逃脫不了这个历史注定的命运。这是我們認識反动力量和革命力量的最根本的观点。用这个观点去分析形势，就能看得远，看得

深，看得正确。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和一切敌人进行斗争的。当我軍初建时期，在井崗山上，力量很小，枪炮也很少，飢寒交迫，却在祖国的大地上树立起不倒的紅旗，对抗着看来比自己强大数十倍数百倍的敌人而毫无惧色。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号称世界头等强国之一，我軍也满怀信心地以小米加步枪与之斗争，最后把它打败。解放战争时期，蔣介石曾經拥有以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几百万軍队，統治着中国大部分地区，看来气势汹汹，但是我們並沒有因此而被吓倒，我們同它进行了頑强的斗争，七斗八斗，最后把它打垮。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帝国主义一面揮舞着原子弹吓人，一面以侵略軍七十万之众和现代化的海空軍的绝对优势，疯狂北进，直逼我国东北边境。麦克阿瑟叫嚣要在感恩节（即11月23日）結束战争。可謂气焰万丈，不可一世。而在那时候，我人民志愿軍既无一架飞机，也无一輛坦克，而大炮也远远少于美軍。这就使得那些害着“恐美病”的或缺乏政治远见的人，曾經怀疑我們是否会着火烧身，有不免一敗的危险。但是，以毛主席的藐視一切敌人的战略思想所武装起来的人民志愿軍战士，却把美国侵略者看得十分渺小。他們雄糾糾，气昂昂，跨过了鴨綠江，英勇地打击敌人，結果使美国侵略者遭受到“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失敗”（美国的自供）。連美国侵略战争統帅克拉克也不得不承認：“我是美国第一个在沒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將軍。”在这次学习毛主席的文献中，一位曾經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軍指揮員說：“我們出国打第一仗时，和美国王牌軍騎兵第一师交了鋒。我們俘虏了一批美国兵，当时他們还很驕傲，不服輸；到了第二、三次战役，美国兵就被我們打怕了，一碰到我們就吓得屎滾尿流，調头就跑。”

在这次学习中，我們进一步体会到由于我軍指战員認識了社会发展规律，坚信帝国主义和一切反

动派最后必然失败，革命力量最终必然胜利。因此，无论在什么条件下，碰到怎样凶恶的敌人，处境多么恶劣，都能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敢于藐视敌人，在斗争中勇往直前，一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第二，必须认识反动势力的一时猖獗，并不表示它的强大，只是表示它的软弱，表示它的接近死亡。反动派对于人民的疯狂进攻，不仅不能压倒人民，相反只能促使人民掀起更广泛更激烈的革命斗争。毛主席在文献中告诉我们：敌人的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反动派的疯狂和猖獗，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某些暂时的困难和挫折。这看起来是坏事。但是反动派这样做，就暴露了它的丑恶面目，这可以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促使人民群众加强团结，逼使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并在艰苦斗争中得到锻炼。这样，坏事又变为好事了。毛主席把反动派这种疯狂挣扎，叫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认为，这是认识反动力量和革命力量的又一个根本观点。用这个观点去分析形势，就不会为暂时的现象所迷惑，能够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不悲观，不气馁，而且能够变不利局势为有利局势，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积极争取革命的胜利。

在我军三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无数的事实证明了这条真理。远的不说，如在1947年，即解放战争初期。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划下，蒋介石曾集中了一百多万精锐部队，在西北战场侵占了我革命圣地延安；在山东战场侵占了战略要地烟台。这时候，蒋介石得意忘形，以为这是它的了不起的胜利。但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蒋介石占领延安，不是他的胜利，而是它走下坡的开始。我军主动放弃延安，不是什么失败，而是战略反攻的开始。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党中央和毛主席之所料。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过也说明了这一点。当美国强盗杀到鸭绿江边的时候，它是何等猖狂，何等嚣张。但是，敌人的凶焰没有吓倒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相反地，激起了全国人民汹涌澎湃的抗美援朝的怒潮，结果使美国蒙受了历史上空前的惨败。以这种观点来考察今天的世界大势，我们可以断言，美国在台湾海峡调兵遣将，张牙舞爪，只不过是说明它的外强中干，垂死挣扎。这正足以激发我国人民奋发图强，促使我国人民以更大的干劲，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发展的结果，又必然是东风越刮越强，西风越吹越弱！至于日本岸信介政府的猖獗，法国法西

斯头子戴高乐的上台，他们都是在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它们的寿命是不会很长久的。

我们人民解放军在长期斗争中，特别深刻地体会到反动派愈猖狂便愈接近死亡的道理。每当反动派向人民发起进攻，使革命力量遭遇严重的困难和挫折时，我人民解放军却发扬了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以最大的勇气和毅力，克服了普通人难以忍受的种种困难。有时甚至处于粮尽弹绝的险恶情况下，也丝毫不会悲观失望，愈困难，愈英勇，愈顽强。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举世闻名的长征道路上，我们红色的战士们吃树皮，吃草根，过雪山，越草地，没有一个人叫苦，反而顽强地斗争，直至取得长征的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最可爱的人，一口炒面一口雪，生活条件很艰苦，但都谈笑风生，满怀信心地狠狠打击美国强盗。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使我们认识到，革命力量弱小是暂时的，它必然要由弱到强；革命的失败、挫折也是暂时的，它必然要由失败走向胜利。而反动力量则与此相反。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规律。

第三，必须认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武器在战争中是有作用的，特别是现代化武器，如原子弹、氢弹等有很大的杀伤力。但是，包括原子弹、氢弹在内的一切武器，都不能最后决定战争的胜负。决定战争胜负的是战争的性质，是广大士兵群众和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智慧，并不是武器本身。毛主席在文献里告诉我们：敌人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只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从这个观点出发，毛主席还在原子弹刚刚出现并且为美帝国主义所垄断的时候，就以“纸老虎”来嘲笑他们，毛主席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我们看到，古今中外，所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者，被打倒的侵略者，几乎都是手里掌握有最精良凶恶的杀人武器的，但取得胜利的却常常是开始时手无寸铁的革命的人民群众。这是因为人民代表着正义，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认识这个观点十分重要。因为今天还有一些人，在谈到我们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时，常常只看到美国有原子弹、氢弹，看到美军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强，看到美国有一亿吨钢，就有迷信武器和畏惧的心理。不彻底破除这种迷信，不彻底克服这种畏惧心理，是根本无法正确认识反动力量和革命力量这个问题的。

我们人民解放军在自己的斗争历史上，用千千万万的事实证明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

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由于掌握了这条真理，使得我軍無論在什么时期，無論面对持有什么样凶惡武器的敌人，都敢于摸它們，碰它們，最后把它們打敗。在我軍初建时期，我們手上拿的是梭鏢、大刀、土枪和木棍，而我們的手对手国民党反动派，却拥有飞机、大炮、坦克、机关枪。但我們敢于碰它并且經常战胜它。在解放战争中我們依靠两条“飞毛腿”經常战胜拥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敌人。我們常常用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神兵天降似的行动歼灭敌人，当时流行着这样两句話：“别看敌人汽車跑得快，賽不过咱們两条飞毛腿”。事实确是这样，国民党有那么多的美式装备，但无法逃脫失敗的命运。在伟大的朝鮮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并非有一亿吨鋼的美国，而是那时还只有几十万吨鋼的中朝人民。举世聞名的上甘嶺战斗中，敌人向我仅有3.7平方公里的陣地傾瀉了炮弹190多万发，炸弹5,000余顆，把山头削低了两公尺，把石头炸成了粉末，但是我軍陣地仍然屹立如泰山。在空中战中，美国自恃飞机多，經常一天出动1,000多架次。他們的飛行員都是飞过四五百小时以上的老手，有大学生，有博士，还有什么“双料王牌”，而我們当时不仅飞机数量比美国少，而且飛行員多是新手，还缺乏空战經驗。然而，由于我們的英雄們从本質上看穿了敌人是外強中干的紙老虎，因此，在战斗中英勇頑强，毫不畏惧，許多飛行員一发现敌人，就咬住不放，而胆小的敌人，一发现我們，調头就跑。有一次，飛行員馬保堂一个人就击退了十二架美国飞机，“美国之音”不得不在广播中承認：

“共产党初出茅蘆的飛行員太狠了！”是的，这是因为我們相信决定战争勝負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所以能發揮最大的能动性，狠狠地打击敌人。

我們还認識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不仅在人口众多、人心向往方面，大大地压倒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而且苏联早已掌握了核武器，并且在某些最重要的軍事科学技术方面，例如洲际导弹方面，已經远远地跑在美国前面。在这种情况下，再害怕美国的什么原子武器，那就是患了不可药救的軟骨病了。

第四，在如何对待紙老虎的問題上，我們的体会是：必須坚决斗争。因为只有坚决地进行斗争，才能戳穿紙老虎的本質，把革命事业推向新的胜利。用我們战士的話來說，对付紙老虎就是要勇敢地“摸”它，狠狠地“通”它（用刺刀去刺它）。只有敢于亲手去“摸”它，敢于亲手去“通”它。才会发现它原来是紙做的，而不象他自己吹噓的

那样厉害。这些話，可以說是我們几十年来和紙老虎打交道的經驗总结。毛主席在文献中說，反动派是頑而不固的，我們理解这是指頗为頑固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实际上非常脆弱，而且很快就会死亡。但这要有个条件，这就是人民的斗争；不进行斗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会自行死亡的。

怎样斗争呢？文献告訴我們，就是在战略上藐視敌人，把敌人看作紙老虎；在战役、战术中又要重視敌人，把敌人当鉄老虎打。毛主席教导我們，在藐視敌人和重視敌人的辯証法关系中，首先在战略上要藐視它，才能在战役和战术中重視它，力争胜利。我們人民解放軍就在毛主席这个光輝燦爛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我們由于看清一切反动势力必然要灭亡、革命势力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所以在自己还很弱小的时候，就敢于喊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雄伟口号，完全不把敌人放在話下。但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战斗中，我們十分重視敌人，絕不輕敌麻痹，在打仗之前，我們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对敌人进行仔細的研究，并且集中比敌人优势的兵力，給予各个击破。許多經驗証明，在具体斗争中的任何輕敌麻痹，必然造成革命的損失。只有在具体战斗中重視敌人，充分摸清敌情，反复研究怎么样打，并作詳細的部署，我們才能在各个战斗中战胜敌人，削弱敌人，才能通过一个一个的胜利，最終打敗敌人。

除了以上的这些体会，我們还認識到要正确認識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这个重大問題，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必須站稳无产階級立场，树立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長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告訴我們，最懂得毛主席战略思想，最敢于藐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和最坚信革命力量必然胜利的人，是共产主义信念最坚决、无产階級立场最坚定的战斗英雄。董存瑞、黄繼光不朽的英雄事迹，很好地說明了这个問題。在战斗的紧急关头，董存瑞双手举起药包，炸掉敌人堡壘，牺牲自己取得战斗的胜利；黄繼光用自己的身体扑向敌人的碉堡，打开部队冲锋的道路，这是因为他們最强烈的仇視敌人，藐視敌人，相信自己的力量无敌于天下，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而那些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人，从来就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鼠目寸光的小人。因为他们看不到无产階級革命的大事业，只看到个人利益，看到自己的老婆孩子，怕死、怕苦、怕困难是他們的致命弱点。因此，正确認識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問題，固然是思想方法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立场的問題。

从“論紙老虎”学习毛主席的科学預见

陈 一 百

在学习毛澤东同志的“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这一政治文献中，觉得有一个貫串着整个文献的特点，那就是毛澤东同志的高度的科学預见性。从文献里，我們可以看到毛澤东同志在过去各个革命时期所作的預言，无一不被后来的客观事实所証驗。不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这个普遍性論断被証明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和这一总的論断不可分地密切联系着的关于各个方面的个别論断也被証明是完全正确的。

我們看到，在1945年当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召开国民大会来进行反人民的阴谋活动的时候，毛澤东同志就向他們提出警告，預言这就是“他們准备把一条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历史的邏輯將把他們推到自己所設想的反面。”果然不出四年，預言就完全应驗了。在差不多同一时期，毛澤东同志也曾对正在推行“赫尔利政策”的美国政府提出警告，指出如果这种政策繼續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入中国反动派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变成自己的千斤重負。时至今日，美国政府在当前台湾海峡局势中所处的尷尬地位，成了这个預言的最好的証物。“现在美国操縱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这是毛澤东同志在逆流高涨的1937年春天說的，証以一年以来美国在联合国中的日益孤立，控制失灵，众叛亲离的迹象愈著，說明这个預言已在逐步实现之中，而終必于完全实现。台湾反动派認为依附美帝就可以永远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就可以長久偏安于一隅，历史將証明这是最大的愚蠢。美国由于广設軍事基地，到处制造紧张局势，將迫使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群起而攻之，不啻是把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終將被各国人民所絞死，寿命不会很長，这是毛澤东同志今年八月作出的新的論断。在这里，毛澤东同志不仅預告美帝的死亡，而且还指出美帝加速死亡的道路和历历如繪的复灭图景。

毛澤东同志的一切論断，都是对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不利的，然而它們都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正确反映，是科学的推理与判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这一切违反敌人主观愿望的論断面前，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反动派都將由发抖而陷于精神癱瘓。我們要讓投靠美帝迷途未远的人們在一震之下及早回头；我們也要讓一切迫切要求民族独立解放的国家在毛澤东同志种种論断的启示下愈益加强战斗的意志；还要使全中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結在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作为一种无比坚强的政治武器，这个文献的发表，对于革命和反革命这两种对抗力量，正在起着深刻的作用。

我們从多次的历史事实，以至从血的教訓中，坚定不移地相信毛澤东同志这一切的正确的預见，以毛澤东同志所作的一切論断作为我們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的思想武器。但我們还必须学会毛澤东同志能正确預见事物进程的这一套本領，这样，我們就能够更自觉地运用这一思想武器，能够在革命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作用。

为什么毛澤东同志和其他伟大的革命导师一样，能有高度的科学預见性而我們却往往表现为鼠目寸光呢？我們通常很容易把这归結为观点与思想方法的运用問題，而忽視了阶级立场在認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不容置疑，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思想方法的建立，是正确地認識客观世界的必要条件。毛澤东同志正是处处掌握着变化发展的观点，阶级斗争和对立面相互轉化的观点，特别是人民群众創造历史的观点，才能够从敌人的强大中看到它的脆弱，从革命的暂时挫折中看到將来的胜利，在原子武器和軍事基地之外看到人力与人心，在錯綜复杂的关系中分辨事物的主要与次要，主流与逆流，现象与本質，从而預见到整个革命的进程。毛澤东同志正是在思想方法上充份掌握了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相統一的辯証关系，才能在

树立人民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和决心，以便在实际工作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加速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这就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了。暨南大学副教授丘陶常说：认真学习 and 宣传毛主席这一经典性的论著，戳穿美帝国主义这只纸老虎，长人民的志气，灭帝国主义的威风，将进一步鼓舞我国人民赶走美帝国主义、解放台、澎、金、马的斗志，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雄心；也将鼓舞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解放斗争胜利的信心，加速人类解放事业的胜利。广州驻军杨海水中校谈到他学习毛主席的文献的感想时说：学习这个文献，不但使我校系统的回忆了我军的革命历史，而且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我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必须刻苦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永远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

在谈到新生的力量必然战胜腐朽的力量这个问题时。丘陶常副教授指出：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不论它的力量多么强大，外表多么凶恶，终究要碾毙在历史的车轮下。丘陶常副教授列举了大量的中外历史事实说明这一真理之后说：当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还处在劣势，表面看来还很弱小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说明革命力量有无限发展前途，最终一定取得胜利，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主席英明的预见。曾经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工作的中山医学院教授罗伯诚，也就他的切身经历，谈他对新生力量必然战胜和超过腐朽力量这一真理的体会，他说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们抗美援朝医疗队的医疗设备和物质条件虽然很差，但是却在医疗上战胜了敌人，超过了美帝。例如当时我们虽然处在用汤匙当手术器材的恶劣的物质条件下，但能医好90%以上的伤俘，而且其中70%以上在前线医疗站就医好了的；而美帝虽然拥有较好医疗设备和物资，但是医疗效果很差，连普通的轻伤也治不好，往往对四肢受点轻伤的伤号，也要动大手术把手或脚割掉。又如：敌人在几次战役失败后，穷凶极恶地对我方进行细菌战，最初我方虽然没有经验，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细菌战。我们所以能在医疗上超过敌人，战胜敌人，是因为我们代表正义，代表进步力量，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援；而美帝则代表腐朽的力量，遭到人民的反对。

在座谈会上，到会者着重谈了帝国主义和一切

反动派都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这个问题。曾经在朝鲜战场上亲手打败美帝的杨海水中校说：“我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我是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见证人。1950年我人民志愿军刚开过江，就碰上了美帝王牌军骑兵第一师，它们拥有现代化装备；而我们只是步枪加手榴弹，炮很少。但是我们毫不害怕，只考虑怎样以劣势装备战胜敌人，为祖国人民争光。我们乘“十一号汽车”从山路、小路迂回进军，用十二天时间，赶到元山地区，速度赶过了敌人的汽车；在黄草岭以少部分的兵力，堵住了优势的敌人的退路，让我军主力围歼敌人。当时我们边筑工事、边战斗，用手榴弹、刺刀和其他轻武器就同敌人干起来，我们没有反坦克炮，八连战士用炸药干掉敌人的坦克。我们就是这样取得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在第一次战役后，美帝为了挽回它的失败，利用它的空中优势，用“绞杀战”和“破坏战”来阻止中朝人民军的前进，但我军在毛主席光辉的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应用近战、夜战，以少量精干部队突进敌后和组织对空射击等战胜敌人。这样，我军一次一次战役的胜利，就一次一次的使美帝国主义显出了纸老虎的原形。美帝强盗，当它遭到几次失败以后，就凶残恶绝，进行细菌战，妄图利用细菌武器来挽救它的失败。但是在中朝人民的支援下，全体指战员开展了卫生防疫运动，粉碎了敌人的细菌战。敌人利用细菌武器表面上看来很凶恶，实际上正是它虚弱的表现，因为它们已经不得不依靠苍蝇、蚊子和老鼠来打战了。这也最清楚地表明美帝国主义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杨海水中校还进一步指出在朝鲜战争中，我们所以能够以劣势的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美帝国主义的原因。他说：毛主席的文献告诉我们，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而不是武器。由于抗美援朝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我们得到中朝人民和以苏联为首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援，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关键。广东师范学院副院长阮镜清，以他耳闻目见的事实，论证帝国主义已经日暮途穷，气息奄奄。他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英国经济一片衰落，危机日益深重，它的工业生产，特别是制造业一蹶不振，轻重钢材和马口铁等缺乏订货，有色金属和水泥等建筑材料产量急剧下降，企业开工不足。在出口贸易方面也危机重重，汽车的国外市场受美国的排挤，飞机市场被西德挤跨。这一切不仅加深了英、美及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且加剧了英国国内的经济危机，加深英帝国和殖民地之间矛盾。这一切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

量。阮副院長根据这些情况說明：帝国主义已是日薄西山了，而我們祖国則旭日东升，前程万里。现在看来，我們很快就可赶上英国。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黃剛教授从另一方面來說明帝国主义势力日益走向沒落。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日益瓦解。中国、越南、朝鮮人民革命的胜利，給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印度、印度尼西亞、緬甸、埃及、叙利亞、加納等一系列殖民地附屬国，先后脱离帝国主义而独立，进一步动摇了帝国主义后方，埃及反抗英法侵略的胜利，伊拉克人民革命的胜利，以及如火如荼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都准备着帝国主义的复灭。所有到会者的发言，都說明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紙老虎。

在談到怎样对付紙老虎的問題时，杨海水中校說：我們摸透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脾气，它們总是要装腔作势，以老虎的形态来吓唬人，有时，甚至显得很疯狂，但是它們都是欺軟怕硬的家伙，对付这样的家伙，首先要在战略上藐視它，敢于同它

作坚决的斗争，給它以迎头的痛击，才能使它老老实实。但是，我們决不能因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紙老虎，在具体斗争上也輕視敌人，粗心大意，相反，我們在具体問題上，具体斗争上，要重視敌人，把紙老虎当作鉄老虎来打。在战略上要藐視敌人，在战术上則要重視敌人，这是毛主席教导我們的战略和战术的辯証統一观。我們必須牢牢地掌握住这个思想武器。曾經到过朝鮮战场的中山医院护士余传苏也說：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須首先在战略上藐視敌人，这样，才不致被貌似强大的敌人吓倒，才能树立坚定的信心和决心，争取革命的胜利。同时，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脱离人民，与人民为敌。它对內压迫和剝削本国人民，对外侵略和奴役弱小国家人民，它到处遭到人民的反对，最終必然为人民所战胜。所以我們完全有根据藐視它。但是在具体問題上，我們又要重視敌人，时刻对敌人提高警惕，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阴谋挑畔。

（本刊記者整理）

广州各高等院校开展教学改革

自从今年八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會議关于党的教育方針公布后，广州各高等学校就积极根据本身在整風期間和整風結束后初步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改革的具体情况，分別进行部署。各校师生在积极学习党的教育方針，初步大鳴大放辯論后，紛紛下乡参加生产劳动鍛煉。目前各校又再次展开关于教育方針的学习，并要求在思想認識上搞通搞透之后，再进一步对教学計劃，教学大綱、教学方法等作彻底改革，建立起新的教学制度，并編出新的教学計劃和教学大綱，訂出跃进計劃迎接国庆十周年。例如中山大学目前正要求各系总结三个月来全校师生参加生产劳动实践的經驗，結合本单位实际問題，抓住有关教育方針中所提出的問題，如教育必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須与生产劳动相結合，教学和科学研究必須贯彻群众路綫和理論与实践的关系等等問題，开展大鳴大放辯論，务求搞透思想然后进入具体問題的改革工作。华南师范学院因各系参加教学实习和生产劳动的时间不同，分別在各系先后展开教学改革工作，在鳴放辯

論后，要求根据形势改革全部教学計劃和大綱，以符合三年內完成原来四年应学的内容并提高質量的要求。各系除一面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外，一面发动群众由师生动手編制教学計劃和教学大綱。例如教育系已編出并定稿的有教育史、兒童教育心理学等六个教学大綱，全是学生集体訂出来的。全院还开始实行了教学方法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即开始試行集中教学的方法，將某一課程集中在数周內授完，然后再集中学习另一課程。如中文系三年級本学期就試用这一教学方式，用六周的时间集中講授中国现代文学这一門課。适应着这种集中教学，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也相应有所改变，现在是采用教师启发、同学討論、最后教师总结的方式。初步总结，認为这种集中教学的方法有很大好处，如便于組織大鳴大放，同学有充分时间閱讀参考書和作业准备，便于进行課外教学（如調查、訪問等），教师可以充分发挥集体力量集中力量下班輔導和领导討論，提高教学效果等等。广州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工作，目前正在深入发展中。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問題的討論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問題的一些意見

何 城

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問題，我没有什么研究。刚好昨天所屬的学习小組討論了一次，会上大家爭論了一番，自己这才零零碎碎地考虑了一些問題和看法。作为問題，不一定有意义，作为看法，肯定是很粗浅的和可能是有錯誤的；现在提出，是为了听取指教。

按劳取酬是不是资产阶级法权？

按劳取酬作为一种分配原則，原是屬於生产关系范畴的問題。它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則。这个原則变为法定的制度，成为“按劳分配”的法权，則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法权。有人肯定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原則，又肯定与之相应的按劳分配的法权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但是却承認这个法权是社会主义的法权，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有人說“按劳取酬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我認为这是不正确的。旧社会什么时候有过这个东西呢？根本沒有。不仅在事实上沒有过，甚至连口头上的也沒有过。連打起所謂“自由契約”“等价交换”旗帜的资产阶级，也沒有这样提过。說“按劳取酬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就有所謂美化旧社会，美化剝削階級的味道。

在这个意义上，亦即就其整个的整体的意义上来看，說按劳取酬或按劳分配的法权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不正确的；而且說它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

或资产阶级式的法权，严格說来，也是不正确的。旧社会中所沒有的东西，资产阶级法权中所从未存在过的东西，怎能說是它們的残余呢？怎能說是它的式样呢？

然則按劳取酬同资产阶级法权毫无关系么？那当然不是的。

按劳取酬，由于采取了調节商品交换的“等价交换”原則，劳动者便有按照“等价交换”原則領取报酬的“平等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正是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或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或有引号的“资产阶级法权”；这三者可視為同义語，互相通用，不过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如果包括意識形态方面的在內时，涵义就广泛一些），因为它并不能完全消除人与人之間的不平等，而是保留了这种不平等。就在这里，按劳取酬制度还保留着或包含着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即是說某些资产阶级法权仍以残余的形态保留在按劳取酬这一社会主义制度之中。为了方便起见，省去“以残余的形态”，就說“在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制度中間实际上还保留着某些资产阶级法权”①，应当說也是这个意思。

现在再进一步对按劳取酬的內容具体分析一下。

按劳取酬制度所依据的原則有二：第一、“不

① 胡繩：从供給制說起，（11月13日人民日报）

“劳动者不得食”。这个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同时也适用于共产主义。这个原则同资本主义的以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分配原则，是根本对立的。第二、在劳动报酬的数量上，实行“等价交换”原则。这同共产主义实行各取所需是不同的，而同资本主义则既有不同，又有相同。相同的是都实行“等价交换”原则。不同的是：按劳取酬，是真正按劳动者付出的劳动来等价交换，虽然由于部分产品归社会公有，所以劳动者不能全部取回与所付出的劳动完全等量的产品，但能够按照所付出的劳动正比例地领取报酬，而产品的公有部分，则属于全体劳动者，即是说，这是真正的等价交换；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等价交换”，实际上不是以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去交换产品，而是以劳动力去交换，这样“等价交换”就成了剥削剩余价值的掩盖物，即是说，这是假的“等价交换”，它的“原则和实践”是“互相矛盾”的。这种区别，也是根本的区别。它表明了：在按劳取酬制度中，等价交换虽然原来是资本主义的原则，但已经被改造过来，等价交换的“平等的权利”，也已经不是原封不动的资产阶级法权。所以列宁在指出“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社会主义原则之后，又指出“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也是社会主义原则。但是就在这个原则中，由于它仍然包含着同资本主义相同的方面，因此它仍然包含着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这也就是列宁接着指出的：“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不同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的法权’”。①

人们往往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证明“按劳取酬在原则上是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其实马克思并没有这样说，也没有这种意思。马克思只是说：“这里平等的权利在原则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式的法权”。②接着马克思就指出“原则和实践在这里不再互相矛盾”。就是说，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在生产资料被资本家所垄断的基础上实行的所谓“平等的权利”所掩盖的那种阶级剥削、阶级间的不平等的事实，已被消除。（在这段话之前，马克思就已指出，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内容和形式在这里（指按劳取酬制）都改变了”。）然后，马克思又说：“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有一方面还仍然受资产阶级范围的限制”。是那一方面呢？马克思指出：“这个平等的权利，对于不同等的劳动是个不平等的权利”（语中的着重点是本文作者加的）；虽然“它不承认任何的阶级差别，”

但是，基于人的劳动能力的差别而形成的权利上的不平等，以及由于家庭生活负担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的不平等，还是没有消除。这种不平等，同阶级的不平等有根本的区别。仅在这一方面，按劳取酬才保留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

马克思这些分析同列宁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分析也都表明：按劳取酬就其整个来说，不但不是资产阶级法权，而且也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但是它保留着或包含着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有的人认为：按劳取酬同资产阶级法权完全是两回事，相互间完全没有关系，“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是指我们目前在计算劳动的质量和数量时，某种程度上因袭了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因而不利于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逐步消除。”这也是不正确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是存在于按劳取酬制度的内部的，只要实行按劳取酬，基于劳动能力的差别等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无论你怎么政治挂帅，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话又说回来。在按劳取酬制度所依据的两个原则中，前一个即“不劳动者不得食”虽然更具根本性，但是后一个即“等价交换”却构成了这个制度的主要特征。今天我们说，部分供给制开始突破按劳取酬的范围，显然不是指突破前一原则而是指突破后一原则而言。又如，按劳取酬所产生的不平等现象，只是来自它里边的“平等的权利”，但是我们却说：实行按劳取酬，不平等仍然不能避免。反之，这种不平等的消除，也就意味着按劳取酬制度本身的消失。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有时也为了方便就把按劳取酬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我想也是容许的。但是在指出按劳取酬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的同时，完全不敢正面承认在全体的意义上它是社会主义法权，则也是不对的。

我们不主张咬文嚼字，但是概念的准确性也是很重要的。在特定的意义上才可以称作某某的东西，笼统地称之为某某，往往会引起混乱。即如有时笼统地把按劳取酬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虽也可以容许，但应注意场合，最好是不这样说。概念的混乱，往往来自思想的混乱，同时也往往引起思想的混乱和实践的混乱。这种例子可以举很多。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

② 马克思：论共产主义社会，94页。

比如說：有人認為把按勞取酬說得越臭越好，就未嘗同把它說成資產階級法權無關；有人認為按勞取酬是舊社會來的，就很可能從它是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這種說法推論出來的；有人把工資制看成等級制，恐怕就有下面這個公式來作根據：工資制就是按勞取酬，按勞取酬就是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法權就是等級制，所以工資制就是等級制；如此等等。概念的不斷精確化，是實踐向前發展所提出的要求。尤其在某種理論思想需要普及到廣大群眾中去的時候，就更有必要在運用概念時力求把它弄得準確些。

有人說：說按勞取酬制度是社會主義法權，又說它包含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豈不自相矛盾？又有人說，這樣豈不是把它絕對化、神聖化、永恒化么？

其實，社會主義本身並不是絕對的、神聖的、永恒的東西。社會主義社會由於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而來，保有資本主義的（或說資產階級的）斑痕，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東西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內部，成為它的有機組成部分；它的存在，並不妨礙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這種矛盾，是客觀的存在。不能把社會主義看作是“純粹的”東西。社會主義作為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有別於完全的共產主義，正是為此。也為此，這個初級階段實質上就是一個過渡的階段。它的制度，包括“按勞取酬”在內，也是過渡性的東西。所以社會主義秩序是不能永遠鞏固它的。在興無滅資兩條道路鬥爭的意義上，要不斷鞏固社會主義陣地；但在基本鞏固（基本解決了兩條道路鬥爭問題）之後，就又要鞏固它（繼續完全解決兩條道路鬥爭），又要適時地開始突破它、改造它——向着共產主義的方向。這一點正同不能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是一樣的。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有点忽視和不够明確的。

從所謂“法權”來說，那末只要法權存在一天，它就不可能不帶有不平等的因素。馬克思指出：一切權利都是種不平等的權利。為了保證法權（不管是什麼法權）的實現，就必須要有國家政權。列寧說：“因為如果沒有一個能夠迫使人們遵守法規的機關，權利就等於零”。^①由此可見，除非連社會主義法權也不存在，否則就必然這裡或那裡保留着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作為社會主義政治上层建築的一部分，社會主義法權也是要衰亡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徹底消滅之日，也就是社會主義法權衰亡之時。從這裡也可看出，承認按勞

取酬是社會主義法權，並不排斥同時承認它保留着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也不是說它是“純粹的”、完美的、永久的東西。如果我們要最後消滅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現在就必須創造條件，使不可避免地保留着的這種殘余的社會主義法權（連同整個社會主義的政治上层建築一起）適時地經過適當的步驟，不斷削弱，不斷縮小其作用範圍，直至最後走向衰亡，完成向共產主義的過渡。

我國現社會的資產階級法權 殘余的具體表現問題

在我國目前的社會主義階段中，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是多方面地存在着的。產品分配方面資產階級法權殘余（表現為實行等價交換的平等權利的原則）的存在，使我聯帶設想：在生產關係的其他兩個方面是不是也有它的存在呢？我想是有的。在相互關係方面，表現為：有些規章制度（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正是所謂“處處講正規，事事分等級”，把職務分工絕對化，例如護士不能診斷、不能作靜脈注射，工人不能參加管理更不能參加設計，等等，諸如此類。在所有制改變（或基本改變）之後，人與人相互間的平等關係之所以不會自然地出現、形成，正是因為受到這些資產階級法權殘余的障礙之故。偉大的全民整風運動，主要地正是基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當然主要問題不止這一個）。但是這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至今還是存在的。在所有制方面，是否可以說，在集體所有制中間，就保留着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這表現為兩方面：一是國家需要經過等價交換才能取得這些“集體”所有的產品，亦即這些“集體”還保有這樣一種“平等的權利”；二是由於生產資料的“集體”占有，就造成了各個“集體”之間的不平等。（按勞取酬作為社會主義原則，在“集體”相互之間就不能貫徹。）此外，在公社化之前，生產資料私有的殘余也還存在。

在所有制、相互關係、分配三個方面所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作用是不同的。存在在相互關係方面的，根本不為社會主義所需要。在社會主義階段，工農之間、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加上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之間的

^① 列寧：“國家與革命”

差別，是還保留着的。但是儘管有這些差別及由此形成的分配上的差別（不平等）的存在，人與人之間相互關係上的不平等也決不是不可避免的，從而，它們的存在，也根本不提供利用這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的要求。在這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殘余的存在，只能妨礙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生產力的發展，因此是應當無條件加以破除的。

在所有制和分配這兩方面存在着的資產階級法權殘余，象上面所指出的那些現存的表现，在目前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是具有一定的積極性，有助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因而需要加以利用的。這又同在目前階段商品經濟連同等價交換原則和價值法則（這些都屬於生產關係的範疇）的存在還不可避免和還具有積極性，是密切聯繫的。所有這些還必需保留的資產階級法權殘余之所以需要保留的種種依據及其積極作用和局限性、消極面的種種表現（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工農差別等幾種差別的存在，物質利益原則的作用，正確處理農民同盟軍問題，同商品經濟的關係等等），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除了在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之外，在社会生活的其他許多方面，資產階級法權殘余也是存在的。例如在家庭方面，凡是家庭仍然作為一個消費單位的地方，就有可能找到家長制的殘余，等等。

在意識形態上，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的存在就更為廣泛。這也就是所謂資產階級法權觀念（或思想）。僅就前述在生产关系几个方面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殘余來看，在觀念上都有其相應的表現。即：1.把“等價交換”的公平合理性絕對化、神聖化，要求擴大報酬上的等級距離，要求絕對的等價交換；把物質利益原則絕對化，斤斤計較，“按酬付勞”論；等等。2.等級觀念，官僚主義，特權思想，地位觀念，不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輕視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資格論”，“權威論”，等等。3.私有觀念；本位主義，集體所有神聖不可侵犯的觀點，“富社吃虧論”；等等。

其他方面，當然還有很多，例如家長觀念，夫權思想，輕視婦女，等等。意識形態上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殘余，全部是我們破除的對象。當然這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但是一定要堅決地持續地進行。

關於實際上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凡是其中我們所不需要的、不合法的表現，都是資產階級法權觀念的直接產物，這種東西根本不包含（保留）在社會主義法權之中，而是要堅決加以消滅的；而我們還需要利用的那些，則既然是合法的，

因此它們以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的、被改造過的形態保存在社會主義法權之中。

關於如何對待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問題

關於如何對待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哲學研究”第七期“論破除資產階級法權觀念”一文，在這方面談得很好。這裡也提一點零星意見。

這裡說的資產階級法權殘余，不包括意識形態上的在內。資產階級法權殘余中，凡是已經毫無積極性和存在必要的，必須堅決破除。凡是在現階段還是不可避免的有積極性的就必需在共產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亦即政治掛帥）加以利用，以便一方面充分發揮它的積極作用，同時防止它可能產生的消極作用。因為它的兩面性是必然存在的，特別是在發展中，它的消極面將會更加暴露和增長。在具體掌握時，應當作具體的分析。這裡有一個最根本的共同標準，就是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是否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以人民公社化為標志的新階段的今天，強調以不斷革命的精神，來對待現有的制度，特別是它的資產階級法權殘余的方面，是十分必要的。以按勞取酬制度中保留的資產階級法權殘余為例，今天就應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和與此相適應的群眾要求，開始加以突破，以便進而採用適當的步驟使之逐步消除。這是主要的方面。當然，同時也要反對操之過急，超過當前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群眾覺悟程度的可能限度。有人說，社會主義建立之初（有的人甚至說解放之初）受到條件限制才不得不實行按勞取酬，似乎社會主義建立起來之後，很快就實行了。這種提法也是不正確的。

這裡想提一下對張春橋同志“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的看法。這篇文章的影響很大。它提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揭開了蓋子；它讚美了供給制和黨的優良傳統，批判了把物質利益原則和按勞取酬制度加以神化的觀點，主張政治掛帥；這些都是好的。但是在這篇文章企圖解決的主要問題即如何對待資產階級法權及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問題上，卻得出了錯誤的結論。它把物質利益原則和鈔票掛帥等同起來，把工資制和等級制等同起來，加以全盤的否定，這也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從這裡出發，它便猛烈地攻擊作者心目中的

所謂“資產階級等級制度”。這種制度，在我們國家里是真有其事嗎？當然沒有。不但一般的工資、待遇等差別不能視為等級制，就是工資、待遇的等級差別大了些，以及我們提到過的那些相互關係上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亦即等級制的殘余）仍然存在，甚至其中有個別表現得很嚴重，也決不能而且事實上沒有、在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下，在我們黨的正確領導下，形成什麼“資產階級等級制度”。文章的這一部分的思想實質，可以認為是濃厚的絕對平均主義情緒。文章的實際結論，則是要求立即取消（並且認本來早已應該取消）按勞取酬制度和物質利益原則。這也是錯誤的。綜上所談，對這篇文章的總的評價，還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我這樣想：沒有任何積極性和保留的必要性的那些資產階級法權原則（例如假的“等價交換”的假的“平等的權利”、等級制等）或其殘余表現，應當堅決破除徹底批判，把它搞得越臭越好。但是對那些利用其積極性並已經過改造才保留下來的資產階級法權原則（如真正等價交換的平等權利等），就不是一個搞臭與否的問題，而是承認其還有積極作用，同時揭露其局限性和消極面的問題。目前，總的來說，應當着重作揭露的工作。包含有這種殘余而從整体上說是社會主義法權的東西（如按勞取酬制度等），就根本不應當搞臭，但是也要指出它由於保留着資產階級法權殘余而具有的局限性和消極面；而這同前面說的揭露工作，實是一件事情。即使將來到了共產主義社會，評價今天的這些東西時，也不應當說它們是臭的；要這樣說，就違背歷史觀點。在這裡，臭的、也就是應該搞臭它的，是把其中的資產階級法權原則視為神聖的那種思想，亦即資產階級的法權觀念（如以為“等價交換”最“公平合理”等），以及由此產生的種種錯誤觀點和謬論（如物質利益原則第一、按酬付勞論等等）。

關於破除資產階級法權 思想問題

這個問題內容很廣泛，前面已略有涉及，現在主要談一談：過去為什麼沒有提出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及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問題？現在是怎樣提出的？主要要解決什麼問題？

過去沒有提出這個問題（沒有當作一個口號來提出），是不是過去就不存在這個問題，或者過去就沒有破除過資產階級法權和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呢？當然不是。整個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也就是一個推翻和破除作為資產階級政治上层建築的資產階級法權和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过程。在我們，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已經消滅了，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思想已經受到致命的打擊；去年的整風，對不平等的相互關係和等級觀念等進行了系統的破除工作，取得了基本的勝利。但是那時候一般都只是提反對資本主義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只是在這一次對分配制度提了新的改革的要求時，才突出地提出了資產階級法權和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問題，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可不可以說：過去所要打擊的那些資產階級法權（及其殘余）和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一般地提出對某某（例如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反對資本主義思想或資產階級思想的口號（加上一些具體的口號，例如反對等級觀念、反對官僚主義等），便有足够的動員力量、戰鬥力量；但是對今天所需要解決的分配方面的問題——即按勞取酬的過渡性、局限性和消極面的問題，却接觸到了資產階級法權的一個主要的特征，即在等價交換的平等權利原則下掩蓋着不平等；對此，一般地提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已嫌過於籠統，難於深入到問題的實質進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唯有突出地提出資產階級法權和資產階級法權思想這個問題，才能收到一針見血的效果。

由於改革分配制度，是當前調整生產關係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中心環節，因此，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工作，也應相應地以破除所謂“等價交換”最“公平合理”的觀念，揭穿這種“平等權利”的不平等性為中心。這又對於樹立真正平等待人的思想，清除等級觀念的殘余，大有幫助。更重要的是：以按“等價交換”原則領取報酬的法權思想來看待勞動的態度，正是自覺的、不指望報酬的共產主義勞動態度的對立物；破彼立此，刻不容緩。當然這又是長期的任務。當制度上的資產階級法權殘余還存在的時候，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全部徹底肅清，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它不僅還可以存在，而且還可以滋生，破了又生。但不能因此就不去破；相反的，更增加了破的重要性。要堅持不斷地去破，盡一切可能地去破；破了又會生，生了又要破。只有這樣做，才能為資產階級法權殘余的逐步削弱直到最終消滅創造必要的思想前提。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问题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基础等问题，现在没有什么争论，有争论的是关于它的特征的问题。现在最后才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原来没有从这个问题本身研究过它，而是从今天实践提供的经验出发，再回过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我这样想：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及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反了许多年，却到今天才把这个口号提出来，其中定有道理。我再想：如果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象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等级制度，那么整风中解决平等的相互关系问题、冲击等级思想及其实际表现的时候，为什么还没有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口号呢？而为什么现在又提得这样突出鲜明呢？于是就有了前一部分讲过的那种想法。然后通过这种考虑，我才形成了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特征的一种看法。

说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是等级制度，是过于笼统，也不确切的。因为等级制度是在所有阶级社会都存在的，也就是所有剥削阶级的法权共有的东西；为了表明不同的阶级法权的特征，就必须说明它的等级制度的特征，即什么样的等级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是等级制度，说了等于没有说一样。这是一。其次，共产党宣言说过：“在先前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差不多到处都可以看见社会完全分成为各个不同的等级，——可以看见各种不同社会地位构成为整整一串阶梯。”而“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掉阶级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来代替旧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亦即在阶级之间，仍然是不平等的，仍然是一种等级关系。可是“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即是说，资产阶级社会虽然仍然是等级制度的（不平等的，

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但这种等级制度却直接就是两个阶级之间的等级关系，即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关系，而不同于先前各个历史时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那种以社会分成各个不同等级，从而模糊了阶级关系的那种等级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以“等级制度”来表述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有别于其他阶级社会和阶级法权的东西），显然是不确切的；它不能抓住资产阶级法权的特殊的外部表现，更不能通过这个外部表现，再深入到它的内部，揭示它的实质，揭示它的外部表现同内部实质的矛盾。

有人说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是“自由平等”（原来是不加引号的）。这自然是错误的。即使补充说明那个“自由平等”是虚的，也不能改变这个提法本身的错误性。但是资产阶级法权确是以“自由平等”为旗帜的，就在这个旗帜后面掩藏着阶级压迫和剥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可是他们采取了“自由平等”的旗帜，决不是仅仅因为这些名词好听、得人心，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上的根源的。资产阶级法权中的“自由平等”，不过是掩盖着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的“自由契约”、“等价交换”原则的反映吧了。

从今天实践提出的问题开始，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问题作了如上的考虑之后，我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是：以虚的、作为所谓“自由契约”、“等价交换”原则所反映的“自由”、“平等”为旗帜，掩盖着阶级压迫和剥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资产阶级等级制）。这种提法，当然不一定完全确切，更不一定完整。这里再补充说明一句，我的意见，不是说可以为了今天实践的需要便不顾历史的客观实际去随意加以解释；我只是认为，对历史的实际揭露和理解得越深刻、全面、确切，以便在今天的实践中更好地利用这种知识，这就越有利于今天的实践。

談談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一些問題

李又華

資本主義的剝削，是以經濟強制的剝削，也就是剩餘價值的剝削為特點的。由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力成為商品，資本家按等價交換的原則購買了勞動力，而在生產過程中無償地奪取剩餘勞動的價值。因此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不平等關係，它不像奴隸占有制和封建制那樣露骨，而是比較隱蔽的。儘管資產階級從開始就打着“自由、平等”的招牌，這是十足的虛偽。實際上資產階級通過經濟強制的剝削，造成人們之間許多不平等和等級制，剝削與被剝削就是最大的不平等，但他們卻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外衣把這種不平等關係遮掩起來。資產階級法權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特別是其中的所有制關係的產物，亦即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產生資產階級的法權關係。而不平等和等級制，仍然是資產階級法權和法權觀念的特徵。

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也是向高級階段發展的過渡階段。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徹底消滅了資產階級所有制關係，這就從根本上銷除了資產階級法權的基礎。但社會主義畢竟是從資本主義的母胎中孕育出來的，它不僅在意識形態方面，不能一下子消除掉資產階級法權觀念的殘餘，就是在經濟上政治上也不可避免地還要保留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比如在消費品的個人分配方面，社會主義社會採取“按勞取酬”的原則。

由於社會主義階段的生產力還不夠高（對共產主義階段而言），消費品的生產還不夠豐富；商品交換還需要繼續存在；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也還不夠，因而對勞動的態度還不一樣等等。因此必需採取“按勞取酬”作為社會主義分配的基本原則。蘇聯和我國以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經驗，都證明了它的作用。社會主義的按勞取酬，不但根絕了人剝削人的現象；體現了“不勞動不得食”的精神；而且使勞動者從自身的物質利益去關心和加強社會生產的發展。但能不能說，它已經是完美無缺了呢？不是的，特別是隨着生產力發展的推移，它的

不完善就逐漸表現得明顯起來了。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是：社會按每個工作者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來給予相應的物質報酬。因而同等勞動得同等報酬，多勞就多得。從這一方面來說，它是一種平等的權利。但另一方面對於不同等勞動或雖是同等勞動而有不同家庭負擔的勞動者說來，實際又是一種不平等。因此，在按勞取酬的分配下，工資或勞動日報酬就有等級和差別，人們之間的物質生活，實際上存在着不平等的現象。這就是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馬克思說：“除了自己的勞動之外，誰都沒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供給”，“雖然有這種進步，但這個平等的權利有一方面還仍然受着資產階級範圍的限制”。所以它“在原則上仍然是資產階級式的法權”（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94頁）。是的，我們應該這樣來理解“按勞取酬”是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的問題。但有人認為“按勞取酬”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制度，不過利用它來為社會主義服務而已，因此“按勞取酬”是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我以為這是不妥當的。因為在剝削制度的關係中，從來不可能實現“按勞取酬”。在資本主義的剝削下，一方面是資本家不勞而獲，另一方面工人們頂多不過是“按力取酬”（即得到勞動力的價值）罷了。還有人把現行工資制的等級差別，混同於舊社會和資本主義剝削基礎上的等級制度，因此認為“按勞取酬”是資產階級的法權。這同樣是錯誤的。我們現行的工資制是有等級的差別的（無論是計時工資、計件工資、農業勞動日分紅制都是這樣）。但這種等級和差別是推翻了一切剝削制度以後所存在的一種不平等，它沒有任何剝削的成分在內，絕不能與舊社會的等級制度混同看待。因此對於“按勞取酬”是資產階級法權殘餘的理解，只能象上述情況那樣的“不平等”或“等級”的意義上去理解。超過這方面的意義，就會得出不正確的結論。有人感到奇怪，按勞取酬既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為什麼又是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呢？對於

這個問題，列寧已經回答得很清楚：“在第一階段，共產主義在經濟上還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還不能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傳統或痕跡。由此就產生一個有趣的現象，這就是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保留着‘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觀點’。”“其實，無論在自然界或在社會實際生活中，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新事物中有舊的殘余的情形。馬克思並不是隨便把‘資產階級的’法權塞到共產主義中去，而是抓住了剛從資本主義腹內脫胎出來的社會里那種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東西。”（國家與革命）我們知道，社會主義按勞取酬的分配，並不是“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按勞取酬所實現的是個人消費基金部分的分配，即是在扣除了每個人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以外的勞動所得的分配。這就使社會主義的整個分配，首先保證了社會主義生產和文化建設的迅速發展，保證了社會所有成員得到全面發展的可能以及對於未有或已經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免於困難的地步。同時又保證了每個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斷的提高。這樣，按勞取酬的分配制度，是基本上適合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但我們是要徹底消除資產階級一切殘余的，我們是要最終實現在分配方面不再有不平等現象的共產主義社會的。那麼，按勞取酬的分配制度就不是完美無缺的。

今年來生產大躍進的形勢表明，按勞取酬的分配制度對於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就是說，為求得生產的再躍進，必須逐步解決為在分配方面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殘余所限制的人們的生產潛力；同時僅僅依靠物質利益去刺激生產者的勞動積極性是不夠的，還必需依靠生產者的共產主義覺悟的提高，即依靠不計報酬地勞動、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無條件地工作的共產主義精神的提高。廣大農村實現了人民公社化以後，在分配問題上改變勞動日分紅制為各種程度的供給制加工資和獎勵的制度，這是一種重大的變化。吃飯不要錢，是農民幾千年來偉大理想的初步實現。使廣大農民群眾不再在主要生活問題上去操心了，生產的潛力挖掘出來了，群眾的共產主義勞動態度激發起來了。很多工廠的工人群眾，提高了共產主義思想以後樂於取消計件工資制，更加忘我地工作着。這就是說，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按勞取酬的分配制度，表現了它的缺點，必須有適當的改變。目前廣泛實行的部分供給制，它在一定範圍內已開始突破按勞取酬的資產階級法權殘余的限制。供給制是共產主義分配制度的一種萌芽，是破除資

產階級法權殘余的一種積極因素，它將是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可以肯定，在今後社會生產力更大的躍進和人們的共產主義思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這種部分供給制將會得到鞏固和發展，而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則將會進一步被削弱。我們的任務是大力發展生產，發展商品交換，使人民生活不斷改善，把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逐漸提高，積極準備條件來逐步和徹底破除在分配關係上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但有人認為現在就向共產主義過渡了，認為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已經是反動的了，就要徹底破除了。這種認識不能說是正確的。當然，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已不是象我們過去所想的那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但我們現在的任務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並為將來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作積極準備。其次，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對共產主義制度說來，當然是不合理的，因此資產階級法權殘余的逐步消失，是社會進入共產主義時代的重要條件之一。但還不能認為目前它就是反動的，因此就要徹底破除了。按勞取酬是社會主義分配的基本制度。我們現在已經人民公社實行的和今後國家機關也要實行的部分供給和部分工資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基本上仍然是社會主義按勞取酬的性質，只是在一定範圍內實現了平等供給，廢除了資產階級的法權。不但在城鄉之間，工农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勞動報酬還會存在着一定的差別，就是在每個勞動者之間也因熟練與非熟練勞動的不同，使收入的總額仍然會有一定的等級和差別，儘管這些等級和差別，比完全工資制或勞動日分紅制時代已大為縮小了。但是這種等級和差別在目前還有必要保持，它還有促進生產的作用。因此在這些問題上空想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是要加以批判的。

人與人之間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方面，整風運動以來，也進行了對資產階級法權殘余的衝擊。表現在生產的領導者和工作幹部積極掃除官僚主義的惡習；下田下車間直接參加生產勞動；領導者和工作幹部開始以普通勞動者的態度出現與直接生產者打成一片；腦力勞動開始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等等。因此殘留在生產中相互關係的不平等的現象，有了很大的克服（今後還要繼續克服）。真正同志式的互助協作的關係大大發展起來了。現在看得很清楚，舊社會和資本主義制度遺留下來的城市與鄉村的差別，工人和農民的差別，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的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這些生產中相互關係的差別，是資產階級法權借以存在的

条件。它們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妨碍的。我們的任务在于努力創造条件来逐渐消除这些本質的差別。

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单位和机关干部中，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整风运动以来，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还远远不够。在学术工作中，等級森严，权威垄断的现象还不少。認為科学研究只有專家才能做，助手和学生动不得。有的人对有限的知識和專長留一手，作为自己繼續保持高級知識分子地位的資本。有的人在对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貫徹上，还存在着“特殊論”、“浪費論”、“分工論”等抵触思想。輕視工农群众，認為工农群众不配学哲学学理論。抵抗知識分子劳动化的现象也还不少。这都是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作怪。在机关的某些干部中，不是以平等态度对人的现象还存在着。有的講地位、爭待遇、論資格等等。难道这些

坏思想不是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作怪嗎？我們的任务是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大立共产主义风格，大大提倡以共产主义精神对待社会主义事业。为了今天的社会主义和明天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須大力提倡自觉地不計較报酬地劳动，忘我地无条件地工作。只要所有的人都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它即將成为一种物質的力量，推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在政治上、思想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未結束，“兴无灭資”的任务必須貫徹。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必然有助于这种斗争的彻底胜利！

（編者按：何城同志和李又华同志的文章是11月30日广东經濟学会和本刊編輯部所召开的座談会上的发言，发表时經過作者整理和补充）。

广州举行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問題座談

广东經濟学会筹备委员会、“理論与实践”編輯部于十一月三十日联合举行“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問題”座談会。参加这次座談会的有經濟学研究工作者、教授和业务机关的負責人。会上广泛地討論了有关资产阶级法权各个方面的問題。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研究人員林新金、广州市財政人員訓練班副主任譚超白、中山大学教授李超桓、“上游”杂志社編輯何城、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科学文教处处长李又华等同志，都在会上发言，詳細地談了各自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問題的意见和看法，并比較集中地談到关于“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問題。发言中提出了一些新的、值得探討的意见。为了結合当前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从理論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参加座談会的同志，一致認為經常举行这种学术性的座談会很有现实意义。

广东經濟学会筹委会、“理論与实践”編輯部决定繼續就发言中的分歧意见举行第二次座談，并更广泛地邀請对这一問題有兴趣的同志参加，使座談会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第二次座談会将更集中地討論下列問題：一、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和特征？二、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有哪些具体的表现？三、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則是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还是属于社会主义法权？应该怎样正确地对待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則？

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体会座谈发言

十一月十七日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和本刊编辑部邀请了曾下乡参加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广州高等学校教授、中共广东省委中级党校教员、民主人士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交流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体会。现将会上的发言稿刊载于下：

鍾旭元（华南师范学院）

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是说政社合一，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学、兵五位一体。公是说进一步消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后残余，有些公社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实行了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目前人民公社虽然还是集体所有制，但规模比农业社大得多。一乡一社已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一县一社，则在更大程度上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

公社最突出的一点是它的分配制，目前的公社是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加奖励的分配制度。我们到黄埔公社调查的结果，确实证明该社下沙营全体社员在公社成立后普遍增加了收入，社员们的生活不仅安定，而且有显著的改善。

一九五六年，下沙只办初级社，所有收入全部分光，几乎没有公共积累，每户每月平均得24元。他们当时已经觉得很满意。

今年9月份成立公社后实行半供给制，每户平均得32元，增长33%，他们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目前黄埔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医药费补助70%，托儿所幼儿园不收费，儿童入学不收学杂费。这样计算起来，社员的收入的确比以前大大增加，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不久的将来，还实行包衣服、包婚丧、包文娛费，他们的生活将更加提高。

我们在番禺也作过典型调查，半供给制实行之后，农民收入普遍增加。根据礼村的调查：上中农郭礼，十口人，七个劳动力，1957年收入800元，

公社成立后全年总收入预计得1,613元，为1957年收入的201%，比以前增加了一倍有多。

贫农梁松，七口人，一个劳动力，1957年收入184元，公社成立后全年总收入预计得570元，为1957年收入的310%，比以前增加了两倍多。

公社成立之前，采取按劳分工分配制度，结果因为没有劳动力的儿童和失去劳动力的老年人没有分配社会产品的权利，造成超支户的存在。劳力少，负担大，不单生活困难，而且欠债多。会江社超支户贫农区权七口人，只自己劳动，1957年全年收入118元，副业收入45元，收入不敷开支，超支达到180元。一到年节，就担心不能还债，劳动劲头不大。有了超支户，就自然影响盈余户不能拿到他应得的工分值。这样，盈余户就不免埋怨，认为自己吃亏，替别人养孩子，劳动情绪也受到影响。

完全按劳动所得的工分取酬，也会造成贫富悬殊的现象。例如南浦东乡社贫农陈群妹六口人，劳动力三个，1957年总收入266.20元，平均每人44.37元。中农梁三根，七口人，劳动力五个，全年总收入975元，平均每人139元，比陈群妹富裕三倍。贫富悬殊也是一个矛盾，造成人与人之间经济上过大的差别，影响了团结，也必然影响到生产上的大协作。

公社成立以后，除了富社的个别劳力多人口少的农户可能减少一些收入，其余绝大多数农户普遍增加收入，所以这种分配制度为广大群众热烈拥护。这样不平等的贫富悬殊现象，长久不能解决的矛盾，都获得了解决。矛盾解决，就有利于大协作，促使生产力进一步向前发展。

万发云（华南师范学院）

这次我下到黄埔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只有四十多天，但看到不少新事物，也学习到不少东西。在实际工作中，深深地体会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也就更深刻地认识到党的领导的正确与伟大。

首先，我看到公社化后的农民，确实确实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我曾经参加过番禺的土改，但据土改后的情况看，由于那时还是土地私有，加上人们受旧社会旧思想影响很深，当时的农村两极分化是严重的问题。合作化后，两极分化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但由于入社的各种生产资料有折价分红，又有自留地，再加上劳动力的强弱和人口的多少不等，农民各户之间的收入还是相差很远（由其他各种原因，穷与富之间也有相当的差别）。农民生活上的贫富悬殊问题并没有因合作化而完全消除。如我们所调查过的姬堂旧村和碧山两个中队，1957年的超支户都在60%以上，（姬堂是比较差的队，所以超支户比别的队要多些。）由于劳动力少、小孩多或生大病而超支达到50元以上户数也约占20%。但公社化后就不同了，生产资料的折价没有了，自留地归公了，劳动力强弱之间的工资差别不很大，再加上吃饭等是供给制，并且供给部分将不断扩大，工资部分将不断缩小，这样，不仅彻底斩断了私有根，而且因为公社人多力量大，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战胜一切灾害，就更使全体农民真正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群众中生活上过分悬殊的问题。

其次，是人民公社劳动生产力获得空前的解放。不但由于生活集体化带来了妇女劳动力的解放，而且过去由于要评工记分，每晚要化不少时间。现在就可把评工记分的时间用来劳动和学习文化技术。同时，还由于吃饭是免费供给的，过去有些有劳动能力而没有参加劳动的年纪较大的人和经济情况较好的某些人都参加了劳动。所以，公社化后，农民不但劳动的天数增加了（妇女过去每月劳动一般是十天左右，现在是23—26天），劳动的时间可以增多（晚上不必再评工分，农忙时可以用来突击或平时学文化技术），并且参加劳动的人数也加多了。以黄埔公社姬堂大队第三中队为例，公社化前，全中队245人中，只有82人参加劳动，其中男劳动力39人（主要劳动力35人、附带劳动力4人），女劳动力43人（主要劳动力8人、附带劳动力35人）。

公社化后，根据评工资的数目，参加劳动的共126人（学生参加劳动在外），其中男68人，人数比前约增加74%，女58人，比前约增加35%，（从全国来看这个增加的数字是惊人的）。当然，这还只是从数字上来看，若从潜力的发挥上来看，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表示的意义。由于吃饭不要钱，“民以食为天”这个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以往大部分为吃饭担愁的人，现在都可以全心全意进行劳动了，干劲当然更大。过去的妇女因为参加劳动的机会不多，生产技术的提高受到限制，所以妇女多为附带劳动力（据了解，一般是三级工以上的才算主要劳动力），今后妇女摆脱了家务，生产技术将迅速提高，附带劳动力将很快、很多转为主要劳动力，这样对劳动生产力的解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再加上行动战斗化，组织军事化，劳动力将不断发挥更大的潜力。

第三，在农村还使我看到，由于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组织军事化，加上各生产队都有民兵的编制，青年农民，既是民兵的基干，也是生产的突击手，实行了劳武合一。每一个生产大队（现在按军事编制，改称为营），都有着党的支部，成为基层单位的战斗司令部。这样，今天的中国农民，不论在和自然进行斗争的时候，还是在向阶级敌人或帝国主义侵略者斗争的时候，都已成为一支有组织、有领导、有政治觉悟的战无不胜的队伍，这对于发展生产和捍卫世界和平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阮镜清（广东师范学院）

我参加了这次人民公社化运动，亲眼看到了这一切，使我对“人民公社是天梯”这句话有比较实际的体会，收获很大。我们知道，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首先准备好三个条件：第一，社会物质产品极大的丰富，第二，全体人民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第三，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有了这三个条件，就可以逐步消灭三个差别，即工农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并消灭反映这三个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到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了。

在番禺市桥及广州三元里几个人民公社里面，首先，我们具体地看到的是农产品空前丰富并在继续扩大生产中。如以番禺南村来说，只今年早稻就达到亩产570斤，比去年亩产282斤翻了一番，晚稻的生产指标是亩产一万斤，争取一万五千斤。

三元里今年的早稻产量也比去年全年的产量增加了一半。去年一年要国家供应280万斤粮，但今年只夏季一造，就不仅每个农民增加了80—100斤口粮，留下100多万斤机动粮和82万斤牲畜口粮，每亩留种200斤，而且还能卖出280万斤粮给国家。由于农产品的丰富，使公社能实行带有“各取所需”的因素的新分配制度。现在南村、三元里的农民实行吃饭不要钱，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大事情。

其次，为了推动生产的大跃进，必须要求人们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敢想敢干，自觉自愿地参加劳动；同时人力物力也都要统一调拨，集中使用，实行大协作。这一点我们在各个公社里面也可以看得到。南村原是一个丘陵地区，从来没有人敢想过可以在那里大搞生产，特别是附近的七星岗，更是因为石头多，从未有人敢想过过去开发的，可是公社成立后，人们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鼓足干劲，敢想敢做，只用了二十天的劳动时间，便把它开成一个十里茶山了。为了加速人民公社的建设，各乡农民都拿出了比以前更大的干劲来保证晚稻的极大丰收。为了搞好晚造生产，又有许多人牺牲了个人的利益，把金钱肥料捐献出来。这更充分表现了“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大协作方面，也到处可以看到不少动人的事迹。各地农民不仅为本队本社而苦战，而且经常打破社界、乡界以至县界去帮助别处生产。在南村、市桥是这样，在三元里也是一样。三元里成立公社前，乡要在生产队中抽出一个人来搞工作，也很困难；但公社成立后，马上就抽调了近一千人来搞工业，着手兴建几十个高炉，又抽调了二十多部机器、三辆卡车、五十多部猪笼车、二十多部单车去支援钢铁工业；抽调了约六百人搞副业；抽调五百民兵突击落后田；此外又另抽调了一批优秀劳动者去支援流溪河的水电站。现在不论三元里或南村，不论男或女，队与队之间如有人力物力的需要，随时可以互相调动，打破了区域观念，实行了大协作，充分使人尽其能，物尽其用。从这许多事例中，可以看出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正迅速地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出现和成长。

再次，我们在这里也看到随着生产的大跃进和公社的成立，推动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带来了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高潮；特别令人兴奋的是看见学校和工厂、农场都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着大量亦工亦农亦兵的劳动者，使工人与农民的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正在逐步消灭中。现在不论三元里、南村、市桥都已基本扫除了

文盲。当我们一踏入公社时，就可以看到墙头到处是诗歌，南村更成了诗歌之乡。农民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著书立说，出版了诗歌集、论文选。公社还到处办了托儿所、幼儿园，又有小学、中等学校、红专大学、党校、团校、电映队等，公社社员每天都有一定时间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出亦工亦农的全面发展的新人。

此外，我们在各个公社中也看到为了为农业生产服务，已经建立了不少工厂，如农业机械厂、肥料厂、水泥厂、石灰厂、耐火砖厂、农具厂、炼铁炼钢厂、沼气厂和各种生活用品的加工厂等，照它们的远景规划看，各种工厂还要迅速扩充、增加。这样，在发展农业基础上在农村同时大力地发展工业，就是消灭城乡差别的根本办法。因为农村办了工业后，会加速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发展，使在农业生产中逐步以机械劳动代替了笨重的手工劳动，同时也会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些都将是不断缩小城乡的差别，从而为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商承祚（中山大学）

今年十月间，我们中山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下到东莞县虎门人民公社去，主要是进行劳动锻炼，向农民学习，改造思想，同时也参加建立人民公社的工作，协助做好宣传工作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短短的一个多月以来，我们亲眼看到的农民在公社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风格，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和教育。首先，是农民的冲天干劲。虎门人民公社的社员，为了确保晚造的丰收，并以实际行动来迎接公社化。他们以冲天干劲，敢想敢干的精神，连续苦战两昼夜，突击送肥施肥，消灭了全社的落后禾苗，突破了粒数关。他们在苦战以后，仍然精神饱满，情绪高昂地去参加群众大会。为什么农民能够这样呢？难道农民在连续苦战以后，不会疲劳吗？不是的。其实农民在连续苦战中也是疲劳的，只是因为他们具有共产主义的觉悟，认识到今天的苦战是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为了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他们就能够战胜疲劳，用愉快的心情来迎接苦战。这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使我们认识到能否坚持苦战，主要不在于有无劳动的习惯和体力的强弱，而在于共产主义觉悟的高低。其次农民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对待公社化过程的一些实际问题，也给我们以很大的教育。例如在

“吃虧論”的辯論會中，有少數人認為：公社實行部分供給制部分工資制，勞動力弱、孩子多的人占了便宜，而勞動力強、沒有或者孩子少的人吃了虧，許多先進的農民指出，不能從目前個人的得失來對待這個問題，而要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以發展的眼光來對待這個問題。人民公社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天梯，是走共同富裕的最好道路。在人民公社中，社員的幸福生活，社員基本生活需要的解決，主要是靠集體經濟的優越性，靠集體力量，靠發展生產，而不是靠摺勞動力強、孩子少的人的油。事實上，離開了集體，勞動力強的人也不能單獨創造象公社那樣的幸福生活。同時，勞動力的強弱也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現在無勞動力的小孩將來會變成強的勞動力，現在勞動力強，將來也會年老體弱；現在是單身漢，將來結婚後也會兒子成群，自己的兒女也同樣要享受公社的養育。這叫做“我為人人，人為人”，誰吃虧，誰占便宜的問題，從發展來看是不成立的。公社成立後，每個人發揚共產主義風格，努力為集體勞動，不斷發展生產，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爭取早日過渡到共產主義，使自己生活好，別人的生活也好，這才是共同幸福的道路。以先進農民為代表的農民這種正在成長中的共產主義風格，比起那些爭名爭利，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人，不知要高尚了多少！這使我們更加感覺到必須學習先進農民的共產主義風格，努力改造思想。此外，農民特別是貧雇農的愛憎分明，階級立場堅定的表現，也給我們以良好的影響，他們對於有破壞行為的地富分子、壞分子，鬥爭是很堅決的，而對自己的階級兄弟，則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在勞動中，對於體力較弱的人，主動給以幫助和照顧，在生活上也互相關心推讓，例如在公社的食堂中，我就常常看到彼此推讓不吃好菜的现象。總之，在同農民共同勞動，共同鬥爭中，我們得到了不少教育和啟發，只要我們認真向農民學習，必能更好的改造自己。

莫 雄（廣東省參事室）

農業大躍進之後，其他社會主義事業同時需要躍進，以爭取早日實現社會主義，這是客觀形勢的需要。盡量使用地利，盡量運用勞動力，大規模防止災害等，是農業合作社難以做到的。而且，農業社對於山區與平原地區的資源人力，無法調配，因資金資源局限的關係，要想工農業並舉，不容易。辦學校、辦醫院同樣不容易，農業合作社社員，還有自留地，房屋也還是私有，公私之間不免

有矛盾；並且一般生活的改善，也不容易平衡。因此，不能不進一步實行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特點是大與公，實行公社之後，不特上述種種問題可以解決，其他許多新發現的問題都可以解決。

當然實行人民公社，不是凭主觀願望出發，而是客觀條件所形成的。今年農業大躍進，糧食過了關，其他經濟作物也豐富了，這就具備了物質基礎。農民群眾經過歷次的大改革，尤其是最近經過全民整風運動後，政治覺悟大大地提高，這就具備了思想基礎。故一經宣傳公社好，四處就如響斯應，紛紛申請進人民公社，甚至小孩子也曉得歌頌公社好。紫金縣就有一個十三歲的小孩這樣歌唱：

月光光，照地堂，建公社，辦食堂。弟弟有人帶；哥哥上學堂；婆婆幸福院；媽媽出田莊。人民公社好，幸福又無疆。

由此說明公社是水到渠成，必然的趨勢了。

章 沛（中國科學院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

人民公社給農民帶來了極大的好處。在高速度發展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樹立集體的 lifestyle 三個方面，都突出表現了人民公社具有巨大的優越性。單從農民生活水平方面來看，即解決了兩個突出的矛盾：

第一，解決了過去農業生產合作社生產關係與迅速發展生產以迅速進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的矛盾，它使得全體農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

第二，解決了過去農業生產合作社中分配不平衡的矛盾，使得農戶收入差別的距离大大縮小了，而且基本上克服了各個農戶之間收入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這兩個結果，意味着通過人民公社，農民將走向日益幸福的道路，並且正在逐步地實現共產主義的真平等。

人民公社建立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非常明顯的。

一、農民收入普遍提高：根據番禺人民公社，沙灣團第二營（螺陽）五個排和第五營西村連共519戶的調查，公社建立後預計一年的收入，比1957年收入增加了的有485戶，占調查總戶數的93.4%。其中增加收入在100%以上的252戶，占調查總戶數的51.3%。

二、收入增加的比率及個人平均數：番禺人民

公社南村因南村营第一連全連，比1957年共增加收入11,080元，增加比率20.41%，平均每人年收入增加21.66元。第二連全連共增加收入54,995.47元，增加比率181.54%，平均每人年增加收入66.58元。第二連是收入較多的小社，所以增加比率比第一連大。

三、农民在公社中的收入与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收入的比較：以上是把农民的工分、自留地、副业的总收入拿来和人民公社建立后預計一年收入來比較，如果拿公社一年收入和农业社中一年的收入來对比，增加的比率就更大。南村营第一連1958年預計工分分配数是36,918元，而公社成立后光是工資伙食兩項預計一年收入就达到54,294元。增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南村营第二連1958年的預計工分分配数是21,996元，公社后預計一年的工資伙食收入是83,086元。增加了差不多四倍。

四、伙食的提高：1957年南村营第一連平均每人全年是57.04元。公社后，每人平均全年是66元，另有三厘面积的菜地供应蔬菜，据干部估計，每人全年可达84元。在伙食費上，平均每人全年增加了26.96元。

五、衣服及零用錢支出的提高：南村营第二連十二典型戶，1957年除伙食、医药、子女教育、养老(主要是伙食)四項以外的支出总数是2,152元，公社后，四項已經包起，尚有工資收入2,286元，足以应付四包項目以外支出有余，說明农民在公社后，这方面的收支是更寬裕了。

以上調查材料所提到的伙食是按每天兩頓干飯，每人每月五元五角，全年66元算的。如果按照中共广东省委的新决定每天三頓干飯算，將更大大增加。

这些生活改善的事实，包含着—个比事实和数字本身更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几千年来一直威胁着人民的衣食住問題，从此得到永久的、根本性的解决，人民第一次过着不愁衣食，无忧无虑的生活。这种生活上的大解放，大大地發揮了全体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推动了生产更大的跃进。

黃子毅 (广东省政法干校)

我想談談从人民公社的职能看共产主义因素的出现这—个问题。在公社化之前，我国农村的基层政权是乡政权，而基层生产單位是农业社(手工业社、漁业社……等)。因此，当时的基层政权和基层生产單位是分开来的。

公社化之后，农、林、牧、副、漁全面发展，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相互結合。既是生产單位，又是管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福利……等具有多职能的基层政权組織。公社按照社的各方面事务設立了相应的部門。它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对公社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进行管理(当然中心是发展工农业生产)，这样就把政权和生产單位結合起来了。

从公社的管理机关的性質和职能看来，便出现了下列几方面的新因素：

1.在党的领导下，它已不仅是管理社会生活个别方面或某些方面的管理机关，而是管理公社范围内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組織的管理机关。

2.它是政权，又是生产組織。因此，一方面，它是对階級敌人的專政机关，另一方面，又是直接领导、組織和管理生产和社內其他事务的机关。只要階級敌人存在，它的專政职能就不能削弱，相反应该保持和加强。而同时，管理工农业生产將日益成为公社管理活动的中心內容。

这些新的因素說明了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單位，另一方面它已具备了共产主义的因素，并將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單位。

这是和公社化过程所发生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革相联系的。同时也可以看出，指导生产、管理生产將日益成为公社的主要活动内容，这將标志着公社由社会主义开始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并不如某人所設想的那样：將來社会主义建成及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切条件已經具备时，突然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出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管理机关。我們党和毛澤东同志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創造性地运用了馬列主义原理，发现了人民公社这个最好的組織形式，在党的领导下，使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并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又积极地为將來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

李放邨 (中共广东省委中級党校)

我們深刻地体会到：由于生产大跃进，社会主义生产，空前地发展着，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已經起着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必須使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步地消失。我們从人民公社的建立，从人民公社的劳动和分配制度，

着到人民公社正在起着这方面的作用。但要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必须首先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干部和群众。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形式，本位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也都是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产物。因此，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旧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就不能逐步消灭，新的共产主义萌芽就不能迅速成长，从而也就影响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逐步消失。

王安民（中共广东省委中級党校）

我想談談对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的看法。

目前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一般是半供給半工資制。它和过去的按劳动日計酬有所不同：第一，它已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第二，它和以劳动日計酬相同之处在于：工資部分仍然反映按劳取酬原則。

由按劳动日計酬制轉变到半供給半工資制是分配制度上的变革，这一变革的条件有二：

（一）工农业大跃进，特别是粮食大丰收，提供了实行半供給半工資制的物質基础。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設，較有把握地战胜天灾，使农业生产比較稳定，实行半供給半工資制有了可靠的基础。

（二）广大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实行半供給半工資制的精神条件。大跃进以来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空前提高，忘我劳动不計报酬已逐漸成风气。那里要人，社員們就到那里去，很少有人提出报酬条件。在大鬧鋼鉄运动中，社員們自帶工具，自帶粮食，露宿风餐，不避艰险，也很少人去計較工資多少。

有些干部怀疑搞了点供給制会不会影响社員的生产积极性。这种怀疑是由于对社員的觉悟估計不足，只看到一些富裕农民的不滿情緒，而忽視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这就是沒有抓到事物发展的主流。

有些干部，以为供給范围越多越好，不顧生产条件和人們的觉悟程度，这也是不对的。从生产上看，除粮食产品外，其他产品还不算丰富，供給范围过分扩大，反而会妨碍滿足社員多方面的不同的需要，对生产的发展不大有利。从人們的觉悟程度看，共产主义道德品質正在产生和成长过程中，但庸人俗气还有不少。按劳取酬的作用还没有消失。

目前在分配关系方面实行半供給制，是很有必

要的：第一，搞伙食供給制，使所有的人食飽飯，从此大家不再为食飯問題耽心，一条心搞生产。我訪問过不少社員，他們无一不拥护粮食供給制，都表示要鼓起更大干劲，加速建設社会主义。

第二，实行半供給制，做一个样子，便于打破社員們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質。有了供給制，就有了对立面，它将引起人們的思想斗争，引起人們的思想变化，在这次分配問題辯論中，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吃亏論的爭論，將會在实际生活中进一步証明誰是誰非。

第三，实行半供給制可縮小社員之間的收入距离，可提高社員特别是原来收入少的社員的生产积极性。大家苦战一年，就使大家的生活特别是原来收入少的社員的生活都能得到較显著的改善，从而使大家体会到苦战的成果。

由按劳动日計酬形式改为工資形式也很必要。因为：第一，在按劳动日計酬条件下，不同工种的劳动定額不同，报酬有別，社員往往希望从事工分定額高的工作。这就有碍于劳动力的調配，有碍于实现專業化和协作，实行工資制，固定級別，固定工資就解决了这一問題；第二，人民公社与农业社不同，它包括农林牧副漁，工农商学兵，要求有统一的分配形式；第三，大跃进以来，工种不断增多，工具不断改革，耕作技术不断提高，劳动定額的修訂和平衡工作跟不上去，評工記分制度实际上已与大跃进形势不相适应；第四，工資制便于对社員的劳动态度和技术水平进行鉴定，有利于社員思想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溫培信（广东教育行政学院）

我想談談关于共产主义教育問題。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进入一个伟大深刻的革命阶段，使我国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起了极大的变化：生产更具有計划性和大规模的性質；生产組織更加完善和耕作更进一步的專業化；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和技术的不断革新，便为逐步过渡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准备条件；群众的劳动热情的高涨和劳动积极性与創造性得到了高度的發揮；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社会生产已开始轉入更先进、更科学的新阶段。过去在高级农业合作社中，基本生产資料（如农具、耕牛等）虽然都已入社，但它折价当为股份基金或投資，合作社仍需支付一定代

价，同时社員本身仍保留有一部分自留地和一定数量的牲畜以及某些生产資料。建立人民公社后，一切生产資料都要求归公，某些牲畜（如猪）也折价归社，由社统一安排，原来个人所有的某些生产資料，都逐步轉为公有。这种变革就是要彻底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消灭私有制的残余。在分配方面，以前是按劳动日計算工分，现在改变为半工資半供給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按劳取酬”的原則，如其中供給制部分就已超出了“按劳取酬”的原則，包含有共产主义的因素。生产关系这些重大变革，不能不在农民群众中引起相应的思想变化和波动。

由于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也使生活方式来了一个大的轉变。大规模地組織生产和进一步的公有化，要求人們生活更加集体化。人民公社举办了公共食堂、托兒所和幸福院等，家务劳动也社会化了，这就使妇女劳动力获得了解放。加以坚决贯彻“組織軍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結果，使几千年来以一家一戶为主体的經濟生活开始轉为集体生活，消除了原来个体进行活动和自由涣散的状态，要求一切行动必須从整体出发，具有严格的組織和紀律。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这种改变，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一下子就完全适应了。

人民公社运动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化，是意味着我国社会制度的一次深刻的革命。許多人还不能很快的适应这种变化，思想上还跟不上去或者有某种程度的抵触，这都反映了人們的思想意識和新的經濟基础之間还不能相适应的情况。所以会有这种情况，不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經濟地位的不同或是深受旧的思想影响，以致对于社会的这种变革抱有不同的态度；二是由于思想落后于形势，跟不上去，还是用老眼光看新問題。我国社会的这种变革在人們思想上所引起的种种变化，实际上是反映了两条道路和两种思想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按其性質又是階級斗争，不过它比較集中地通过思想領域方面的斗争去体现出来。就其表现程度來說，还是相当尖銳和劇烈的。

这种斗争的本質問題也就是对劳动和集体的根本态度問題。以共产主义态度还是以资本主义态度去对待一切劳动？这是两种思想的分界綫。我們的劳动是不是能为社会造福？我們是否已把劳动看作为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需要？我們是否具有不計报酬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和习惯？这是共产主义劳动的基本要求。而资本主义的劳动态度却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突出地表现在按等价交換原則而产生的“一分錢，一分貨”的利己主义态度。一些人在

并社問題（認為并社只能富与富合并，富社与穷社合并就是富拉穷，富社吃亏）和对待分配問題（把半工資半供給說成“为超支戶劳动”）等方面的錯誤思想，就是这一根本态度的反映，这是一个問題。其次，就是对待集体的态度問題，走共同富裕还是走个人发展的道路？要集体主义还是要个人主义？有沒有具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和风格？能否彻底清除“利己”的个人打算？某些人不能割掉私有制的“尾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沒有認識到私有制是貧穷和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在人民公社化的今天，仍然要用共产主义思想去教育人民群众，就是要不断的进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和集体主义的思想去教育。要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使大家都認識到共产主义的前途和远景，以激发全体人民的劳动热情，發揮更大的干劲，大力爭取生产的更大的跃进。同时要破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立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和大协作的精神。使大家都明确認識到个人只是在集体内生活的，只有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目前利益服从長远利益。依靠集体力量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只有发扬共产主义思想和风格，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不計报酬，忘我地劳动，才能破除资产階級法权思想及其一切残余，加速社会主义建設为將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张 鉴 （中共广东省委中級党校）

我的思想深处，存在小农思想私有观念的残余，我曾覺得革命苦战多年之后，應該有个以終晚年的园地，曾有一个时期感到經常搬家，一个人沒有一間住处，終不方便。今年上半年到从化去劳动，碰到自留地問題。因为生产太紧张，农民还要在夜里攜自留地，有的人却不关心集体生产，在集中农家肥料的时候，常常斗争很尖銳，为了保証大跃进，社里曾經設法消灭私有厕所，設集体牛欄，集中自留地，集中开飯，集中全托兒童等，凡是坚决开展这种工作的，都得到群众拥护，只有极少数人有意见。当时是認識到，集体大规模的生产行动，和小家庭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矛盾，实行家务劳动集体化是当务之急。

可是由于当时对共产主义的認識較差，認為是很远很远的东西，碰到困难时，就認為目前群众有很多困难，有点自留地，还可以帮助添补伙食及衣

着零用，还認為农业社的集体副业的经营也不够，讓农民个人经营一点，对城市副食品供应也有好处。

后来，事实說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在这次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我們看到自留地和其他副业的收入常常占中农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有的甚至超过集体经济的收入。

自留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私有残余的坏处有下述几点：

(1)存在私有制，这是资本主义最后的经济基础；是个人主义思想的物质基础，不消灭这个残余，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精神是困难的。

(2)私有残余存在，对集体经济的发展有阻碍作用，使劳动力不能集中。集体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要求彻底消灭私有制残余。

(3)广大贫农下中农已感到集体生产的重要意义，干劲冲天，无暇照顾自留地等，要求放下包袱集中经营。

(4)为实现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必须彻底消灭私有制残余，以便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果不消灭私有制残余，怎能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呢？

人民公社建立后取消了自留地，从而这些坏处也随着克服了。仅这一点即說明人民公社有着巨大的优越性。

孔浩洲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

“大”比“少”好，“公”比“私”好，三元里农民群众经过几年的实践，对这一点已有深刻的体会。原三元里乡有47个小社，由于社少，力量薄弱，生产无法进一步提高。就以粮食来说，单位面积产量虽比过去有所提高，但去年口粮仍无法自给，每年需国家供应200万斤。今年夏天，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将47个小社合并为15个大社。合并结果，由于集中了人力、物力，使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今年早造，口粮多了300多万斤，种籽多了130万斤，还有饲料粮。这样，不单口粮能自给，而且还有250万斤余粮卖给国家。这一成绩已经不少了；然而，随着大跃进形势的出现，整风运动后，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坚定了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特别是党的总路线提出后，群众更认清了前途，明确了方向，因而干劲冲天，要求更加多快好省地建成社会

主义。不单农业，而且工业，都要求来个全面的大飞跃。但是，原来的所谓大社，与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的要求，已经显得极不相适应了：如原三元里乡有资金，有机器40多部，想办工业，开工厂，但苦于无资源，使许多事业无法举办；邻乡加禾，则矿藏多，铁、煤矿脉伸延三个大山头，还有铜、耐火沙坭和多种合金矿，但是却缺乏劳动力、机器、资金，也无法举办工业，要是来个大协作，又因为不够“公”，你有你的乾坤，我有我的日月，碰到不少障碍。例如原加禾乡永泰社有铁、铜、铅、锡等矿藏，只有330户，自己单独无力开采，却不愿别人开；原三元里乡的光明社肥源很多，自己用不了，可就是不肯让缺肥的加禾乡去积。很显然，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的。因此，有些社会酝酿通过转为国营农场来解决这些矛盾。就在这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已经有了实际教训的三元里和加禾乡的干部和群众，迅速地领会了党和毛主席这一指示的正确性。在群众迫切的要求下，只经过短短的三天，由原三元里和加禾两乡的农民群众，就主动联合组成三元里人民公社。

公社成立时间尽管很短，各方面的组织制度仍待进一步健全巩固；但是，已充分显示出它的伟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公社一成立，立即就调集了全公社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办工业，大炼钢铁，大搞丰产卫星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突击建立公社钢铁厂时，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但人力不足，交通工具缺乏，单50万块砖就够运的了。公社党委当即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特别抓住了又“大”又“公”这一特点，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立刻从各营调集了9千多劳动力、汽车6部、猪笼车536部、单车126部、马车35部、船10多只来突击运输。真是人山人海，车马如龙。就这样，仅用一天又半个晚上，即把全部红砖及所需材料运到工地。结果，短短的7天，就在平地上突击建成一个具有42个炼铁土高炉的钢铁厂。

在农业、文教卫生等方面，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跃进。不到一个月，就基本扫除了青壮年的文盲，目前各营已成立了红专学校，百分之百的成年人积极参加文化、技术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进一步提高，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真是喝天天要塌，踏地地要崩。

从三元里人民公社看，使我更认识到：人民公社运动的出现并迅速发展，是生产大跃进的必然趋势，是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原理作用的必然结果。

人民公社这一生产关系的质变，决不是偶然的，是经过量变的过程的，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准备了走向人民公社化的必要的条件，因而就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由于从理论上和实际上加深了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因而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根

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科学原理，总结了群众的实践经验而及时地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的正确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在观察当前人民公社的各类问题上，有了个准则。

谈谈人民公社经济政策的两个问题

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孙 孺

这几个月来，走马看花地访问了广州市郊区的三元里人民公社、新会县的附城人民公社、番禺人民公社。同时也看了清远县的几个人民公社。看得虽然不深入，但是许多新的事物和新的问题到处都可接触到，也得了一些体会。现在我只就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后残余和分配制度两个问题谈谈。

一、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的处理问题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比较坚决地采取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后残余的措施，如过去社员的自留地、成片的果树林木、较大型的农具和耕畜等之收归公社所有，我认为这是必然的趋势，同时也是绝大多数农民的要求，为广大群众所拥护的。因为：第一、人民公社既是综合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组织，它就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组织，它既要搞农业生产，又要大办工业，各个人民公社都要根据本身的条件，因地制宜，发展工业，如开铁矿、采煤、烧木炭、修公路、烧铁、炼钢和举办其他轻工业。这就需要把劳动力作全面的安排和调配，实行农业工业生产的专业化。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人力要转到上述这些工矿方面去，因而，广大的觉悟了的农民对自留地或者那些耕畜和成片的果树等便不能不感觉到是一个累赘，是一个包袱；觉得生产的进一步集体化、社会化和这些私有制的残余是不相容的，

从而要求彻底地消灭掉这条私有制的尾巴。对于那些觉悟较低的少数农民，他们之所以在工地、矿场劳动生产安心不了，对家园有留恋，根本原因就是惦念着这些残存的私有制。今后，人民公社里的劳动力，需要一部分固定下来从事工、矿生产，他们将成为比较固定的工人，某些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对他们就成为完全不必要的了。因此，人民公社要多方面地发展生产，要亦农亦工，要统筹调配劳动力，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就成为先决条件。第二，农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已深切地理解到私有制的残存，是滋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根基。要彻底破资本主义思想立共产主义思想，就要彻底将这条滋长资本主义的根挖掉。因而也要求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后残余。过去，有一部分富裕中农，资本主义自发思想曾经相当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虽然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经过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歪风已经压下去了，但是根基没有挖掉，资本主义思想还有滋长的温床，因而还有少数富裕中农对人民公社所实行的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思想上有抵触。只有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后残余，连根子也挖掉，才能彻底地永远地破资本主义立共产主义。所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后残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人民公社成为多方面的生产组织单位。

在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后残余问题时，又必须有明确的政策思想。首先，要将生产资料和生活

活資料區別對待。我們要消滅的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和由此而產生的階級剝削制度，並不排斥生活資料的私人所有。不論是當前社會主義階段下所實行的“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或將來進到共產主義階段下所實行的“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社會成員根據“各盡所能”的原則為社會進行勞動而從社會獲得的生活資料，仍然是歸個人所有。因而，在處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最後殘余時，對社員的生活資料如房屋、衣服、家具和銀行存款等，應明確宣布仍歸社員所有。至於多餘房屋的借用或租用，那和歸公有所區別，所有權仍屬於原主。在目前的社會生產水平和人們的共產主義思想覺悟水平下，劃清政策界綫，對鞏固人民公社，發展生產是有好處的。其次，在大集體小自由的原則下，在條件許可和不影響集體勞動的情況下，一些宅旁的零星樹木、小農具、小工具目前仍允許歸社員所有，同時允許社員為自己消費而養一些小家畜、家禽，從事一些零星的副業也有好處。因為這樣將有利於公社安排社員的生活。隨着公社生產的發展、收入的增加、集體生活和福利的逐漸完善，自然地會變為公有和終止私有。

二、關於分配制度問題

目前人民公社所實行的部分供給制和基本工資加獎勵工資的辦法，是得到廣大農民的衷心擁護的。農民歡欣鼓舞的心情是某些知識分子難以想象的。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國農民的生活是大大地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比過去好得不知多少了。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但由於生產發展程度的限制，還是採取評工記分、夏秋預分、年終決算的分配辦法。這種按勞動工分計酬的分配原則，還不是完善的辦法，因為它還存在着貧富不均的不合理情況。一個五六口之家，如果只有一兩個勞動力，還是不能不為吃為穿發愁。而勞動力多而強的家庭，則過着富裕的生活。結果，人口多勞動力少的家庭，一方面生活改善得不那樣快，還要為吃穿耽心，一方面又受繁重的家務所牽制，兒女受教育還有困難，這對勞動力的解放，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受着一定阻礙的。現在，吃飯問題根本解決了，加上托兒所、孩子入學都不要錢，又有公共食堂，把婦女們

從家務中解放出來，他們的勞動生產積極性將更高漲，他們深切地體驗到“我為人人”就是“人為人”。至於實行供給制之後會不會出懶漢？我見到的幾個人民公社自實行吃飯不要錢，三頓干飯管飽以後，到處出現生產積極性更高，勞動效率更高的事實就打破了這種多餘的顧慮。有些農民說：“吃飯吃得飽，做死也甘心”。可以說明他們的心情。

人民公社實行的基本工資加獎勵工資部分，是照顧勞動力較多的和勞動力強的，使他們的所得還是維持着較高的水平。從各地人民公社的調查看來，實行部分供給制和基本工資加獎勵工資之後，絕大多數的農民都比農業生產合作社時增加了收入，有些貧農收入增加一倍以上，一般富裕中農的收入也有所增加，只有極個別富裕中農的收入稍為降低了一點。所以我認為，人民公社目前所實行的分配制度，是符合於目前人民公社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情況的。目前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雖然具有共產主義的萌芽，（我們必須看到這一點，並且共產主義的成分將逐漸增長。）但是也必須認識，今天的分配制度，從性質來說，基本上還是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付酬”的原則。因為我們必須承認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是反映着事物的性質的變化。當前我國的社會結構是社會主義，是決定於生產力發展的水平 and 人民覺悟的水平。只要社會產品還沒有豐富到足以實現“各取所需”，“按勞取酬”就將仍是我們分配的基本原則。離開物質基礎來企圖一下子就超越這個階段是不可能的。儘管這兩個階段之間沒有隔着一個鴻溝，但總還有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我國的社會還處在社會主義社會階段時，過早地企圖否定“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原則是不適當的。因而，社員的工資部分，在今後若干年內還應當在生產不斷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有所增加，這對人民公社發展生產和加速社會主義的建設是有其積極的刺激作用的。我們目前加強對全國人民的共產主義思想教育，提倡“不計報酬”的共產主義思想和風格，批判資產階級的法權觀念，但並不否認在目前的生產水平和人民覺悟水平的條件下，物質報酬對於生產的一定的刺激作用。相反地，正因為有這個客觀的存在，我們才要加強共產主義教育，來加速社會主義的建設，為將來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準備好條件。

活資料區別對待。我們要消滅的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和由此而產生的階級剝削制度，並不排斥生活資料的私人所有。不論是當前社會主義階段下所實行的“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或將來進到共產主義階段下所實行的“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社會成員根據“各盡所能”的原則為社會進行勞動而從社會獲得的生活資料，仍然是歸個人所有。因而，在處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最後殘余時，對社員的生活資料如房屋、衣服、家具和銀行存款等，應明確宣布仍歸社員所有。至於多餘房屋的借用或租用，那和歸公有有所區別，所有權仍屬於原主。在目前的社會生產水平和人們的共產主義思想覺悟水平下，劃清政策界綫，對鞏固人民公社，發展生產是有好處的。其次，在大集體小自由的原則下，在條件許可和不影響集體勞動的情況下，一些宅旁的零星樹木、小農具、小工具目前仍允許歸社員所有，同時允許社員為自己消費而養一些小家畜、家禽，從事一些零星的副業也有好處。因為這樣將有利於公社安排社員的生活。隨着公社生產的發展、收入的增加、集體生活和福利的逐漸完善，自然地會變為公有和終止私有。

二、關於分配制度問題

目前人民公社所實行的部分供給制和基本工資加獎勵工資的辦法，是得到廣大農民的衷心擁護的。農民歡欣鼓舞的心情是某些知識分子難以想象的。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國農民的生活是大大地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比過去好得不知多少了。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但由於生產發展程度的限制，還是採取評工記分、夏秋預分、年終決算的分配辦法。這種按勞動工分計酬的分配原則，還不是完善的辦法，因為它還存在着貧富不均的不合理情況。一個五六口之家，如果只有一兩個勞動力，還是不能不為吃為穿發愁。而勞動力多而強的家庭，則過着富裕的生活。結果，人口多勞動力少的家庭，一方面生活改善得不那樣快，還要為吃穿發愁，一方面又受繁重的家務所牽制，兒女受教育還有困難，這對勞動力的解放，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受着一定阻礙的。現在，吃飯問題根本解決了，加上托兒所、孩子入學都不要錢，又有公共食堂，把婦女們

從家務中解放出來，他們的勞動生產積極性將更高漲，他們深切地體驗到“我為人人”就是“人為人我”。至於實行供給制之後會不會出懶漢？我見到的幾個人民公社自實行吃飯不要錢，三頓干飯管飽以後，到處出現生產積極性更高，勞動效率更高的事實就打破了這種多餘的顧慮。有些農民說：“吃飯吃得飽，做死也甘心”。可以說明他們的心情。

人民公社實行的基本工資加獎勵工資部分，是照顧勞動力較多的和勞動力強的，使他們的所得還是維持着較高的水平。從各地人民公社的調查看來，實行部分供給制和基本工資加獎勵工資之後，絕大多數的農民都比農業生產合作社時增加了收入，有些貧農收入增加一倍以上，一般富裕中農的收入也還有所增加，只有極個別富裕中農的收入稍為降低了一點。所以我認為，人民公社目前所實行的分配制度，是符合於目前人民公社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情況的。目前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雖然具有共產主義的萌芽，（我們必須看到這一點，並且共產主義的成分將逐漸增長。）但是也必須認識，今天的分配制度，從性質來說，基本上還是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付酬”的原則。因為我們必須承認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是反映着事物的性質的變化。當前我國的社會結構是社會主義，是決定於生產力發展的水平 and 人民覺悟的水平。只要社會產品還沒有豐富到足以實現“各取所需”，“按勞取酬”就將仍是我們分配的基本原則。離開物質基礎來企圖一下子就超越這個階段是不可能的。儘管這兩個階段之間沒有隔着一個鴻溝，但總還有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我國的社會還處在社會主義社會階段時，過早地企圖否定“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原則是 inappropriate 的。因而，社員的工資部分，在今後若干年內還應當在生產不斷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有所增加，這對人民公社發展生產和加速社會主義的建設是有其積極的刺激作用的。我們目前加強對全國人民的共產主義思想教育，提倡“不計報酬”的共產主義思想和風格，批判資產階級的法權觀念，但並不否認在目前的生產水平和人民覺悟水平的條件下，物質報酬對於生產的一定的刺激作用。相反地，正因為有這個客觀的存在，我們才要加強共產主義教育，來加速社會主義的建設，為將來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準備好條件。

尤其是貧农和部分下中农过去不敢也不能吃饱的贫困状况根本一去不复返了。有些公社（如大鎮）除实行吃飯供給以外，还实行以下的几种供給：衣服、医疗、理发、結婚、托兒、子女入学、喪費、老人供給（敬老院），这样一来，就是把生老病死和衣食住都包起来。完全实行供給制，另外还有零用钱（半工資制）。这就无怪乎在成立公社时全体农民都在敲鑼打鼓欢呼，他們都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这样，就彻底解除了农业社一部分农民和下中农的贫困威胁。

第四，公社成立后，彻底解放妇女劳动力：建立公社后，实行家务劳动社会化，大大地发掘了生产潜力，使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劳动力，彻底地被解放出来了。象杨梅社有一家七口人，一个老人五个小孩一个妇女劳动力。过去不要說叫她去做工，就是讓她去找一个人帮她做家务，也还没有時間去找。有的妇女，从前在小社时，也偶尔去进行生产劳动，但她們說，从前既搞生产又搞家务，就常常吃夹生飯（来不及煮熟）并且时时不放心小孩，帶去怕晒病，不帶去又怕摔死淹死，真是身在田头心在家，现在毛主席把我們解放了，一心搞生产，快乐赛神仙了。

第五，公社成立后，人的精神面貌也随着有了大大改变：随着公社的成立，生产关系发生了大的变革，反映到人腦里，人的思想意識，精神面貌也随着发生了变化。首先表现在劳动干劲、积极性更空前高涨了。南海簡平村許多农民半夜就起来劳动，虽然有的干部加以劝止，但他們仍然每天如此。鹽步有許多农民，从前每月出勤廿天或廿几天，现在每月不肯請假休息一天半天。除掉这种冲天干劲以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了。我們在鹽步食堂吃飯时，那真是招待备至，亲热异常，犹如在自己家里一样，使我們感到极大的温暖。并且食堂的干部总叫我們提意見，我們提了一些小的意見，他們很快就进行改正，使我們受到很大感动，同时也受到很大教育。同时由于私有制尾巴割掉了，又实行了三化，过去农民的自由散漫的习气完全改变了，私有观点逐渐消除了，关心集体，我为人人的精神，也处处表现出来了。

我在参加办公社的过程中进一步認識到和体会到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在各县农村中见到人民公社成立后，工农业生产跃进再跃进，文教事业也普遍空前发展，而人們精神面貌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随着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共产主义的思想风格已在逐渐成長，共产主义的萌芽已經出现。人們多少年来日夜渴望着的无限美满幸福的共

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不再是遙远的事情了，我們兴奋，我們欢呼！毛主席說：“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真是至理名言，已完全为鉄的事实所証明。现在在全国普遍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是党和毛主席英明正确领导的胜利，是馬列主义毛澤东思想的又一次胜利。我思想上由此更进一步明确認識到，也亲身体驗到党和毛主席是我們时代的智慧，是历史的舵手，是领导人民前进再前进的核心，我一定要永远一心一意地跟着党和毛主席走，听党和毛主席的話。

在农村中，我还见到那里发动了群众，依靠了群众，那里就解决了問題，就出现了新气象，就能想出办法多快好省地进行建設。群众实在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因此在思想上更使我明确認識到：任何工作必須首先考虑群众的利益，必須走群众路綫。就是我們的教学工作，以后也必須走群众路綫，依靠青年教师，尤其要发动和依靠广大学员同志，然后才可以搞好。

在参加办公社中，见到沒有改造好的一些地富分子还是对公社进行破坏。如三水河口人民公社筹建时，有个地主在大壘山社用金錢食物誘騙干部进行造謠破坏。南海籬行乡地主麦某也在进行煽动破坏。这样，就更使我更恨死了这些阶级敌人。所以在办公社时必須贯彻阶级路綫。我在思想上由此更加强了阶级观点。对人、对事、对問題必須用阶级观点来进行分析。我們过去講心理学，沒有贯彻阶级分析，忽視人的心理的阶级性，是絕大的錯誤。

在参加办人民公社时，与农民同劳动，就更体会到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实在比我們知識分子，不知高得多少倍。“百无一用是書生”，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就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劳动人民的真誠勇敢，意志的坚强奋发，是我們知識分子学习的榜样。我們必須拜农民为师。知識分子必須加强体力劳动来改造思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是万分正确的。

人民公社是一条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大道。人民公社化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它关系到每一个人，我們如果思想觉悟仍然不高，个人主义，私有观念，或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严重存在着，不能赶快大力进行自我革命，加以克服，那必然对公社发生抵触情緒，那就一定落后于形势，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更过不了共产主义的关，必为时代車輪所压倒，为人民所唾弃。我决心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进行自我教育，克服一切资产阶级坏思想，鼓足干劲，力爭上游，为迎接光明幸福的共产主义到来而奋斗！

談談我对“三化”加“一化”的体会

中共广东省委中級党校 林伯侯

人民公社的建立，是我国社会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必然引起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而組織軍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是这种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組織軍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軍事化的劳动組織形式，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可以通过它来进行全民的軍事訓練，加强集体农民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有利于組織农民进行劳动生产；有利于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有利于在全民中推广体育运动。在人民公社运动过程中，大部分地方发挥了軍事化的优越性，認識到軍事化是推动当前生产和一切工作的动力，大胆的运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采用以連以营为单位的战斗行动，解决农业生产中較突出的矛盾，为了更充分的发挥軍事化的威力，一方面抓搞好公共食堂和集体福利事业的发展，一方面強調干部到田、开会到田、宣传到田、吃飯到田。（很多地方还有軍事訓練到田、修理农具到田、售卖商品到田等二十三“到田”）采用现场評比竞赛的办法来調动社員的劳动积极性，利用休息時間进行宣传鼓动，表扬好人好事，对有缺点、錯誤的农民展开批評或辯論，对敢于破坏軍事化行动的敌人开展斗争。这样，运动規模壮大，紧张活泼，群众劳动热情高涨，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但是，也有少数地方，对軍事化的作用和“三化”的辯証关系認識不足，忽視在“三化”过程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結果，虽然有了軍事化的組織形式，也規定了統一出勤時間，規定了点名請假制度，但还是不能扭轉农民自由散漫的習慣，不依時出勤，提早收工和曠勤等现象依然存在。

組織軍事化流于形式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把“三化”互相分割孤立，有了軍事化的組織形式，不采取战斗化的行动，当然就不能显示出軍事化的优越性，如果有了軍事化的組織和行动，沒有

生活集体化作保證，战斗化的行动將无法实现。我們有些同志錯誤的認為吃飯、照管小孩等問題是無足輕重的問題，也是最麻煩的事情。他們在人民公社建立初期，不願意搞公共食堂，总是強調困难，強調条件不具备，因此，这些地方的公共食堂和其他集体福利事业都沒有搞起来，就是搞起来了也沒有搞好，这就影响統一出勤時間，影响劳动力的彻底解放，也就是直接的影响到軍事化的行动。

“三化”的內在联系，是生产与生活的辯証的联系；也即是生产与消费的辯証联系。因为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只有在保證生产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才可能不断改善生活；但消费对生产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消极的，只要經常注意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和关心劳动者的生活，消费对生产才会起着巨大的作用，我們有些同志正是由于不注意这一点，不自覺的抹煞了公共食堂、集体福利事业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关心群众生活，缺乏群众观点的具体表现。

組織軍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出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趨勢。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解决了两条道路的斗争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光輝的照耀下，我国工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大跃进，五亿农民的政治觉悟愈来愈高，思想更加解放，大破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規，开展了大規模的农田基本建設，深翻改土，平整耕地，兴修水利等全面进行，还要在农村中大办工业，使农业生产力迅速向前发展，这就要求調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才能够保證工农业生产不断大跃进，于是就出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但在我国物質力量和技术力量还比較薄弱，在农村还没有实现机械化的条件下，农业生产这样的大跃进，就要求比往年投放更多劳动力，而且由于农村大搞鋼鐵工业及其他加工工业，又要求从农业战綫上抽出一部分劳动力，这样，生产大跃进和劳动力不足就形成了矛盾，为了

解决这一矛盾，必須采用新的劳动組織形式来提高劳动效率，要求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須参加劳动。这样，組織軍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就成为形势发展的要求，也就是五亿农民本身的迫切要求。

軍事化的劳动組織形式，要求在一个公社的范围内，把劳动力最高度的最严格的集中起来。什么叫最高度和最严格的集中呢？它包含着二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要求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須参加劳动；另一方面参加劳动的成員，必須有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要达到这一要求，第一，必須彻底消灭私有制残余，把农民彻底地从私有制中解放出来；公社化以前，农民基本上是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上进行劳动的，但由于保留了少量的自留地，这样就还存在着集体經營和个体經營的矛盾，存在着进行公共經濟活动的集体劳动和进行个人副业經濟活动的个人劳动的矛盾。大跃进以来，由于公共經濟活动的紧张进行，这一矛盾更为突出了，有极少数农民因要搞自留地，甚至放弃集体生产。而服从統一調配的农民，有可能把他們的自留地丢荒。因此自留地成为了包袱，也就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包袱，人民公社宣布生产資料无代价归公，这正是反映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只有在所有制这些方面的彻底变革，才能使劳动力实行最高

度的最严格的集中。

第二，必須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参加生产劳动，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不仅对生产，而且对人們的精神面貌等方面将会发生重大的影响。

第三，必須在生产过程中建立起高度的民主集中制。在历史上，农民的特点是个体，散漫。軍事化的行动可以彻底克服农民的分散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农民，是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他們拥护軍事化，拥护行动高度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各級领导同志，應該更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綫，亲临生产战綫，加强政治领导，以生产领导生产，实现生产管理民主化，这样，不仅能及时解决生产中存在問題，而且更进一步密切领导与被领导关系，鼓舞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揭阳龙州营的营長，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娱乐，征求群众对秋收冬种的意见，用当时当地的具体事例教育群众，这样的干部，不仅和群众亲密无間，而且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但是，有些人只知道利用軍事化的方便，简单从事，以致在某些地区强迫命令作风有所滋長，这些人还不理解在軍事化的条件下，應該更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綫，实行生产管理民主化，才能充分显示軍事化的优越性。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黃剛

目前全国各地所成立的人民公社，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分配制度的改变：或采取粮食供給制，或采取基本工分制，或采取全供給制，或半供給半工資制，它的形式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和以前的制度不一样，这是一种新的分配形式。

就番禺县人民公社來說，现在实行四包，即包食；包医（挂号费要自己出，衰老病和慢性病则不包而由公社酌予补助）；包教育費（包到初中）；包养老。另外对社員发一部分工資，工資分为十

級，最低是一級，最高是十級，一級三元，十級十五元。此外在工分总额中，并扣出20%作为奖励金，对于生产成績优异的体集和个别社員給予奖励。这一分配制度，一般称为半供給半工資制。

这一分配制度，比以前农业生产合作社所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第一，改善了大部分农民的生活，大大鼓舞农民生产的热情，促进生产的发展。

我們在番禺大石乡礼村調查过十一个农户，其中六戶貧农，五戶中农。依照所定标准（伙食費每

人每月五元五角，医药费每人每月二角七分，学费小学每学期二元五角，中学每学期十元），及所評定工資計算，他們的收入都比以前增加。最多的增加184%，最少的增加22%，特别是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农户，增加更加显著。这说明人民公社成立后，絕大部分农户收入都已增加，生活都得到改善，是不可否認的事实。

分配制度本身不能創造财富，农民收入增加的来源，主要是去冬以来的生产大跃进，特别是今年农产品的空前丰收。这是各农户收入增加的物質基础，是新分配制度得以实行的根据。没有这一条，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新分配制度是不容易建立的。亦即生产关系的改变，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結果。

分配制度本身虽然不能創造财富，但它可以改变人們所得的份額。番禺人民公社的新分配制度，是在丰收的基础上建立的，故农民生活的改善更加显著。

过去各农户的收入，大部分用在食的方面。根据我个人对調查所得材料初步的計算，有些家庭的伙食費占收入70—80%，甚至更多，一般都占50%以上。因此，我們获得这样的結論：过去农民在生活上严重的負担或主要的問題，是食的問題。现在吃飯不要錢，由公社包起来，这就解除了农民千百年来沉重的負担，而工資收入不必用在这一方面，而可以用在其他方面，因此农民的生活充裕得多，改善得多。

由于新分配制度保證了农民的基本生活，解除了农民最沉重的負担，因此就大大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人民公社成立后，許多农民都說：“我家以前不够吃，现在不用愁，只有專心搞好生产”。东兴人民公社的社員在实行吃飯不要錢的第一天晚上，就有八十多个社員，通宵苦战。博罗县汝湖人民公社在十一月二日实行吃飯不要錢，当天割禾二千多亩，劳动效率比以前提高一倍。这说明新分配制度，对于农民的生产情緒有很大的鼓舞。这无疑会促进生产的发展，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設和加速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第二，新分配制度縮小了貧富悬殊的现象，逐漸实现共同富裕。

在單純按劳分配制之下，多劳可以多得，所以人口少劳动力强的农户，收入就比較多，从而他們的生活就比較富裕，反之，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农户，收入就比較少，从而他們的生活就比較紧张。据我們調查所得的材料，这种差别有时相当大。例如礼村何三一家七口人，有一个主要劳动力，一个

半劳动力，去年全家收入277元，平均每人每年只有39.5元。另一农户高国滔，一家四口，有两个主要劳动力，一个半劳动力，去年全家收入473元，平均每人每年有118元。两者相差几乎两倍。此外有些子女多而劳动力特别少的农户，更長期超支，年复一年，无法弥补。这些都是單純按劳分配制所表现出的缺点。

此种貧富悬殊现象，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妨碍生产的发展。因为超支戶年年超支，生活无法改善，因而生产积极性不高。他方面农业生产合作社收入有一定，由于超支戶借用了社的錢，盈余戶得不到应得的收入，因而也影响了生产积极性。

因为公社实行四包，所以农民在基本生活方面，是大致相同的，所不同者在于工資收入方面。即有些家庭劳动人口較多，或工資等級較高，因而工資收入較多，有些家庭劳动人口較少，或工資等級較低，因而工資收入較少。但由于工資的标度有一定而且不很高（最高十五元）；工資等級相差的幅度不寬（每一級相差仅一元至一元五角）；以及評薪时掌握一个平均数；因此各农户工資收入虽有多少不同，但不致出現巨大的差額，更不致影响生活的悬殊。故新分配制度，可使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更易于过渡到共产主义。

新分配制度不仅縮小了貧富悬殊现象，而且使子女多劳动力弱历年超支的农户基本消灭超支现象。因为实行四包，保證了农民的基本生活，病有医，老有养，食和子女教育費均有保證，超支的原因已根本消除。除非自己浪費，或有其他很意外的事情，不然必不至于超支。故新分配制度，为农民开辟一条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

第三，新分配制度，有利于生产大协作。

以前在按劳分配制度之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各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各生产队的生产情况如何，直接影响社員的收入。一个生产队如果工作好，生产量多，則工分值高，从而收入多；如果工作不好，生产量少，則工分值低，从而收入少。因此社員大都只关心本生产队的工作和生产量。要把一个社員調到社外工作，固然不容易，就是在一个生产合作社內，調到另一生产队工作，亦有困难。这种情形，妨碍劳动力大规模的集中，妨碍生产大协作的进行。现在实行新分配制度，农民的基本生活，获得了保證，工資在一定时期（三月一評）也固定起来。因此工作地区如何，不致影响农民的生活，农民对此已无选择的必要。这样就大大便利于大规模的組織劳动，不仅在社內可自由調动，而且可調

到社外进行大规模的协作。

第四，新分配制度有着共产主义的萌芽，使我们更容易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新分配制度包含部分的供给制，这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种供给制，虽然还不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供给制，但它已包含着各取所需的因素，从而为通往共产主义在分配方面开辟了一条具体的道路，使我们更加容易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伟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对于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只提出一些方向一些原则，没有作出具体的指示。斯大林虽然提出物物交换制，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办法。但苏联现在还没有实行，具体的措施还没有提出，亦即现在还没有在分配方面摸索到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道路。这条道路，我们现在可以说已经摸到。我们在现在半供给半工资制的

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产品的丰富，可以逐渐增加供给部分的比重，而减少工资部分的比重。即可以用逐渐增加供给品的种类和数量，而逐渐减少工资部分，以至将来把它完全取消的办法，逐步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原则。这种办法，是符合由量变向质变过渡的规律的。在粮食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以前，我们会实行过大米定量供应制。由于今年丰收的结果，从十一月起全省人民公社已实行吃饭不要钱，对粮食采取无代价无限量的供给制。这些事实，可以说明现在供给制的前景，亦即随着产品的丰富，我们对于各种物品的供给，必然是由有限量的供给到无限量的供给。我们从这条道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是一条捷径，走得顺也走得快。以前人们认为共产主义社会还是相当遥远的未来，现在人们的认识都改变了，认为不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广州高等院校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广州高等院校在整风胜利、教学和科学研究改革取得初步成绩的基础上，分别深入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工作。如中山大学早在八月下旬即已展开群众性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活动，中文系师生出版了批判王季思、陈寂和右派分子董每戡等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专辑共十二辑（油印本），其中不少文章经过整理后，分别在本校学报和其他报刊杂志发表；历史系师生也分别重点批判了陈寅恪教授、岑仲勉教授、梁方仲教授和刘节教授等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共写出文章近百篇。近两个月来该两系师生在东莞参加建立人民公社工作和接受劳动锻炼，还积极组织力量，一边劳动，一边继续进行批判工作。华南师范学院近两个月来也发动师生全面展开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活动，如中文系重点批判了马达讲师的修正主义文艺理论，还重点批判了廖蕊光教授和李育中副教授等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全系师生共完成了批判论文232篇，其中学生写的达208篇，历史政治系批判了罗孟章教授和关履权讲师等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已完成批判论文七十多篇，并准备在最近出版一个批判论文选集。教育系师生也写出118篇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论文，其中有关教育学方面的有89篇，心理学方面的有20篇，小学教育方面的7篇和教育史方面的2篇。目前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工作，在全市各高等院校正在积极进行中，羊城晚报亦准备开辟专栏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园地。

論 著

怎样学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张江明

现在全国空前热烈地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热潮，不但机关干部、知识分子，而且工农群众，以至街坊妇女，也都积极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个学习已经对人们的思想和实际工作带来了良好的效果。可以预期，随着学习的进一步深入，必将形成一股更雄伟的物质力量，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并为将来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部极重要的科学著作，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作了伟大贡献。因此，我们在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时，必须很好地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会把毛泽东同志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

正如同学习任何一门科学一样，当我们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候，一般上总是有这样两个问题要注意：一是为什么要学习这门科学，二是怎样学习这门科学。正确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就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要求和有效的学习方法，学习起来，就会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有的放矢地来学习，才可能学习得更好一些。

以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一伟大著作为例，学习这一著作的目的在于：明确认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区别和转化，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懂得根据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学会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学会应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正确的学习方法。学习目的和学习方法的关系正如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一样，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那末，应该怎样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呢？

第一，从研究当前实际问题出发，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通过总结经验来学习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論。

学习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如同学习其他一切问题一样，也是有两种态度、两种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即是为学习理论而学习理论，不去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不能应用人民内部矛盾的理

論解決實際問題，其結果：口里會說，但不會應用，不能解決實際生活中的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這是同我們學習方針根本相違背的。另一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既學理論，又聯繫實際，把這兩者結合起來；在學習時特別着重學會應用毛澤東同志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促進社會主義事業飛躍前進。這是有的放矢，理論聯繫實際的方法。把這種方法概括為一個公式，叫做實踐——理論——實踐。應用這公式到學習中去，就要從研究當前實際問題出發，聯繫思想，聯繫工作，通過總結兩類矛盾的實際經驗來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我們所以必須採用這種方法來學習，這因為理論是從實踐中來，為實踐的發展所決定。在人類的生活，是先有實踐後有理論的。把分散的零碎的實踐經驗總結起來，使之條理化系統化，就上升為理論；應用這樣的理論於實踐，便能指導人的行動。經過實踐的檢驗和實踐的發展，再次總結起來，就能進一步創造理論和發展理論。所以在理論和實踐這種辯證關係中是以實踐為基礎的。我們從研究當前實際問題着手，通過總結經驗、總結思想來學習人民內部矛盾，就是使我們能夠按照理論發展的原來順序從根本上認識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使我們更好的懂得如何把實際經驗提升為理論，懂得如何應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其次，從人的認識過程來說，是先有感性認識然後上升為理性認識的。在開始的時候，人們只是認識事物的外表和事物的現象，不可能認識它的本質，隨着實踐的繼續，逐步到達於了解事物的規律及其內部聯繫，即到達於理性認識。理性認識和感性認識的性質不同，但它們是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的。毛澤東同志指出，“無論何人要認識什麼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於（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如果要直接地認識某種或某些事物，便只有親身參加於變革現實、變革某種或某些事物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觸到那種或那些事物的現象，也只有親身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暴露那種或那些事物的本質而理解它們。”^①我們要真正懂得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就得親自參加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實踐，把自己對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看法和觀點擺出來，加以分析批判，把自己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經驗加以總結，才能深刻認識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如果關在房子里，只是讀書，不聯繫實際，不接觸思想，那是不能學好理論的。因為從書本上學到的理論，是別人經過實踐證

明而自己還沒有證明的東西，這對別人來說是直接經驗，對自己來說則是間接經驗，而“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②我們學了理論，還得回到實踐中去，在實踐中再認識，才能真正掌握理論。從實際出發，聯繫自己的工作 and 思想，總結兩類矛盾的經驗來學習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就能夠通過自己的直接經驗和親身體會來學習理論，使所學的理論能夠“為我所用”，能夠解決自己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存在的問題，指導實踐。再次，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不是憑空產生，也不是個人臆想的產物，它是從總結中國三十多年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經驗，吸取蘇聯和其他各個國家的經驗而寫成的。在這本科學著作中，既包括對當前人民內部矛盾的實際情況的分析，又包括了在歷史上有關人民內部矛盾的經驗；既總結了中國在兩類矛盾中提出的問題，又總結了世界各國的經驗。這是一本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總結實際經驗，從而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又指導實踐的偉大典範。我們從研究當前實際問題出發，通過總結兩類矛盾的經驗中來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就是用毛澤東式的方法去學習理論，用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的立場、觀點、方法去分析實際問題，找出它的发展規律，給予科學的說明，作出理論性的創造。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方法。

有人說，這種方法很好，但只對擔負領導工作和經驗很豐富的老幹部適用，對於那些作部門工作或實際經驗不多的幹部不適用。這種意見是片面的。不僅領導幹部要採取這種方法學習，一切新幹部以至廣大農工羣眾也應採取這種方法。今天我國人民內部矛盾普遍存在，到處都有，我們的一切工作都和人民內部矛盾有密切聯繫（當然我國今天還有敵我矛盾存在），可以說，那一個工作離開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會做不好。大家知道，我們做工作，就要解決矛盾。那裏有問題，那裏就有矛盾要解決。我們對待矛盾，必須分清它的性質，根據不同性質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才能做好工作。在廣大農工進行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時，不是有許多農工幹部用這種方法而得到很大收獲嗎？例如揭陽縣梅東鄉王木秀等同志，在學習以後，進一步懂得黨的羣眾路線，明確了階級觀點，

^①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86頁，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同上，第287頁。

学会了分析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并且懂得了解决这两种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因而大大地改进了工作方法，提高了工作效率，又如广州机器厂的工人用这种方法学习以后，进一步明确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和不同的处理方法。他们的车间在讨论和本车间一个反社会主义分子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时，最初只是从出身成分上来看问题，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经过学习辩论后，认识到反社会主义分子坚持反动立场，攻击党的方针政策，破坏生产，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因而是属于敌我矛盾，从而提高了认识，划清了界限。又如他们的陈师傅，过去工作方法比较生硬，批评指责多，说服少，工人有意见。通过学习以后，大大改进领导作风。他认识到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矛盾，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用耐心说服的方法来解决。从此，他和工人的关系就很好了，加强了团结，大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都说明，无论做哪方面工作的干部，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学习，而且学得好。

怎样从研究当前实际问题出发，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通过总结经验来学习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呢？

首先要学习文件，领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实质，同时要深入研究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人民内部矛盾，以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为指导，认真分析这些矛盾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提出解决办法，再回到实践中去，用以指导工作。同时要系统地把自己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看法和指导思想鸣放出来，作一番分析，从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角度，检查自己对两类矛盾的认识和处理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将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起来，提高到理性认识。

在研究当前实际问题、总结经验 and 总结思想时，最好选择一两个典型作深入分析，因为典型的思想 and 典型的经验比较完全比较深刻，解剖了一个麻雀，就能知其他麻雀的基本情况。通过对典型的研究，可以概括其余。在找不到典型时，可作综合性的研究，把问题集中起来，作系统分析，从中吸取经验，提高思想理论水平。

联系思想，总结经验，当然首先着重自己的思想和经验，这是最基本的。但也可参考别人的经验，研究群众的思想。在分析和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中，必须抓住自己的主要思想和主要问题，特别是要深刻分析自己的指导思想，找出对两类矛盾处理得好或处理得坏的思想根源，定出改进办法，

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要注意两种现象：一是提不高，二是不会用。材料摆了一大堆，经验讲了一大箩，但不能提高到理论上认识，这是经验和理论相分离的表现。另一种是口上讲的理论头头是道，遇到实际问题却毫无办法，不会应用理论来总结经验，这是理论和经验相分离的表现。为了克服这些现象，有实际经验而理论水平不高的人，在总结经验的过程中要认真学习理论，掌握理论武器来分析自己的经验。有理论知识而实际经验缺乏的人，应着重地研究实际问题，学会应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

从研究当前实际问题出发来学理论，是一个艰苦的学习过程，要勇于暴露思想，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切实掌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深入研究在当前两类矛盾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善于总结经验，使理论成为行动的指导，才能获得良好的成果。

第二，要有共产主义风格，以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来学习。

如同工作一样，学习也要思想解放，要有共产主义风格，这是保证学好的重要条件之一。

敢想能够多出智慧。学习就是思想劳动，必须动脑筋，善于思索。学习的成果，是靠艰苦的思想劳动来达到。这正如农民种田，工人做工一样；要多打粮食，制成物品，一定要通过劳动来实现。在生产上的二流子，是不能有所收获的。在思想上的懒汉，一定学不好。毛泽东同志指出：“有些人背上虽然没有包袱，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①在学习时，不但要多想，还要敢想。科学上的新发现，工作上的伟大成就，学习上的重大收获，首先是从敢想而来的。人们想飞上天，便发明了飞机。想亩产稻谷过万斤，便出了二万斤、五万斤以至十多万斤的世界纪录。人们的智慧要多想敢想才得到发展。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是没有智慧的。我们在学习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中，必须多想、敢想，要从正面去想，又从侧面去想，要想想过去（包括现在），又想想将来。多想敢想，才能使思想开朗，易于发现真理，打破束缚，不会僵化，有宏伟的志气，有壮丽的理想。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52页，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敢說能够互相启发，共同提高。我們應該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說。是否敢說，是检查思想解放的标志。敢于把自己的意見說出来，这就表明自己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表明自己插的是紅旗，还是白旗。有正确意見不敢发表，有錯誤思想不敢暴露，有怀疑顾虑不敢反映，会使人迷失方向。在学习时，多說、敢說，才能交流思想，互相启发，互相促进，使学习的空气生动活泼，造成热热烈烈的高潮，而不是沉沉默默靜坐。在学习中不但要敢于拥护正确的东西，还要敢于暴露自己的錯誤思想和行动，敢于把一切违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和表现講出来，加以批判分析。这是提高思想，真正接受毛澤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論，使之成为自己的战斗武器的根本条件。有的人不敢多說，怕出錯誤，給別人拴住辮子。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有錯誤的东西深怕人家知道，不敢见见太阳，藏之腦海，終久是会发霉腐化的。而且錯誤的东西，今天不講，明天有了适宜的气候，它会造成更大的惡果。在学习中有勇气講出来，得到大家帮助，及时克服，就会大步前进。

不但敢說，还要敢辯。用辯論的方法进行学习，是完全符合于辯証法的。大家知道，辯証法的最初发生，是在談話和討論中，以找出对方的矛盾，并加以克服，因而求得真理的一种方法。后来，馬克思和恩格斯从哲学上加以总结，便成为唯物辯証法。在学习中开展辯論，就是把矛盾充分暴露出来，树立对立面，經過矛盾的斗争（辯論）而取得一致。这样，领会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論就更深刻、更全面，并且能够更好地使理論联系实际。可以說，用辯論来学习，是一个辯証的学习方法，是学会运用理論解决实际問題的最好方法。因为在辯論中有正确意見，也有錯誤意見，你贊成誰，反对誰，就得經過一番思考，特別是如何將对方的意見駁倒，使人家口服心服，这既須要自己的立場穩，道理充足，看問題全面，如实地反映客观实际，又需要針對对方的論点加以批駁，使其放弃錯誤，接受真理。这是一个应用正确理論克服錯誤理論的过程。还应認識，真理是愈辯愈明，正确理論是在同錯誤理論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謬論总是阻碍真理向前进，但在經過斗争（辯論）并克服謬論以后，它却可以成为发展真理的肥料，大大提高思想認識与觉悟。

不但敢辯，还要敢坚持。在学习上必須有“坚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态度。不应随風倒，人云亦云。凡屬正确的东西，就应坚持；不坚持，便是沒

有原則。凡屬錯誤的东西，就要改正；不肯放弃和改正錯誤，便是固執己見，使錯誤繼續发展。敢于坚持真理，才能高举紅旗。在辯論中，有的人很怕孤立，一看见占少数，就不管自己的意見对不对，立即放弃。这都是违背了“坚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原則。

不但敢坚持，还要敢做。我們不是空談家，而是干着翻天覆地、改造世界的人。應該說得出，做得到。这就是說，在学习中必須貫徹理論联系实际。我們现在学习人民内部矛盾，除了从实际出发，認識两类矛盾的理論之外，还应该把这个理論应用到工作中去，应用到实际工作和生活去。有的人只是学理論，却不愿意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应用所学的理論，这是不对的。我們應該一面学，一面用，把学到的东西用到实际工作和现实生活中去，并在应用中再深刻地体会理論，这样，既能学到理論，又会应用。應該認識，我們学习理論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所以，我們說：敢做才能貫徹理論联系实际。

总结起来，敢想、敢說、敢做的方法，是大鳴、大放、大辯論的方法，是群众路綫的学习方法，是辯証法的学习方法，是个人学习和集体学习相結合的方法，是理論联系实际的方法。我們必須很好地把它应用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学习中去。

第三，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要和改造思想相結合。

人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要不断地改造自己，使主观思想和客观实际相一致，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改造客观世界，还要改造主观世界，使主观世界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在社会主义建設中，要調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更加需要进行思想改造。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批判了那些反对思想改善的錯誤观点，指出任何人都要改造，說明要在思想上有所进步，必須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

有的人認為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就是学理論，可以不結合改造思想。这是把理論学习和改造思想分割开来，显然是不对的。革命的理論，只有为革命者所掌握。不站在革命的立場，不改造一切同革命相违背的思想，是不能接受和学好革命理論的，自然更談不上应用了。工人阶级所以最容易领会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就因为它是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它的阶级利

益和反映这个階級的理论，即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相一致，所以工人階級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得最快和最彻底。我国有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讀了不少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也写了一些解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書，但这些書都是东抄西凑而成，他們既沒有向別人講清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自己也根本沒有接受馬克思列宁主义，終于成为資產階級反动派的代言人。他們所以这样，原因之一是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沒有和改造資產階級思想相結合，他們看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書籍虽多，而資產階級思想却原封不动，甚至变本加厉。国际或国内一有风吹草动，他們就原形毕露。可见站在反动立场，以剝削階級思想为指导的人，决不能真正地接受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

第四，要有重点地、有系統地去学习。

比如学习毛澤东同志关于人民內部矛盾学說，它的内容极其丰富而完整，具有高度的战斗性科学性和階級性，我們在学习时必须要有系統的去学习。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第一章到第十二章，都应该学好。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掌握人民內部矛盾的学說。但是在学习时不仅要有系統，同时要有重点；应当对人民內部矛盾的内容有个全貌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着重学习有关人民內部矛盾的一些帶根本性質的問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共分十

二章，第一章是总論性質，着重从中国实际問題出发，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設中的矛盾，特別是对两类不同性質的社会矛盾作了科学分析，給予理論說明，提出解决人民內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不同方法和政策。可以說，这一章是全書的总綱，提起这个綱，就能綱举目张，認清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观点和总的問題。从第二章至第十二章是屬於分論性質，着重从各个方面、各个側面論述人民內部矛盾（其中也有敌我矛盾）的各个問題，以及根据人民內部矛盾各方面的具体内容，提出具体的处理办法和政策。

我們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应该把第一章作为重点，要深入地系統地把它学好。但是又不应该把其他各章抛开。如果說，从第一章中我們看到毛澤东同志如何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結合，从而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那末，在其他各章中，我們就看到毛澤东同志如何运用人民內部矛盾的学說分析在我国当前条件下有关人民內部矛盾的具体内容，进一步从各方面对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重大的贡献。我們应该把重点和系統結合起来，全面的認識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论，学会把这个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調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准备条件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

“东南亞經濟資料汇编”即將出版

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为搜集和整理世界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对东南亞各国經濟問題研究的資料和重要專著，以供研究东南亞經濟有关方面作参考，决于1959年元旦出版“东南亞經濟資料汇编”。暫定每季出版一期，以印度、印度尼西亞、緬甸、錫蘭、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馬來亞、南越、老撾、柬埔寨等国家及香港、澳門和日本与东南亞各国为取材对象。主要内容为：（一）各国的經濟状况及发展动态的报导；（二）华侨經濟状况；（三）有关各国的各种經濟統計資料；（四）有关对东南亞經濟研究的專論。

各机关、企业、学校、圖書館及經各单位証明介紹的个人，可凭有关单位介紹信向全国各地邮局定購。

試論黎族合亩制的社会性質

詹 慈 林 晓

黎族人口約有404,784人，主要聚居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白沙、保亭、乐东、琼中和东方五个县。黎族社会发展的具体道路，由于目前缺乏材料，还有待于将来进一步调查研究。但在解放前已进入了封建社会，这是可以肯定的。在白沙、保亭和乐东三县交界处的“合亩”地区，是黎族社会的一小部分，只有13,000人。虽然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直到解放前还保留着較多的原始公社的遗迹，但是同样已經进入封建社会。

解放后，合亩地区的黎族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1956年掀起了建立高級农业社的高潮，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在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掀起了生产大跃进的高潮，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正在迅速地开展，今年九月，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大办人民公社”的指示下，黎族人民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大步，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自治州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从合亩制到人民公社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关于解放前合亩制的社会性質問題，已經引起我国有关学术界的注意。1958年“理論与实践”第四、五期合刊发表的张迅同志“关于黎族合亩制的基本特征及其性質問題”一文，列举和評論了解放后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关于合亩制性質的四种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合亩制是原始的父系家長制的家族共耕社”。但是他同时又說“合亩的性質不是公社”，“實質上是一种私有制的家庭共耕組織”。究竟合亩制的性質是什么？从张迅同志的文章看来，确实使人摸不到头腦。既說是“原始的父系家長制的家族共耕社”，又說不是“公社”，而是“私有制的家庭共耕組織”，这表明张迅同志的文章中，思想很模糊，概念不准确，邏輯有矛盾。

本文主要是根据目前所得到的材料，从經濟基础方面对解放前合亩制的社会性質进行討論，并提出我們的初步看法。

一、合亩的几种类型

合亩是由若干农户組成的农业生产共耕組織。成員一般都有血統关系，有些包括外来戶。規模大

小不一，大部分是四、五戶，小的只有二、三戶，个别大的却有二、三十戶。每个合亩都有一个亩头，由具有血統关系的男長輩充任，一部分亩头本人已很少参加劳动或不参加劳动，产品分配多占“稻公稻母”^①。

合亩的形式有三个基本类型。

1、合亩規模較大，从十几戶至二、三十戶，几代都沒有分亩，家族公社的遗迹比較明显。

这类合亩只占极少数，合亩的成員包括一父所生的数代后裔以及他們的妻子，有些还包括义子。生产資料基本上是合亩共有。农具和部分耕地、牛只为各戶所有，土地仍无报酬地交由合亩共耕，产品按戶平均分配，由各戶独立消費。公有制的因素比較鮮明。

以旁系親屬組成的合亩也包括在这个类型的合亩，規模比較小些，一般十戶左右。农具都为各戶所有，耕地、牛只有合亩所有、合亩內几戶所有及合亩內一戶所有的三种形式，以前二者为主，但耕地一般也无报酬地交由合亩共耕，产品按戶平均分配，由各戶独立消費。

2、由上述类型合亩分化出来的父子合亩、兄弟合亩是合亩的基本形式。

父子合亩父子若干戶組成的，由父系担任亩头，兄弟合亩是兄弟若干戶組成的，由長兄担任亩头。父子合亩的耕地、牛只由父亲掌握全权，他有权处理生产資料的使用及轉讓。兄弟合亩一般都已把耕地、牛只分为各戶所有。有些兄弟已私自購買耕地和牛只，因而出现了生产資料占有的不平衡。耕地也由合亩共耕，产品按戶平均分配，各戶独立消費。但少数父子合亩的分配形式由父亲統一管理产品，共同消費。

父子合亩，兄弟合亩是在生产資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协作，實質是个体小农經濟，但是不能和汉区封建个体家庭等同看待。在这里，农业中的稻田由合亩共耕，副业及部分山欄由各家各戶独立經營。共耕的劳动产品，一般按戶平均分配，由各戶独立消費。沿袭合亩的形式，亩头收稻公稻母，仍

^① “稻公稻母”原是新丰年的稻谷，每块地收二把或三把，由亩头独占。

存在着简单协作和自然分工。

3、仅仅保留合亩的形式，内容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亩头与亩众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这类合亩的成员已经打破了血统关系，亩头多是地主恶霸或其他的剥削分子，亩众大部分是龙子，亩头个人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作为剥削手段。合亩劳动由龙子和其他亩众负担，亩头不参加生产，依靠剥削过活。按户平均分配的原则也全完被废除了。这种合亩是封建地主所有制的经济，所谓合亩只是一个躯壳而已。

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解放前合亩制生产以农业为主，牧畜业为辅，手工业还未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社会分工与交换不发达，本民族的市场与商人还没有形成。

根据我们调查，大约在2百年以前，农业中已开始使用铁制农具。但黎族人民不会熔铁及制造铁制农具，靠汉区输入是铁制农具唯一的来源。

铁制农具的种类不算很少，主要的农具大致上已经具备，其形状和质量大致与汉区相类似。只有手捻小刀不同汉区的镰刀，制造简陋，收割效率很低。大部分的农户都有主要的铁制农具。与铁制农具并存的还有木耙和种山兰用的尖木棒，这是原始的旧式农具的残留现象。

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使合亩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铁制农具种类和使用技术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不可讳言，合亩地区的生产技术和劳动经验仍然处在低下的水平，但并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极端落后”，它是在不断地提高和发展。黎族人民已普遍地用牛作为曳引力，稻谷已有选种，一般都是采用育秧的办法，秧地有施肥，在很早以前已修渠灌溉或用竹筒引水。另一方面还保留着落后的生产技术，如山兰地的“刀耕火种”①；一部分稻田用牛踩田②；不积肥施肥，除山兰地外，不进行中耕除草；收割用手捻稻③；劳动中严格的性别分工和每月有十二、三天禁忌日等。

从产量方面看，大致上已接近汉区一般山区的产量水平。据调查：保亭县福建乡解放前共有水田504亩，产量105,840斤，每亩平均产量210斤；旱田1779亩，产量303,480斤，每亩平均产量120斤。有些地区的产量水平可能稍低一些。

畜牧业主要是饲养牛只，狩猎捕鱼不发展，只有一部分人利用农闲进行。这些在生产中都不占重

要的地位，同时还残存着采集经济，主要是在饥荒岁月，挖一些山薯或采些野菜度活。

手工业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未形成独立的手工业者。编织由男人担任，种类有30多件，技术较低，效率不高。纺织由妇女担任，工具简单，效率也低。制陶由老年妇女担任，沿用原始的方法，产量很少，质量粗糙。

随着生产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了商品生产的萌芽。但是交换仍不发展，在黎族人民内部，主要是买卖土地和牲畜，在黎族人民和汉商之间的交换比较频繁。在很早以前汉商已进入黎族内地，主要是出卖生产资料，食盐和布匹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同时在当地收购土特产。此外，黎族人民还在附近的汉族市场进行交换。其价值形态有实物交换和货币交换两种，以前者为主。由于汉商早已在黎族周围建立了市场以及随后进入黎族内地，黎族和汉族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加以黎族商品生产还没有充分发展，因此，黎族内部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形成新的市场了。总的来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生产与交换都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

上述材料表明，合亩制生产力的发展仍然处在低下的水平，还保留一些原始的残迹。但从农业已占生产的主要地位，铁制工具早已广泛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水平和稻谷产量水平等各方面来看，它已远远地脱离了原始公社时期的落后状态，生产力的性质基本上已是属于封建社会的范畴。

三、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

(1)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科学地阐述合亩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对揭示合亩制生产关系的实质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农业是唯一独立的生产部门，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牛只和农具。土地是包括水田、旱田，为方便起见，简称为耕地。此外是山兰地。

恩格斯说：“对土地的完全而自由的所有权，不仅意味着可以毫无阻碍和毫无限制地占有它，而且

① 即原始的耕作方法，其耕作方法大致是：砍伐森林，焚烧树杆，清除烧掉树木，然后在雨天播种。

② 原始耕作方法的遗迹，踩田时，把牛群赶在田里来回踩踏。

③ 原始耕作方法的遗迹，用小镰刀把稻穗一穗一穗地摘下，每根长约一市尺。

意味着也可以出售它。”^①由此看来,确定土地占有性质的主要依据是所有权问题,即是否象私有财产一样地被固定独占,象私有商品一样地被自由支配。

耕地所有制的形式基本上有三种:一是合亩所有;二是合亩内几户所有;三是合亩内一户所有。合亩集体所有,即主要是指父子合亩,兄弟合亩而言。合亩内几户所有,即是合亩内父子、兄弟或叔侄若干户共同所有。合亩内一户所有,包括恶霸地主及其他农户而言。

必须着重指出,合亩内一户所有的耕地已占主导地位,合亩内几户所有次之,合亩所有更次之。

上述耕地三种所有制的形式基础上都是私有制的占有关系,其主要的根据有如下四点:

第一,固定独占。

原始公社所有制的实质,是生产资料归公社集体所有,这是公社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而合亩地区的公社所有制早已成为历史的名词,耕地所有权已被固定在合亩成员全体、合亩内几户成员和合亩内一户成员。你的、我的、他的耕地在观念上在实践上都是明确的,重新调整占有权已成为不可能的事了。

第二,自由支配。

所有者象私有商品一样地支配自己的耕地,排他性的支配权已经确立起来了。

至少在三代或四代以前,耕地已发生买卖,及至最近几十年已发展成为普遍的现象了。如白沙县毛贵乡番满等5个村共有耕地150.6亩,其中发生买卖的121.8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0.12%;乐东县番阳乡万板村共有耕地182.6亩,其中发生买卖的99.2亩,占耕地总数的54.615%。

合亩所有、合亩内几户所有以及合亩内一户所有的耕地买卖都是自由的,只要占有者需要和愿意便可出卖。同时,也出现了中人。

“象杂婚制与卖淫紧跟着—夫—妻制的足迹而来一样,如今典当也跟着土地私有权的足迹而来了。”^②至少在三代或四代以前便发生了耕地典当并且逐渐地发展起来了。与耕地买卖一样,合亩所有,合亩内几户所有,合亩内一户所有的土地典当都是自由的。典当有竹片契约,一端刻典当价格,另一端刻典当期限。

地租剥削早已产生,它是合亩地区的主要剥削方式之一。一般是实物地租,租额达40—50%。

由此看来,所有权在支配方面已充分地得到了实现,地耕不仅成为买卖的私有商品,且已变为剥削手段。

第三,占有的不平衡。

原始公社制度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社所有制,生产资料的占有表现为原始的、朴素的平等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集中,私有制的产生以及买卖的出现,原始的、朴素的平等性就必然转化为它的对立面。

合亩地区耕地占有不平衡早已发生了,而且已逐步走向不同程度的集中。

在村与村之间合亩与合亩之间,土地占有是不平衡的,如解放前乐东县番阳乡万板村每户平均耕地9.13亩,而定适村每户平均只有4.44亩,相差一倍以上;王老波父亲合亩共有5户,占有耕地82.4亩,每户平均16.25亩;但张亚久父亲合亩共8户,占有耕地22.1亩,每户平均仅2.7亩,相差6倍多。

在合亩内部各户之间,土地占有也是不平衡的,如白沙县毛贵乡什益村王友风合亩12户,共有土地38.8亩,其中亩头王友风和他的三个儿子即占有29亩,占合亩耕地总数的76%强。王友风的弟弟和堂兄弟及他的侄儿六户,占有耕地9亩,占合亩耕地总数的24%弱。龙子王元良、王元号二户则没有耕地。

必须着重指出,耕地占有已走向不同程度的集中。如保亭县毛道七个村共有耕地6858亩,其中恶霸地主王老本一户便占有184亩,占七个村耕地总数的26%强。乐东县番阳乡、保亭县福建乡以及其他各地也有类似的情况。

第四,男性直系亲属继承。

耕地私有制在继承权方面,表现为男性直系亲属继承财产,且已为习惯法固定下来了。

从上述的情况看来,耕地私有制已经很明显了,但是它又具有自己的特点,主要的表现是在使用权方面存在着公有制的因素,私人占有与集体使用结合起来。合亩内一户所有、几户所有的耕地,大部份都交由合亩集体共耕,除地主恶霸及其他剥削分子通过合亩进行剥削外,产品一般按户平均分配,不取报酬,这表现耕地私有制在使用权和收益权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实现。

大部分的山地及所有河流仍是全村全洞集体所有。所谓全村全洞集体所有,即公社所有制的占有性质。因为每个成员都是集体的所有者,平等地享有使用权。但经济价值比较大的山地,已由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了。

牛只所有制的形式与性质也和耕地一样,所有

^① 恩格斯著“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第160页,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同上书第161页。

权已被固定在合亩全体成员，合亩内几户成员或合亩内一户成员，所有者享有自由的支配权，占有也发生不平等了。

农具全部为一家一户所有，由各户购买、支配和使用，私有制在占有权和支配权方面都已得到充分的实现。

(2) 分配的不平等

按户平均分配是合亩制分配方式的基本形态。从表面看来，按户平均分配好像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它和原始公社按人口平均分配有本质的区别。主要由于各个合亩之间耕地占有的不平衡而形成了合亩之间分配的差异。同是一个村，分配的差别很大。如乐东县番阳乡万板村徐新东父合亩每户平均所得的稻谷1310斤，徐磊合亩每户平均所得的稻谷657.6斤。

按户平均分配的不平等性也表现在父子合亩和兄弟合亩之外的其他合亩内的各户之间。这是由于各户人口不同和亩头多收稻谷以及各户山栏稻、杂粮等收入不同所决定的。收入多的户有剩余，不断的扩大私有财产，收入少的户不够吃，慢慢地陷入贫困。

各家各户经营的杂粮和手工业品，都不是按户平均分配，谁经营其产品便归谁所得。

在恶霸地主当亩头的合亩，按户平均分配的原则根本被废除了，分配不平等的悬殊更大。如保亭县通什乡恶霸地主黄老关合亩共有兄弟五户，亲友十多户，龙子册多户。分配时将稻谷分成三份，黄老关兄弟五户独占一份，其余约有五十多户的亩众才得二份，前者的收入比后者多得五倍。恩格斯说：“因分配的差别，阶级的区别也产生了，社会分成特权的和无权的，剥削的和被剥削的，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级。”①合亩地区的情况正是反映了这一发展的规律。

(3) 阶级分化的状况

如前所述，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已经发生不平衡，并且走向不同程度的集中，占有生产资料较多的少数富裕户，已利用它作为剥削的手段。分配又发生不平等，这表明合亩制已经发生了阶级分化。

根据生产资料占有、使用以及在生产中的地位不同，我们把乐东县番阳乡万板村另一村的六个合亩，46户阶级分化的状况作如下的划分：地主一户，占总户数2.1%，耕地59.84亩，占耕地总数的23%，每户平均耕地面积59.84亩，富农二户，占

总户数4.2%，耕地55.15亩，占耕地总面积21.3%，每户平均27.57亩。中农13户，占总户数28.2%，耕地101.35亩，占耕地总面积34.1%，每户平均7.79。贫、雇农30户，占总户数的65%，耕地55.6亩，占耕地总数21.3%，每户平均1.85亩。

在地主阶级中，已经出现了恶霸，他们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一般还充任伪乡、保长或其他伪职，对黎族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的财富都是通过掠夺和剥削的方式而集中起来的。

这种情况，说明合亩制阶级分化已经是相当明显了，社会已经产生了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并不如张迅等同志所说的“阶级分化不明显”，“剥削才开始萌芽”，好像还是处在原始社会时代那样。

(4) 龙子的种类及其性质

至少在一百多年以前，龙公与龙子的关系便产生了。根据目前已掌握的材料，我们初步地把龙子分为三个主要种类，并将其特点及性质概述如后，借此透视合亩制的剥削关系与阶级状况。

1、带有奴隶性质的龙子。包括出卖龙子，债务龙子和一部分投靠龙子。

吸收龙子都有一定的手续及仪式，由龙公负责主持，并请村人及龙子的家属参加。有的还斩箭为凭。

龙子都要移居龙公家，一般的还要改称龙公的姓氏，担负合亩内的主要劳动，还无偿地为龙公服家内的各种劳役。在没有结婚立户以前，龙子都没有自己的家庭，寄居在龙公家，没有耕地、牛只及农具，不能享受按户平均分配的权利，受剥削最重。由于生活贫困，一般都是很迟才结婚，才能享受按户平均分配。但所得产品比亲属亩众，特别是亩头要少。结婚立户后的龙子，大部分仍没有耕地、牛只，少数依靠自己长期积蓄，购置一些耕地、牛只和农具。一般来说，龙子的财产得到社会上的承认，死后由自己的儿子继承。个别龙子也上升为中等户。

龙子的社会地位低下，不能担任亩头及村头。龙公与龙子的地位是世袭的。

龙公属于恶霸地主的，龙子受剥削受压迫就更加严重。龙公本人不参加劳动，妻、妾没有参加或只参加附带劳动。合亩内的主要劳动都由龙子负担，有些龙子还是在龙公棍棒监督下进行生产。如保亭县通什乡龙公恶霸地主王老瑞时常背枪伏在山坡上，或蹲在田基旁边监视龙子劳动，当龙子停止劳动时，他们便开枪威吓。此外，龙子还要服各

①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第183页，三联书店出版。

种家庭劳役。

寄居在龙公家的龙子和龙公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成婚立户后的龙子，每年也都缺几个月的粮。龙子的财产没有保障，随时受龙公掠夺的可能。龙子的生命也没有保障，人身没有自由。龙公可以任意打骂，甚至有打死龙子的现象。

2、带有封建隶农性质的龙子。这类的龙子最多，一般是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生命财产没有保障，或者由于纠纷被无理处罚，或者由于债务关系，为了求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保护和减免罚款，因而投靠地主恶霸或其他有权势的人为龙公。龙子多数是全亩全村集体投靠。拜认龙公都要经过一定的手续和仪式并当众“斩箭”立约。

最显著的特征，龙子没有移居龙公家，也不用改称龙公的姓氏。但对龙公存在着封建依附关系。农忙或当龙公修建房屋和谷仓时，龙子都要无偿地服劳役。有的拜认龙公后，土地也隶属龙公，龙子每年要负担一定的地租。每逢年节、婚丧或“做鬼”杀牲时，龙子都要给龙公送酒肉。捕获猎物后也要送礼。龙公一般每年有二、三次到龙子家里，龙子要摆酒席、送礼金。

除了上述集体投靠外，还有个别投靠的龙子。他们都要移居龙公合亩，并参加龙公合亩的劳动，享有按户平均分配，其社会地位比较平等。

3、带有雇佣性质的“工子”。即因雇佣关系而拜认龙公的则称为工子。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庭，不能养牲畜、搞副业。除担负合亩主要劳动外，还要做龙公家内某些劳动。工资一般很低，这种工子和汉区农村中的雇工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此外，还有一种“义子”，一般也称为龙子。但这种义子的性质与上述三种情况不同，它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义父义子的性质。

收养义子是由于自己无子或少子所引起的。义子都拜认义父的祖先，且改为义父的姓氏，不能和义父有血缘关系的妇女“放寮”、结婚。按习惯义子有继承义父财产的权利，且能继任亩头，其地位和亲生子没有原则上的差异。

四、简短的结论

(一)合亩是在家族公社瓦解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剩余产品的出现以及相随而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

(二)合亩地区基本上是自供自给的自然经济，农业占主要地位。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原始公社时代的落后状态，基本上已经属于封建

社会生产力性质的范畴，但与汉族地区相比，生产力的水平仍然是低下的，还保留着一些原始的遗迹。

(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合亩制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占有是不平衡的，土地已日益集中在少数的剥削者手上，地主阶级已逐步形成，龙子大多数是属于被剥削阶级，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另一方面，合亩制还存在着公有制的残余。私有制与公有制的矛盾是新的生产力与旧的生产关系矛盾的表现，这一矛盾以私有制战胜了公有制，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代替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而终结，然后又产生新的矛盾。

(四)合亩是在家族公社瓦解后向封建社会过渡的一种形态，解放前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在公社瓦解的过程中产生了家长奴隶制的因素，但是社会的发展不是走奴隶社会的道路，这主要是由于黎族社会的经济条件和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合亩地区不是脱离汉族，更不是脱离整个黎族地区而孤立存在和发展的。由于民族之间历史上长期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黎族和汉族早已形成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汉族封建生产方式的影响，对于黎族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合亩地区公社瓦解说明它本身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可以造成原始公社制度破坏的程度。另一方面，合亩外围地区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确立，汉族地区封建社会早已巩固，因而这个地区的社会发展是具有它自己的具体道路的，即不是沿着奴隶制的道路发展。而是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当黎族人民接受了汉族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并且广泛地应用起来之后，社会生产力就迅速地向前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生产力性质也就逐渐发生变化，这也就是说，汉族较先进的生产力和黎族合亩地区本身较落后的但是不断发展着的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成了黎族社会的生产力的内在联系，就逐渐摆脱了原来那种原始的落后的状态，因而也就使得合亩地区社会发展是从原始的家族公社向封建社会直接过渡。

虽然合亩地区在解放前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但和合亩外围的黎族地区比较起来，它保留着较多的原始公社的遗迹，与汉族地区相比，差别就更多更明显了。

由于合亩制地区的社会情况相当复杂，而目前调查的材料还很不够，因此，要科学地、全面地阐明合亩制的社会性质问题，还必须作进一步的深入调查研究，本文仅是对合亩制社会性质问题作一尝试性的探讨。

关于思维形式的正确性和内容的 真实性问题

——评一兵先生的“形式逻辑和客观真理”

李匡武

新建设第八期发表了一兵先生的“形式逻辑和客观真理”一文。一兵先生坚决地主张形式逻辑“只管思维形式的正确性，而不管思维内容的真实性”。文中的许多论点我们都不同意。

首先，一兵先生把思维形式的正确性和思维内容的真实性看成完全是两回事，这意味着把思维的形式和思维的内容割裂开来。在他看来，思维的形式和内容似乎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而只有外在的关系。因此，同一思维形式可以加入不同的内容，正如一个酒瓶可以装进美酒，也可以装进毒酒一样。他认为：如果所加入的内容是真实的，形式逻辑便成为真理的工具；如所加入的内容是谬误的，形式逻辑便成为诡辩的工具，而且“两者并不是对立的”。这样，在一兵先生的视野中，形式逻辑便成了一种中立的，超越的东西：可此可彼，无功无罪。其实，作为一门科学，形式逻辑决不能是中立的，超越的。一兵先生这种看法正好反映了他自己对待这门科学的中立的超越的态度。

正如思维的形式和内容密切地联系着一样，思维形式的正确性和内容的真实性也应该是统一的。当然为了便于讨论，把思维形式暂时抽出，并着重加以研究，这是许可的，也是符合科学分析的方法的。但是这决不等于说形式逻辑可以不管思维的内容。恰恰相反，它必须经常兼顾思维的内容，在可能和必要时（如检查推理是否正确时），必须充分顾及有关的前提和结论的真实性。这自然要牵涉到各种知识的特殊领域。形式逻辑虽然不能、也不应

包办各种特殊科学知识的探讨，不能“直接提供科学知识”，不能成为“万能”的科学。但它可以而且必须充分利用各种常识及其他各种科学的研究成果。这也不是对形式逻辑的特别苛求。随着科学的日益发达，现代的任何一种科学都必须与其他许多科学紧密地配合、互助，才可能确立和发展。

必须指出：企图把思维的形式和内容割裂并且只管形式不管内容这种思想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或形式主义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早已指出：

“如果形式（思维形式）被看作不同于内容而且仅仅附着于内容的形式，那末，形式就不能够把握真理。由于形式逻辑的这些形式的空洞，它们理应受到‘蔑视’和‘嘲弄’。同一律， $A=A$ ，是不堪忍受的空洞。”

“不应该忘记：这些范畴在认识中有自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它们还是应当有自己的意义。但是作为‘毫无所谓的形式，它们就会成为谬误和诡辩的工具’，而不是真理的工具”（68页）

在这里，列宁明显地指出了过去那种脱离内容的形式主义逻辑的弊害，和形成逻辑的“修正”的正确方向，也就是赞成将旧有形式主义逻辑改造为“真理的工具”，而不让它继续充当“诡辩的工具”。

一兵先生的主张是前后不一致的。当他主张形式逻辑只管思维形式的正确性，不管思维内容的真实性时，在他心目中所想到的也许只是“一般人所使用的形式逻辑”。但他自己又似乎另有一种看

法。他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堅決主張真實推理，反對虛偽推理；研究思維形式同時必須着重研究思維內容”。在這裡他也好像看到：將形式和內容分割的看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對於形式邏輯的研究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去進行；而且研究形式必須兼顧內容。如果確係如此主張，當然是正確的。但這種主張和前面那種中立的、超越的態度毫無共同之處。

其次，和一兵先生那種只管思維形式不管思維內容的主張密切聯繫的是他對形式邏輯底作用的看法。他認為“形式邏輯是管人思想條理的學問”。這樣說法顯然是不夠全面的，他排斥了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形式邏輯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作用。關於形式邏輯是否有助於認識客觀世界問題，一兵先生的答案是含糊其詞的。他說：“我們認為形式邏輯可以成為真理的工具，這絕不是把形式邏輯和真理的工具等同起來，那樣，就不適當抬高形式邏輯的身分，貶低甚至排斥辯證唯物主義哲學，這無疑也是錯誤和有害的觀點”。我們認為形式邏輯本來就應該是真理的工具之一。至於一兵先生所說的可以成為“詭辯的工具”的所謂“形式邏輯”，都是唯心主義者的把戲，和科學的、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形式邏輯毫無相同的地方。他上面這番話只表明他對於形式邏輯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真正關係還缺乏確切的理解。他似乎很耽心人們會誤將形式邏輯絕對化，並以形式邏輯代替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他說：“形式邏輯既然能解決認識問題，那又何勞辯證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可以休矣，形式邏輯可以大大興旺，成為萬能的科學”。在我們看來，這種顧慮是多餘的。形式邏輯所能起的認識作用，只限於客觀形勢在相對穩定的狀態下，超過了這個“家事範圍”（即在客觀形勢發展變化的情況下），形式邏輯便無能為力，而必須有賴於辯證唯物主義（或辯證邏輯）。恩格斯會十分正確地把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的關係比作研究常數的初等數學和研究變數的高等數學的關係，在辯證邏輯指導下，形式邏輯能起初步認識客觀世界的作用，因為它的規律就是客觀世界在相對穩定狀態下的若干共同特點的反映，是人類通過總結無數次實踐經驗得來的成果。因此，我們當然也能借這些規律來認識客觀世界在相對穩定狀態下的面目。這不但在理論上講得通，而且也是經人類無數次實踐考驗過的。

在這個問題上，一兵先生的觀點也是模糊混亂的。他一方面在口頭上承認“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對

形式邏輯必須加強指導”，另一方面卻又強調“形式邏輯和辯證唯物主義兩者不能相提並論”；一方面主張“形式邏輯不研究客觀真理”，同時又說形式邏輯在批判錯誤論點（在我們看來，這是尋求客觀真理的方法之一）時能起一定的作用。他說：“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批判中所使用的理論武器，主要是依靠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而不只是一般人所使用的形式邏輯”（重點是本文作者加的）。從這句話看來，一兵先生是同意形式邏輯在批判謬論中能起一定作用的。事實上，無論在尋求真理、反駁謬論（亦即企圖正確地反映客觀事物）時，總是形式邏輯（在辯證邏輯指導下）和辯證邏輯並用（後者自然能起着更大的作用）。但不管怎樣，形式邏輯還是認識客觀世界的必要的（但非充足的）工具。因為即使在運用辯證邏輯時，也還是要符合概念明確，前後一貫，不自相矛盾、不模稜兩可及理由充足等形式邏輯底基本要求的，也就是要遵守形式邏輯底基本規律的。這樣說是否成立呢？我們認為是成立的。因為形式邏輯既然是在辯證邏輯的指導下發展或“修正”的，辯證邏輯的遵守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實質上就是遵守自己的規定。

一兵先生否定形式邏輯底認識作用的另一理由是、認識決定於實踐。他認為只有馬克思主義哲學才是從實踐中產生，又反過來指導人的實踐的。形式邏輯卻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他反問說：“這和形式邏輯有什麼關係？形式邏輯如何統一論證與認識？持有上述錯誤觀點的人，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可謂一竅不通”。在這裡，一兵先生首先肯定了實踐的重要性，承認它是認識的基礎，這是正確的。但問題是：不但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與實踐相始終，而且一切科學都是從實踐出發，在形成、發展中貫串着實踐，最後回到實踐。換句話說，一切科學都是從生產勞動或階級鬥爭的實踐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實踐是真理的標準，是貫串着人類一切認識的過程的。通過實踐，人類才能掌握自然和社會的各種規律。任何科學的規律都是客觀世界某些規律的反映，因此也都有助於對有關的客觀真理的認識。譬如天文學就是人類應航行、種植、觀測氣候等需要並在勞動實踐中產生和發展的；幾何學是因人類丈量土地、分耕田畝等實際需要而逐漸形成的。其他科學也莫不如此。邏輯學自然也不例外。它是應追求真理、駁斥詭辯的需要而形成和發展的，又何嘗是人類頭腦中的主觀產物？邏輯思維的形式和規律是人類通過無數次經驗實踐而保留下來的成果（不正確的已被逐漸淘汰），是客觀世界在

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的若干共同特点的反映。因此它們具有客观的性質，不能由人任意創造或取消（虽然可以不遵守它們而致犯邏輯的錯誤）。它們一經創設，又被用以指導思維活動，被用以分析、檢查議論的正确性，使人們減少或避免邏輯思維的錯誤。这样看来，怎么能說它們与实践无关呢？

其实，列宁早就正确地指示：“人的实践經過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識中以邏輯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見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質”（哲学筆記204頁）。

总之，我們不能同意一兵先生所主張的：形式邏輯只是“管人的思想条理的學問”，只問思維形式的正确性而不管思維內容的真实性。因为这种脫离实际、实践的形式主義邏輯是有害的，是同馬列主義的根本精神相违背的。一兵先生不从实践、客观实际方面去理解邏輯底形式規律的来源、意义和运用，竟究这种“管人思想条理的學問”底根据是什么呢？如果沒有了客观根据，凭什么东西可以保证这些形式規律本身的可靠性和全人类性？为什么邏輯規律的遵守会意味着思想条理的清楚？对于这些問題，一兵先生既不愿从客观世界的規律中去找答案，必將无法解释清楚。

照一兵先生的說法，美帝国主义宣传說：“任何国家是爱好和平的，美国是資本主义国家，所以美国是爱好和平的”，这个論式是合乎形式邏輯的，它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但他接着指出：“我們知道这个論式是美化美帝国主义，是一种詭辯”。那末，在一兵先生的看来，世界上竟然可以有“合乎形式邏輯”的“詭辯”存在。这真是一种滑稽的奇談！一兵先生所說的“形式邏輯”究竟是辯證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科学的形式邏輯，抑是唯心主义指导下的或“超越”唯心、唯物的中立的所謂“形式邏輯”？

这兒的關鍵性問題仍然是对待一門學問的立場观点問題，或科学的階級性問題。有些科学（包括形式邏輯，自然科学等）的規律本身可以沒有階級性，但作为一門科学，总包含着立場观点問題或階級性問題。不但邏輯思維的形式和規律的使用有立場观点問題，关于它們的研究討論也不可避免地与立場观点紧密地联系着。一兵先生只承認它們的使用具有階級性，却不知道它們的研究探討也包含立場观点問題。換句話說，尽管邏輯思維的形式和規律本身是全人类的，“是敌我共同使用的工具，是沒有階級性的”，但是作为一門科学，决不能只包含一些形式規律，而不可避免地还包含一些有关它們

的来源、意义、用法等的理論或主張。譬如在資產階級的學者看来，形式邏輯的形式規律是“天賦”的。他們要把邏輯的形式規律絕對化——即不須接受任何指導，因而否定了辯證邏輯；企圖把它們和实际、实践割裂；同时又利用它們来进行詭辯，以欺騙、麻醉人民。这不是最明显的階級性的表現嗎？也許有人說，那些形式規律一方面能成为少数剝削階級的工具，同时又可以成为人民大众的武器，可見它們並沒有階級性。但思維底形式規律的使用决不是盲目的，却总是和使用它們的人的目的任务以至立場观点連結在一起。这样看来，它們的应用仍然与階級立場分不开。

一兵先生象其他許多人一样，籠統地認為形式邏輯沒有階級性。这是和主張思維的形式規律本身具有階級性一样地錯誤的。他似乎認為形式邏輯的研究和使用可以和研究或使用的人分开。他混淆了形式邏輯的形式規律本身和作为一門科学的形式邏輯（或根本忽視了这种区别），并从前者的缺乏階級性推及后者也缺乏階級性。其实，作为一門科学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的理論，如果不是辯證唯物論的，就一定是各色各样的唯心主义的。中立、超越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除非形式邏輯接受了辯證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導，成为人民大众革命斗争的武器，否則一定成为各色各样唯心主义思想的俘虜，成为形式主義邏輯；变成空洞的、死气沉沉的概念游戏，变成少数剝削階級愚弄人民的工具。这門科学本身也不可能向前健康地发展。欧洲中世紀时代的以至近代資產階級的“形式邏輯”便是明証。

这样看来，一兵先生的那种似乎中立的、超越的“形式邏輯”是不可能存在的。它實質上就是非辯證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形式主義邏輯。科学不可能象一兵先生所主張的分为两类：一类是有階級性的，另一类是沒有階級性的。如果这种說法确能成立，則所謂沒有階級性的科学（如自然科学，形式邏輯等）的研究者將可以閉門造車，不需要結合实际，不需要向工农学习，也可以不为工农服务。但这些正是資產階級所日夕想望、欣賞和实行的。

最后，應該指出：一兵先生的論点目前在國內决不是孤立的，它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这一类思想在目前我國邏輯學界中似乎还占着优势。它有着長远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是中世紀以来特別是康德以来邏輯學發展中的一股逆流。在目前，它是以反抗馬克思列宁主義邏輯思想为目的的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表。我們必須充分加以揭露和批判，充分認識它的反科学性和危險性。

韓愈思想批判(下)

杨荣国

(二)韓愈倡导性三品說是在维护当时社会的身分性，但其实質，他是肯定人性之为善——这一所秉賦于人的“客体的实在”。

这客观存在的“五常之教”秉賦于人类而使人性之成为善，至人之所以为恶，乃是那属于后天的接于物而生的“情”的关系；如果要使这接于物而生的情能不为物所誘的話，那么，如孟軻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为善矣。”①按“若”字作“順”字解或作“如”字解，則是“順其情”或“如其情”，如是則“順其情”或“如其情”，則可以为善，因而韓愈对于七情要“动而处其中，”則可以为善，亦即是孟軻的“順其情”或“如其情”，則可以为善。既如此，則人之情虽是接于外界事物而生，但亦无须对于外界事物有所改良或改造，而只要以人所秉賦的善性，——如“順其情”“如其情”或“动而处其中”之謂，則自亦可以为善了。所謂“苟能乐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恶而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实大。”②就是这个意思。

从对韓愈的人性論的分析，亦看出韓愈在政治上之和王叔文他們为敌，自不是偶然的！后者坚持对当时腐朽了的政治必須有所改造，才能适应新兴势力之发展，才能对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前者則反是。五常是客观存在着的真理，人們只要对所秉賦的五常扩而充之或是引情归善，就可以向善的方面发展，这是各个人自己的事，并不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有若何的不好而要加以改良或改善。这意思很明白，就是韓愈对当时政治环境不仅采取肯定的态度，并要在旧势力的基础上來维护当时的政治局面的統一，因而他的肯定“五常之教”是“与天地皆生，”——亦即肯定“五常之教”是客观真理性的东西而不可移易，借以维护以旧势力为基础的政治上的統一。所謂“唐承天下之命，遂臣万邦，”

“孰为不順，往斧其吭，”③从而达到他的“同我太平”的目的。

至韓愈在“性說”中虽批駁那“禿佛老而言性”的“奚言而不异？”亦即表明他自己之言性不同于佛老，實質上，从佛家的思想來說，他的分別性与情——認為“性”是“与生俱生，”而“情”是“接于物而生”的这种思想，实系受有佛家思想的影响；佛家的所謂“本心”与“无明煩惱，”如云“不識本心，学法无益，”④——这“本心”即韓愈的人之所为“性；”又如“无明为惑網之淵，貪愛为众累之府，”和“无明掩其照，故情想碍滯于外物。”⑤这“无明”即韓愈的所謂接于物而生的“情”，所以說是“惑网之淵，”——为外物所迷惑而生的，因之，佛家有所謂“浮屠不三宿桑下，”就是“不欲久生恩愛”⑥之故。而韓愈之称赞老僧大顛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所乱，”又称他“胸中无滯碍，”⑦他又說：“虽外物至，不膠于心。”⑧都是显著的証明。于是說來，韓愈的这一思想內容，實質是佛家的內容，而所装上的，却是儒家的瓶子。

由于韓愈的反对佛老，不是从佛老的思想內容而进行駁斥，而只是反佛老之脱离现实；——当然反佛老之脱离现实，从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上來說，这自有其积极意义；但是，由于韓愈不是站在当时进步政治立场，不从进步的政治立场而对佛老思想进行批判，反而依附旧势力，在维护旧势力的基础上而反对佛老之脱离现实，結果自己思想亦不

①孟子卷十一告子章句上。

②韓昌黎集卷十八答元傳御書。

③韓昌黎集卷三十平淮西碑。

④六祖坛經。

⑤弘明集卷五慧远明报应篇。

⑥后汉書卷六十襄楷傳。

⑦韓昌黎集卷十七与孟尚書書。

⑧同上卷二十一送高閑上人序。

免于脱离现实。他之以“五常之教”为一独立的客观的存在，从“五常”所秉赋于人类，形成人之所为性，是善不是恶，至人之所以为恶，则是那接于物而生的“情”。虽是如此，但亦无须给那生情的外物——政治环境或社会环境——以改良或改造，原因人之所为性是善，只要情动而处其中，自可引情归善。于是说来，不深入现实给现实以改造，而只要自己内面作工夫，借以引情归善，成为善的环境，这，不同样是脱离现实的吗？当然，我们知道，韩愈的思想，是在于在维护旧势力的基础上，依靠宦官势力，削平藩镇，从而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政治。为此目的，于是肯定“五常之教”是一个独立的客观存在，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人不可能违反，如王叔文他们，对当时政治有改造的意图，便是违反“五常之教”——建立这样一种客观唯心论思想，以之来维护和加强这封建的中央集权政治。

从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中，与之相适应的工商业，亦逐渐抬头，工商业从抬头中而大量购买土地，形成社会的非身分性的新兴力量，因而引导到均田制的破坏和庄园制的兴起；而封建统治者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因自己所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致经济权力亦因之而日形削弱，但在另一方面，地方势力倒因土地的私有化，和因土地私有化而兴起的庄园制——在这一过程中，倒是地方经济权力因而扩张，无须在经济上对中央有所依赖，因而容易酿成藩镇的割据。在这情势之下，封建统治者中央为了消除藩镇的割据，就需如何来控制经济与政治的权力，从控制经济与政治的权力中以加强中央的力量，巩固中央集权政治。随着这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政府所能控制的土地愈加减少，①因而从唐以后，以至宋元明清，中央集权政治，便愈益加强，而形成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而唐以后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家，对于韩愈的“原道”与“原性”——这一客观唯心论的思想，特别感兴趣，并从而发展了。其原因就在于：把理念的东西，说成是客观存在着的东西，既如此，这一理念的东西，便是天经地义的，不可违反的，亦从而说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是天经地义的，不可违反的。

明代唯心论思想家薛瑄这样说：“当韩子之时，异端显行，百家并倡，孰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为相传之正统？又孰知孟軻氏后而不得其传？又孰知仁义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尊孟氏之功，不在禹下？”“若此之类，大綱大节，皆韩子得之遺經，发之身

心，见诸事业，而伊洛真儒之所称许，而推重者也。”②另一方面，所不接受的，就是他的“博爱”“三品”之语，认为“有未莹者。”③

所以从人性论方面探讨，韩愈亦是客观唯心论者。这一客观唯心论思想发展至宋代的程颢而进一步体系化。

(三) 韩愈似无神论而实为有神论

韩愈反对事佛，又反对求神仙，这个自是韩愈的特色。

首先他在“谏迎佛骨表”④中说他这样反对佛，但“佛如有灵，能作祸祟”的话，那么，“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这样说“假如释氏能与人为祸祟，”亦“非守道君子所惧，”又“况万万无此理；”“且彼佛者”，“其身已死，其鬼不灵。”⑤意思佛是不会有灵的，故不能为祸祟。

其次，对于神仙之说，他这样写诗道：

“神仙有无何眇芒，桃源之说诚荒唐。”⑥

“乃知仙人未贤圣，护短凭愚邀我敬；”“我能屈指自世间，安能从女巢神仙。”⑦

①按南宋赵昀（理宗）时，贾似道有：“买公田以罢和籴的措施。”事见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志上一及卷四百七十四贾似道传，其详宋史纪事本末有专条记载。在贾似道的主张之前，并有“…殿中御史谢方叔言”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为今之計欲便国便民而办军食重楮价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到“贾似道当国”，“乃命殿中御史陈堯道…等上疏言”：“…将官户田产逾限之数，抽三分之一，回买以充公田，但得一夕万亩之田，则每岁可收六、七百万之米。”以后景定四年六月，便和平江、江阴…等六郡“已买公田三百五十万亩。”又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之一曰：“明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等。又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三十，元代以江南田赐臣下条云：“今检宋元二史，究其由来，…元代所赐臣下之田，即南宋之入官田；内府庄田，即贾似道创议所买之公田也。…元之有天下也，此等田，皆别领于官…”，这些都说明唐以后至宋元明的统治者手里已不可能掌有大量土地。

②薛文清公读书录卷三诸儒条。

③同上。

④见韩昌黎集卷三十九。

⑤同上卷十八与孟尚书。

⑥同上卷三桃源图。

⑦同上卷七记梦。

“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他又写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义以为不足为，是誠何道耶？”“則說神仙者妄矣！”①

“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他又写道：——“杀人不可計，而兴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②

按：从汉魏以至隋唐，事佛求神仙之所以盛行，从封建統治者方面來說：一壁虽是封建統治者自身从极端享乐中而企图自身之長生不老，永远享用这种高度的剝削生活；但另一壁，主要的，則在从倡导事佛求神仙中，以汨沒被剝削者的反抗意志，使自己的統治能臻于永远。但从被剝削者方面來說：有的則企图逃避剝削，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而有的則利用之以图組織群众，而力图反抗。③即如公元七八年（往宗貞元三年）資敬寺僧李广弘和尼智因即利用佛教組織群众，以进行起义，便是显著的一例，④（见旧唐書卷12德宗本紀上，又卷144韓游瓌传亦有詳細紀載）除后者自是不得已，与自是正义的以外，而前者的意图显然是可惡的。这不仅使人的理性的发展受到局限，同时亦削弱了劳动力，影响了社会的生产。所以韓愈所提出的反对理由，大意亦是如此，認為事佛求神仙——則使得人民“易惑难晓，”而又引导“老少奔波，弃其业次。”⑤——这一切，从当时來說，自有它的积极意义，自起了它一定的进步作用。这一点，自是不容抹煞的！

韓愈除了反对事佛求神仙外，对后汉反对讖諛反对迷信的王充之称赞，說王充“閉門潜思，論衡以修，”⑥又頌扬“桓潭不讀讖；”⑦这样說，韓愈自是一个与王充桓潭一般的反迷信的无神論者。但是我們要知道，根据前两章的分析，韓愈的思想是客观唯心論。客观唯心論者，就是認定有一种精神是独立存在于客观世界的。这种独立存在的客观精神，从韓愈來說，就是人之所以为性的仁义礼智信，就是“与天地皆生”的“五常之教，”就是“善”，就是“理，”亦就是他的所謂“道，”而其实际就是所謂“神”。所以他在“原鬼篇”⑧明确地这样指出：“漠然无形与声者，鬼之常也。”——意即神是独立存在于客观世界的。只是，由于韓愈不認定鬼是有形有声且有气的，而認定鬼是无形无声且无气的，是独立存在于客观世界的一种神，并非是人死而为鬼，并非鬼有形象地出现于人世而作威作福，这样說，韓愈好像是个无鬼論者，而所謂有鬼只是“民之为之，”——是人的精神的作用；因为之李石在“原鬼”下注释着說：“退之作

原鬼与晋阮千里相表里，至作罗池碑欲以鬼威诱人，是为子厚求食也；送穷文虽出游戏，皆自叛其說也。”⑨按：晋阮千里，名瞻，“素执无鬼論，物莫能难，”⑩說韓愈与之相表里，自是說从韓愈的“原鬼”看，韓愈和阮千里一般的是无鬼論者，但不知为什么作罗池碑与送穷文，又証明有鬼，这样說，自是和“原鬼”的意思相反了，这不是“自叛其說”嗎？可是李石不能理解，韓愈的思想是客观唯心論，客观唯心論者認定这一客观存在着的理念的东西——神，它秉賦于人类，便是仁义礼智信——人之所以为性；如果人之性为据于物而生的情所影响，而表现为惡时，如“有忤于天”“逆于伦”等等，⑪則有所謂天良之发现而感到惶惑，于是認為有鬼，实际上从他看来，是人所秉賦的这一客观精神在支配着。所以韓愈在倡导客观唯心論思想中，从表现上看，好象是否定了一切迷信，一切的神鬼观念，但在实質上，他的神的观念，不仅沒有放弃，而是巧妙地把神从一种更高级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从而肯定这种神是一个客观的永恒存在，是天經地义的。这一点，自为李石所不能理解。其次，凡唯心論者都与宗教迷信的思想紧相联系着；所以韓愈在“原鬼”中虽表现为无鬼論，但

①韓昌黎集卷十四进士策問十三首。

②同上卷三十四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銘。

③除道教倡始人張陵一开始便是以道組織群众，进行反抗外，利用佛教以組織群众的亦不少，如晋書載記卷一百零六石季龙上云：“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仪，自称佛太子，从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易姓名为李子杨游于郾县爰赤眉家，類见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龙、严誡、謝乐等等，聚众数千人于杜南山，子杨称大皇帝，建元曰龙兴。”所以魏書卷四十七盧玄傳：高祖議伐萧迹，盧玄子盧淵表曰：“臣又聞流言，关右之民，自比年以来，竟設齋会，假称豪貴，以相扇惑，显然于众坐之中，以誘朝廷，无上之心，莫此为甚！愚謂宜速懲絕，戮其魁帅，不尔，惧成黃巾赤眉之禍。育其微萌不芟其毫末，斧斤一加，恐蹈害者众。”

④⑤俱见韓昌黎集卷三十九“諫迎佛骨表”。

⑥同上卷十二后汉三賢贊三首。

⑦同上卷八与孟东野同宿联句。

⑧同上卷十一。

⑨同上原鬼下注。

⑩晉書卷四十九沈瞻傳。

⑪韓昌黎集卷十一原鬼。

因他的思想是客观唯心論，所以他之作“罗池碑”与“送穷文”之肯定有鬼，肯定鬼之可以作威作福，自是无足怪的！李石对这一点，自也无所理解，因而認為“罗池碑”与“送穷文”，比之“原鬼”是“自叛其說”，实际上唯心論与唯神論是有它不可分离的統一，而无所謂矛盾，故亦无所謂“自叛其說”。

我們又知道，韓愈为了維護和加强以旧势力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故倡导客观唯心論，以是“五常之教”“与天地皆生”是客观独立存在的東西，它賦予人，故成人之所为性；如果人因那接于物而生的情所誘而为惡，“沒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它可以以所謂天良的发现而使人感到惶惑不安，在形成社会輿論中而使人“畏威而寡罪，”它是通过堯舜而显现出来的客观真理，是天經地义的。韓愈就从意識形态方面以这所謂天經地义的东西，作为維護和加强这以旧势力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政治之理論的根据。虽然韓愈辟佛老，把人从对佛老的迷惑中而清醒过来，引导人的理性的回复，在这一点上自有它的进步的意义；可是；另一方面，他从建立以儒术为主旨的道統中認定“五常之教”是“与天地皆生”——是天經地义；这一来，又給人心灵以另外一种的桎梏作用；这一种桎梏作用，一則今后必須遵守以儒术为主旨的道統，同时，今后誰也不能“灭其天常，”不能使得“三綱淪”①“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誰违反了它們，誰就是异端，誰就是名教的罪人。于是說来，这一桎梏的作用，自是更为深刻，这就成了后来統治者“以理杀人，其誰憐之”②的张本。

四、韓愈的文学改革和文学改革之为宣扬这一所謂“客体的实在”而服务

关于韓愈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他学生李汉这样写道：“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謂雄伟不常者矣。”③

本来社会发展至隋唐时代，由于生产力的抬头所引导出那为封建阶级服务的工商业的逐渐发达，因而引导到那非身分性的新兴的地主阶层亦日益成長，亦因之社会事务增多，人事接触頻繁；在这前提之下，反映在文学上，文学革新的要求便益形迫切，反对那局限思想内容的駢体文运动亦早在酝酿，如較韓愈稍前的柳冕即提出了“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④的主张，可以概见。

只是到了韓愈手里，因条件的更加成熟，加上他主观的努力，故取得了这一革新运动的胜利。这就是李汉說韓愈在文学方面的摧陷廓清之功。

至他在文学上的摧陷廓清之功的具体內容，其在形式方面，就是八个字：“文从字順”⑤，“务去陈言”，⑥一意即文字要暢达，而不要用陈套語，如駢体文，就是陈套語多，且因形式的局限，許多意思无从表达。至如何才能达此目的，他的意思就是要“能自树立不因循”⑦——意即要有創造性。

所以說“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自言，自成一家新語。”⑧又說他“造端置辞，要为不蹈袭前人者。”⑨而韓文“陈言之务去，”或“未尝效前人之言。”⑩李翱早已指出这是韓文的特色。如此說来、他领导的这一文学形式的改革，从当时來說，自是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只是王安石曾說韓愈“力去陈言夸未俗，可憐无补費精神。”⑪王若虛亦曾說：“笔力如韓退之，而順宗实录不愜众論。”⑫按王氏这話自是根据旧唐書所指出韓愈的順宗实录“繁簡不当”，“拙于取舍”“为当代所非。”⑬由是而知韓愈自己虽作如此改革的主张，但“力去陈言，”和“文从字順，”他自己并未十分做到。何况，另一方面，他在順宗实录中歪曲史实，誣蔑王叔文等，这个，自也是“不愜众意”和“为当代所非”的一个关键性的所在。

当然，內容决定形式，这种在文学形式方面的革新，自是因生活內容的日益丰富而不能不給予文学形式以新的規定，所以在唐代，文学革新是一个普遍的呼声，比如柳冕早就倡导“文生于質，”⑭

①韓昌黎集卷十七与孟尚書書。

②见戴震孟子字义疏証卷上理条。

③李汉所写韓昌黎集序。

④唐文粹卷八十四柳冕与徐給事論文書。

⑤韓昌黎集卷三十四南阳樊紹述墓志銘。

⑥同上卷十六答李翱書。

⑦同上卷十八答刘正夫書。

⑧旧唐書卷一百六十韓愈傳。

⑨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六韓愈傳。

⑩前一句见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載言書，后一句见問書卷十一韓吏部行狀。

⑪王临川集卷三四韓子。

⑫滄南遺老集卷二十二新唐書辨。

⑬旧唐書卷一百六十韓愈傳。

⑭唐文粹卷八十四柳冕答揚中承書。

倡导“有其道，必有其文，”^①就是認定內容決定形式。而韓愈亦提出了：

“先乎其質，後乎其文”。

“薄于質而厚于文，斯其不類于欺欺？”^②

可知韓愈是著重於文學內容；有了文學的內容，自有與之相適應的文學形式；反之，從有形式，而無視其內容，這是不合於文學革新的要求的；文學之所以要革新，就是因為內容之發展——社會生活豐富所致。這，自有它進步的意義。

因而關於當時的社會現實，在他的文學內容是有所反映。

“是年京華旱，田畝少所收；”——韓愈寫道：——“有司恤經費，未免煩征求，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傳聞閭里間，赤子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親逢道邊死，佇立久啜唾，澆舍不能食，有如魚中鈎。”^③

“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韓愈寫道——“遇宦者稱宮市取之，才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持驢——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④

不論從文與詩，韓愈是報導了當時若干的社會現實，且通過這許多的社會現實，給予他對於社會發展的祕密亦在作探討，亦在進行發掘，這，從他提出如下的疑問：就可以知道：

“人之仰而生者，谷帛，谷帛豐，無飢寒之患，然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智愚所同識也。今天下谷愈多，而帛愈賤——（多而賤之意）人愈困者何也？”^⑤

他這話雖是探討的口吻，但從這話的精神看，社會發展的祕密——即這一問題的本質，他是見到了的。

韓愈之能見到這一真理，除社會所給予的影響外，因少時“貧賤”而“衣食於奔走，”^⑥自是一個關鍵。可是雖是如此，雖然他見到了這一真理，但因他受伯兄韓會思想的影響，他認為“身居窮約，”如果“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⑦並將這所謂“志”示及他的兒輩。^⑧在這一思想指導之下，他不僅不能和王叔文他們一道以求得當時政治上的改造，從政治的改造中而改善民間的疾苦，反而維護那以宦官俱文珍為首的腐朽勢力而和王叔文一班進步力量相敵對，由俱文珍的血手而置王叔文他們於死地，或遭貶斥，自己則從而歌頌

之，說這朝廷的這種“誅流奸臣，”是“朝廷清明，無有欺蔽。”^⑨

由於他的政治立場如此，所以他的文學，雖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若干社會現實，而其實際目的是在於宣揚他那維護的舊勢力為基礎的統一的這思想上的工具——“道”。

韓愈這樣說：“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⑩

他又說：“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⑪

這裡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他在文學形式方面以復古為解放，如他說“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為之最，”^⑫即從崇尚漢代人物的古文中以解放當時那局限內容的文体。另一点則是：其所以要解放文体，就是要通過這解放了的文体以宣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道。所謂“約六經之旨以為文，”^⑬根據以上對於韓愈思想的分析，我們就知道，他這所謂“約六經之旨以為文，”——所宣揚的“道”，實際上，就是宣揚他客觀唯心論思想。他曾說：“學所以為道，文以為理，”^⑭“道”與“理”，就是他宣揚的客觀的實在；從他看來，而人之為文，就是為了這所謂客觀的實在，從宣揚所謂客觀的實在中，以維護和加強這以舊勢力為基礎的中央集權政治。

由是而明白，韓愈的所謂文學內容，實質上，就是“道”，就是“理，”——這一他所認為的客觀的實在，他的客觀唯心論思想。而他的這一客觀唯心論思想，實際說來亦就是為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服務的思想。

①唐文粹卷八十四柳冕答荊州裴尚書論文書。

②韓昌黎集卷十六答陳生書。

③韓昌黎集卷一寄三學士詩。

④同上外集卷七順宗實錄卷二。

⑤同上卷十四進士集問十三首。

⑥同上卷十七與陳給士書。

⑦同上卷十八與鳳翔邢尚書書。

⑧同上卷六符讀書城南及卷七示兒詩中，符讀書城南詩云：“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不見三公后，寒飢出無驢，”于此可見。

⑨韓昌黎集卷一元和聖德詩。

⑩同上卷十六答陳生書。

⑪同上卷十六答李秀才書。

⑫同上卷十八答劉正寬書。

⑬同上卷十六上宰相書。

⑭同上卷二十送陳秀才彤序。

(五) 簡明的結語

从以上对韓愈思想的分析，我們知道，韓愈虽在某些方面，如辟佛老思想之脱离现实，寺观之浪费人力与物力，以及倡导文学之革新，使文学能与发展中的社会现实相适应等等，这一切，又虽然这一切，是当时社会发展的整个趋势，故在他以前早有所酝酿；可是，因客观条件的酝酿成熟，他的反对与倡导，便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个，自是肯定的！虽是如此，但由于他在政治上是依附旧势力，是在于维护和加强以旧势力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政治；因而在思想上，则在倡导客观唯心論——五常

之教的思想，这样来肯定这维护和加强以旧势力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政治是天經地义。

且他这一客观唯心論思想，不論表现在原道方面的，原性方面的，以及表现在文学方面的，都对宋以后的思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程朱的客观唯心論，亦是由韓愈肇其端；当然，韓愈思想之所以能給予唐宋以后思想界以极大的影响，自是从唐以后因生产力之进一步发达而引导工商业之进一步繁荣致封建政府不能不控制政治經濟和軍事各方面的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專制主义的統治，亦从而需要一种被認為是天經地义的客观真理性的思想，以証明这种統治之为絕對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統治，并从而维护之。

苏联东方学專家到广州講学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东南亞国家組組長、經濟学博士B·瓦西里叶娃和該所研究人員历史科学后补博士Г·И列文遜，于上月26日到达广州进行参观訪問。

在广州期間，瓦西里叶娃同志先后对科学工作部門和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員、教师等，介紹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工作情况，作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的危机”的学术講演；列文遜同志也作了东南亞国家工人运动的几个問題”的学术講演。并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中山大学进行参观訪問。厦門大学校長王亞南也应邀前来参加了这次的学术活动。在此期間，双方对开展东南亞国家的研究工作問題，进行了广泛的交談，还互相交換了一些書刊，一致認為今后必須加强联系协作。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积极展开学术活动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近一个月来积极展开学术活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理論与实践編輯部为了积极推动广州市的政治理論学习和学术活动，在十一月联合召开了三次学术座談会：十一月十六日召开了关于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体会座談会，出席座談会的是曾下乡直接参加建立人民公社运动的学者和理論宣传工作者，座談他們对人民公社的看法和下乡工作的体会。十一月十六号召开了关于学习“毛澤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的座談会，到会的社会各代表人物有理論宣传工作者、教授、医生和战斗英雄。十一月卅日又召开了关于资产階級法权問題的座談会，到会的有理論工作者、教授和政府經濟部門实际工作者数十人，座談会上大家发言热烈，对有关资产階級法权問題广泛地交換了意見，并准备繼續就某些重要的具体問題繼續座談，深入討論。工厂和人民公社方面，亦积极开展学术活动，除原有的工农学哲学小組繼續扩大和展开学习活动中外，广州市南区工人哲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和南区工会筹备委员会也于十一月卅日联合举办了第一次工人学术报告会，由中一烟厂工人杨庆（广州哲学学会理事）和胡珍两位同志分別就“取消計件工資問題”和“毛主席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問題作学术报告。这些由工人同志作的学术报告，內容密切联系实际，生动活泼，深受听众欢迎。到会职工八百余人一致要求今后多举办这种学术报告会。



把“大算盘”打响起来

章 沛

大算盘和小算盘是对立面。不打全国全民的大算盘，光打个人的小算盘，在这个积极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代，是行不通的，换句话说，过不了共产主义关。

有人在公社当中大谈“吃亏论”，说自己年青力壮，劳动力强，人口少，吃亏了，替别人养孩子。个人的小算盘打得漫天价响。据说，后来也想通了。他之所以能想通，理由是：第一，劳动力强弱是转化的，强的会变弱，弱的会变强，难保自己没有三长两短，而且一定有年纪老迈的时候；第二，因此，今天我养别人的子女，明天别人的子女就反过来养我，而且养我的孩子；第三，别人今天有孩子，是从八岁九岁或若干岁由公社包起。我现在没有孩子，将来有孩子，就从出生起由公社包起，比别人还便宜。这样一想，“吃亏”变了“占便宜”，思想就“豁然开朗”，替别人养孩子的论调收起来，小算盘也不再打了。这是大好事。

可是，从共产主义的原则看来，打这样的算盘虽然比专打“吃亏论”的算盘要好得多、高明得多，但这样的认识仍然是不够的，应该再提高一步。

你吃亏或者我吃亏，你养我或者我养你，你的孩子从什么时候包起，我的孩子从什么时候包起，其实仍然是在个人的小算盘上兜圈子。因此，这样想，克服了“吃亏论”，却仍然没有彻底克服“个人主义”。

要彻底克服个人主义，最好是换一个算盘，换一个打法。

个人主义的小算盘要不得，要得的是大算盘。大算盘打响，才能彻底的克服个人主义。

何谓大算盘？就是要先算全国全民的帐，然后再算个人的帐。

人民公社的算盘，是全国全民的大算盘，也是大集体的大算盘。有了人民公社，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办不起工业的办起来了，搞不成功的大水利工程搞起来了，大协作不顺利的顺利起来了，诸

如此类，等等。生产大跃进了，劳动成果大大增加了。

这是谁的劳动呢？是集体的功劳。谁来享受呢？应该集体来享受。这就是人民公社实行半供给制的天公地道的道理。

所谓替别人养儿女等等，其实是贪公社之功为己力，把公社给大家（也包括吃亏论者）带来的好处，说成是自己给带来的好处。从个人主义出发，冒集体的功劳。

实在道理也是明显的。公社化后，吃亏论者的生活也提高了，既然自己就沾了公社的光，又何来吃亏？即使算是富裕中农，的确收入暂时少了些吧，靠你的那么一百几十元和你个人孤单的劳动力，就能替公社社员养活了全部的孩子，真是傻话。至于最近的将来，公社社员的生活会大大提高，那时，暂时收入少了的，也变成增加了，难道还不是沾了公社集体的光？

不是谁沾谁的光的问题，而是大家努力，不分你我，共同富裕。我们要的不是什么个人主义的小富，而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的大富，是子子孙孙、幸福万代的大富。光是鑽到个人小算盘子里面，就象鑽牛角尖一样，越鑽越不是路，因而行动不自由，思想受束缚，人家大踏步，自己走不前，眼睁睁看着人家过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那才是真正的吃亏了。

因此，要拔掉吃亏论的根子，不单只要算小帐，还要算大帐，算长远帐。不能光在个人小算盘上克服自己的吃亏论，而且要在公社的大算盘上克服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本位主义。

这就要大大宣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不计报酬、忘我劳动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目光远大、不断革命的共产主义气概。提倡大打大算盘，不打小算盘，以共产主义之风，压个人主义的邪气。这是目前当务之急。

“教授中的教授”种种

黃 宣 民

“教授中的教授”

过去几年，每当中山大学历史系举行迎新晚会，向同学们介绍老师时，头一名总是提到陈寅恪先生，有的还着重说：“陈先生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老师，他是全国知名学者，所谓教授中的教授。”这样介绍的缺点是沒有适当地指出陈寅恪先生的政治思想面貌和治学态度，因而不少人产生了对这位大教授的盲目崇拜，造成许多不良影响，而且被不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来为陈寅恪先生个人捧场，有的甚至造谣惑众。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企图扬起陈寅恪先生的白旗，使之凌驾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之上，并且通过他们摇旗呐喊，把陈寅恪先生装扮成为不问政治的头面人物，然后好向那些易受迷惑的青年学生贩卖“为学术而学术”的狗皮膏药。“你看，陈寅老多吃香！”以便牵着这些青年的鼻子走进古代象牙之塔，躲避现实斗争。

陈寅恪先生自己呢？同样摆出一副“权威”架子，深居简出，从不轻易接近人。前年，蒙他接见了一年級一些新同学，约略地扯了几句闲话。他便问：“你们有多少人报考北大的？”一个同学说：“我们是报考中大的。”陈先生于是说：“北大也没有什么好货，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学生。”有的同学虽然听来颇生反感，但回头一想，这恐怕是大教授的“脾气”吧！后来领教一番，也不过是：一曰学好古文，多读史书；二曰多读外文。这就算作陈寅恪先生对历史学习的“指示”。

陈寅恪先生从不言及当今政治，有人提到总要被拦回。于是某些人则对此赞赏不已，说什么陈先生治学所以稳如泰山，就是“摆脱了政治”，故有“千百年而不倒”、“历久而不灭”的著作贡献于世。甚至宣称：在历史学方面，陈寅恪先生才是攀登高峰的楷模，郭沫若院长亦恐难与之相比。真是荒谬之极，无以复加。

总之，有些人以为只有陈寅恪先生才真正沒有沾染政治凡尘，完全悠游于学术圈子里。陈寅恪先生自己也以此自鸣得意，扮成一幅了不起的样子。

毛主席提醒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非打上阶级的烙印。”①即是说，人人都有阶级属性，陈寅恪先生丝毫不例外。人和人的关系是客观存在，人不可以不问政治，即使是学术思想也往往是政治思想的反映；具有强烈党性的历史学更加显著。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陈寅恪先生的政治思想面貌是怎样的。

精神上的辫子

陈寅恪先生出身于清朝世宦之家。正当他年青未及登官入仕的时候，清帝国的腐朽统治已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所推翻了，受过“皇恩”的陈寅恪先生则抱着“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②的态度。从此以后，陈先生觉得皇帝被打倒“已成定局而不可移易”③，常以“知足不辱”来自慰，流露出自己对政治的绝望。

王国维是一个蓄着辫子、矢志不贰于清廷的遗老，陈寅恪先生对他敬服得五体投地。王国维投水自杀以后，陈先生以寄人篱下的情怀替他写了一首哀痛的挽词。这与其说是哀悼着王国维，不如说是陈先生倾写内心的真情，清晰地暴露了他政治思想的面貌。

我们知道，清朝的封建统治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牢狱。可是，陈寅恪先生和我们恰恰相反，他写道：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八二页。

② 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囑语跋”，载一九三二年“清华周刊”第三七卷第二期。

③ 同上。

“依稀廿載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曩且暮，京华冠盖萃英贤。”①陈先生满怀甜蜜的眷念，把光绪、宣统年間腐敗不堪的統治，描繪成盛极一时的黄金时代，这正表明陈先生牢牢地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在他看来：沒有皇帝称朕的日子是难过的，吃人的旧礼教受到了致命一击，封建士大夫沒有地方日夜作乐，耀武扬威。也正由于这样，引起了陈先生对革命的憤恨，他悲啼道：“初意潢池嬉小盜，遽惊烽燧照神京。养兵成賊嗟翻复，孝定临朝空痛哭。再起妖腰乱領臣，遂傾寡妇孤兒族。大都城闕滿悲笳，詞客哀时未返家。”②陈先生站在封建統治阶级的立场把革命力量看成是“潢池小盜”，我們在这里清清楚楚地看到陈先生爱憎分明：他痛罵辛亥革命而对清皇族的寡妇孤兒尽了臣子之心；辛亥革命胜利举国騰欢的盛景陈先生置若罔聞，反而触起“大都城闕滿悲笳”的无恨伤感，为清朝統治的崩潰而哭丧着脸，这是为了什么呢？

陈寅恪先生之所以推誉王国維，是因为王国維“贏得（了）大清干淨水”，他敬慕地写道：“神武門前御河水，思把深恩酬国土”。③同时，为了印証王国維沒有辜負“皇天后土”之恩，而有舍身殉节之志，陈寅恪先生連把梁启超也諷刺了一通。“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間新会称耆哲，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躋馬厂元勋列”④。梁启超原是保皇党分子，后来竟做了政治投机生意，这在陈先生眼中，不能与王国維比照，所以陈先生希望：“他年清史求真迹，一吊前朝万寿山”⑤。就是說，他希望有人能給封建主子写家譜时，不要忘記了这位被昆明湖水淹沒的“伯夷叔齐”。

陈寅恪先生对王国維的吊念，同时也是对早已复亡了的清朝的哀婉。陈先生認为一般的人无法理解王国維的死因，唯有他才能从超越时、地的“理念”替王国維找到答案，誠如其晚联所說：“十七年，家国久魂銷，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⑥。事实也确乎如此，王国維心目中的封建幽灵，挡不住当时革命潮流的冲击而殉身，甘为时代所弃，在这一点上陈寅恪先生与王国維是有所不同的，但也不能說陈先生有拥护革命的态度。陈先生作为封建士大夫阶级的遺少，心中的忧抑是难以言喻的。他曾跟俞平伯先生說过：“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間，托命于非馬非牛之国。”⑦

陈先生深感生不逢时，只好苟活于世，“知足”以求自保。但心中怎能卸却旧日的怀恋呢？五年前，他曾寄贈刘节先生等人一副对联写道：“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陈先生不是

把溥仪看作人民的罪人，仍山呼“大清皇帝”，足见其頑固的封建士大夫立场是何等鮮明，精神上的辮子何等粗長！

并非“华胥之民”

去年春天，陈寅恪先生曾作詩数首，有一首写道：“紅豆春生翠欲流，聞歌心事轉悠悠，貞元朝士曾陪座，一夢华胥四十秋”⑧。看来，陈先生仿佛以华胥之民自喻，表白他苟活“知足”，与我們的社会主义社会好象沒有憎惡可言，沒有利害冲突。但陈先生与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否毫无爱憎、沒有抵触呢？有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这种事实是由陈先生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陈寅恪先生是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的种族文化論者。为了竭力保存封建主义思想体系，陈先生認为“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輸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結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归于歇絕者”⑨。这里所指“东欧思想”显然是指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給中国送来的馬克思列宁主义。陈先生不愿意看到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企图維護正統封建思想体系来抗拒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解放九年来，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著作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摒弃自己的封建主义立场，放松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抗。比如陈寅恪先生解放后再版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从显然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將唐代的政治发展历史看作是由于唐代統治阶级內部斗争的发展以及外族“連环性”影响的結果。書中連篇累牍，冗繁地敘述唐代統治集团的“关中本位政策”，玄武門与“中央革

①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詞并序”載述学社“国学月报”第二卷。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同上。

⑥同上。

⑦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囑語跋”。

⑧載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山大学周报”第一九一期。

⑨陈寅恪：“馮友蘭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命”，牛李党争等等，而对当时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一笔抹煞。不仅如此，反而指斥庞勋、黄巢的反抗封建压迫的起义斗争是“叛乱”，并且还把农民起义促使唐朝的灭亡说成是“罪责”。所谓“唐亡于黄巢，祸基于桂林”^①，按照这种逻辑，凡是人民起义和革命斗争都是引起外患乃至灭国的“祸根子”。这种理论不正适合历代反动派“安内然后攘外”的罪恶政策吗？陈寅恪先生站在封建正统立场上，当然不会承认阶级斗争，不会承认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憎恶和利害冲突，足以说明陈先生并非华胥之民，只是表明他封建阶级的偏见及与无产阶级的利害冲突罢了。此外，如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②诸文中也表明陈先生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点有其深固的阶级基础，其与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亦正是阶级斗争的具体反映。

思想渊源自白

陈先生的思想承受渊源究竟如何？他自己早就作了解释：“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际，议论近乎湘乡（曾围藩）、南皮（张之洞）之间。”^③，根据陈先生的自白，他是不折不扣地继承了中国近百年来洋务派的反动政治思想。我们知道，曾围藩是杀人不眨眼的大刽子手，张之洞是洋务派中风闻一时的大买办。人民唾弃这班历史罪人，陈先生则謳歌頌赞：“当日英贤誰百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順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資循誘。”^④不过，自从清帝国被打倒以后，

“中西体用”的法宝也被人民摧毁了。只有陈寅恪先生之流仍然繼承这个衣钵，并且把它应用到学术方面来。

陈寅恪先生力图用“中体西用”的治学方法来保存自己的自由王国。在他看来，建封文化正统和伦理道德是不可毁损的。想什么方法保存它呢？那只有跟着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学点实验主义的方法，用标榜“客观”、“科学”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来挽救封建主义的死亡。但很奇怪，过去竟有人声称，陈寅恪先生是自发唯物论者，鼓吹所谓人、地、时的历史方法（涂抹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相同结论。右派分子赵儂生竟敬奉这种方法是“严谨的科学方法。”看来，现在应该是使这种伪科学彻底破产的时候了。

陈寅恪先生的思想立场与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他并非天生不问政治，而是对我们的政治不感兴趣。因此他只有在学术上寻找一条“安身立命”的出路，籍此怀念昔日清廷“盛世”。

通过这次对陈寅恪先生的批判，又一次粉碎了那些资产阶级学者利用吹捧“权威”企图把政治与学术分割开来的鬼把戏。我们现在总算醒悟到象陈寅恪先生这样的“权威”并不值得我们青年同学学习，反之，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拔掉这面飘扬一时的大白旗。

①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九五六年三联书店版第一二九页。

②“中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五六年第一期。

③陈寅恪：“馮友蘭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④陈寅恪：“玉观堂先生挽詞并序”。

学术月刊

“学术月刊”是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办的综合性的学术刊物。

这个刊物的基本任务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研究毛澤东同志著作，加强联系实际，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經驗；贯彻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针，展开学术批判与学术討論；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促进知識分子又紅又专的炼鍛。

本刊每月十日在上海出版，每册售价三角，全国各地邮局发行。欢迎訂購。

学术月刊編委会編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理论与实践

月刊

1958年第12期（总第12期）

編輯者：理论与实践編委会
广州越秀北路中国科学院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大南路43号

1958年12月15日出版

印刷者：广东人民印刷厂

发行者：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預訂处：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本刊代号：46—71

刊号：（穗）0368

印张：2册

定价：每册二角